

#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

◎陈锡喜 著



MaKeSi ZhuYi: YiShiXingTai he HuaYuTiXi

ECNUP 上海市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ISBN 978-7-5617-8942-1
9 787561 789421 >
定价：29.00 元

www.ecnupress.com.cn



#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

◎陈锡喜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陈锡喜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ISBN 978-7-5617-8942-1

Ⅰ.①马… Ⅱ.①陈… Ⅲ.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②马克思主义—话语(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研究 Ⅳ.①A8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9696号

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

著　　者　陈锡喜
组稿编辑　孔繁荣
项目编辑　宋坚之
审读编辑　任韶华
责任校对　王　溪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10.75
字　　数　253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942-1/A·004
定　　价　29.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 目录

# 导　论

## 一、“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命题的提出

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态度，从强调意识形态，到鄙视意识形态，到“意识形态终结”论，再到意识形态问题重新获得重视。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也经历了从强化意识形态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到“淡化”、“边缘化”甚至“去意识形态化”，再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各类社会问题背后存在意识形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始终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

工作。这方面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①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一任务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定位，有了更清醒更自觉的意识，即要真正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各种社会思想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李长春近几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多次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如下新的要求：要着力在增强马克思主义学术创造力上下功夫，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学术语言，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牢牢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主导权；尽快建立一套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体系，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

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迫切需要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这是因为：

其一，从意识形态的本性来看，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其意识形态更需要表达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的普遍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①]这不仅指出了当社会利益产生分化甚至冲突后,政权对于阶级统治的必要性,而且揭示了作为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具有把某种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以更有效地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本性。这体现了意识形态在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统一,即内容上都反映一定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具有特殊性,而在形式上又表达为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当然,无产阶级同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的矛盾问题上,有根本的区别:剥削阶级构建"虚假的意识形态",即用形式上"虚幻"的利益普遍性,来掩盖其实质内容上的利益特殊性;而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科学揭示,旗帜鲜明地表达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冲突性,同时指出自己所代表利益在本质上和长远意义上对人类解放所具有的普遍性。

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逐步实现其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直接统一,即表达自己所代表利益不仅在长远意义上,而且在现实上的普遍性,以使自己不断获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资源。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为了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以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就需要对形成于革命年代、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得以强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进行重构,以更有效地为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其二,从意识形态的功能来看,党为了推进社会的进一步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5页。

放，需要在意识形态的“放”和“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现存秩序的合理性进行价值辩护。在计划经济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辩护是通过对“灌输”主流思想并实行对社会思想的严格控制而进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在逐渐转型，其最显著的标志是改革开放，而这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主动推动的。它带来各种社会意识的变迁和多样化，一个信息日趋多元化、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必须学会容纳多种声音。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社会公众是否关注公共事务，是否真正具有对社会事务的表达权，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具有开放性。

从社会生活同意识形态的关系看，在社会转型尚不定型时，为了使社会生活的“放”不致失控，有必要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调控，使社会秩序保持在实现执政党的目标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但从长远看，意识形态的调控又不能变成“管死”社会思想，不能造成社会生活的“放”与意识形态的“收”的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而是要在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这就需要重新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评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必须面对以下三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其一，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融入，使中国面对的意识形态问题趋于复杂化；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发展，使人们思想活动和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其三，信息技术、网络和媒体的发展，为上述意识形态的复杂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而这三个基本事实判断又蕴涵着两个内在的深刻矛盾：其一，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党必须坚持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一元化，否则，

将失去党在政治上的统一并进而失去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其二，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的市场化，使大多数人重物质利益轻精神追求，从而对意识形态采取淡化的态度，但是，各种社会生活中所涉及的意识形态问题却越来越突显，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观念，在深刻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

我们不能再以当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话语为尺度，来评判上述矛盾。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明确，到今天党强调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强调公民意识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等等，表明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又海纳百川的气度。但是，一个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能没有相对稳定的、既反映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变动、又同党的最高价值观之间存在某种平衡点的意识形态，这也需要重新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其三，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社会思潮的关系来看，为了维护党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需要调整同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

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传统上，我们历来坚持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批判和斗争，同时在党内，强调开展在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即既反对右、又反对“左”的思想倾向，而且把党内的路线斗争，看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再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但同样以反对“左”和右的社会思潮，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线的。尽管对右和“左”社会思潮的界定，在学理上存在某些逻辑混乱，在实践中也每每引发诸多争议，但党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实现重大突破时，强调在思想领域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则保证了突破时的政治大局上的稳定。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然而，在社会日益开放的环境中，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是与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诸多反映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和碰撞，不断发生着深刻而又强烈的变化。因此，现在很难再对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简单化地贴上"左"或右的标签。思想上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或"落后"于社会发展阶段，与对待改革开放问题在政治上的"僵化"或"自由化"，乃至对社会开放到今天的各种社会矛盾提出的解决思路上的"保守"或"激进"，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即使对同一社会矛盾提出的大致相同的解决方案，其背后的理论模型和价值导向，却可能大相径庭甚至完全对立。

由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在处理同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上，就无法再以一种思维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为标准，把其他社会思潮简单地判定为右的或"左"的倾向，并只是通过对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的批判斗争，来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了。在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除了指导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外，在日常生活领域，只能在尊重差异中扩大政治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为了在"尊重"、"包容"与"扩大"、"增进"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唯一的途径，是用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引领"社会思潮。同时，由于社会认同和思想共识本身具有相对性，是一个依社会条件和人们实践地位不同而发生的"变量"，因此，党的意识形态要有效"引领"社会思潮，也需要重新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要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能简单从"社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出发作逻辑演绎，而必须从变化了的社会生

活的实际出发，对各种社会思想以及各种价值观中能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话语进行整合。

任何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念的理论表现，都不仅具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还具有规范社会生活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这一功能的实现，是以话语体系为载体，对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心理进行"过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反哺"。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进行"过滤"，既包含了对外部信息的"同化"作用，又包含了对外部环境的"顺应"作用。而重构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正是使意识形态"顺应"外部环境的重要工作。如果只有"同化"而没有"顺应"，就可能与社会生活新的变化之间产生"紧张"关系，只有这两者作用的结合，才能使特定的意识形态掌握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变革中的话语权，从而实现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反哺"，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有维持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而且借着各种文化手段，将党的意识形态所体现的价值诉求转变成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既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提高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供可靠的保证。然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不可能由一种意识形态取代所有社会意识的存在。这就需要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角度，实现对社会思想的"顺应"和"同化"的有机结合，即通过对多样化的社会意识的"整合"，来"反哺"社会思想。

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具有对其他社会意识的整合能力。一方面，要对那些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为政治目的的意识形态，保持应有的压力并提高批判的能力，对各种腐朽的思想意识，进行必要的鉴别和抵制；另一方面，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

具有整合其合理成分、包容其反映社会生活的话语的能力。

当然，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个人对价值观的判断和选择，极易受来自各方面的思想观念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关心与冷漠相容，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价值观的变动性，既是新旧价值观的扬弃和更替，同时也会由于一些人不能正确处理义和利、权力和能力、人情和制度、关系和努力、依附和自立的关系，从而出现价值真空、价值错位、价值悬置和价值虚无的现象。因此，承认价值观的多样和多变，只是事情的起点，而不是事情的终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现实的合理性源于事物本身的存在根据，如果根据变化了，则原有的现实将失去它存在的必然性，就将退化为“现存”，而“凡是现存的，是一定要灭亡的”。社会生活的变动，使得各种价值观的摩擦乃至冲突难以避免。为了使社会大众能确立既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要求，又客观上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各种价值观的表达话语进行“整合”，使人们在价值观选择中，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使社会生活在变动中不至于出现价值真空或价值混乱。

## 二、“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内涵的厘清

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其内涵是指：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体系，以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带来了新的实践资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同时，它也呼唤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的创造。一方面，它需要对原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调整，摒除纯粹为阶级斗争服务而已经不适合解释或指导现实生活的旧范畴和概念；另一方面，要及时反映社会生活新变化，对一些沿用多年的、在封闭条件下习以为常的一系列宣传范畴和语言，重新加以解读，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将反映人类社会进步的范畴和概念中国化和具体化。

对于“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的问题，人们在“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方面作了较多有深度的论证，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一论证，还只是“历史前提”或“必要条件”的论证，对于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仅有这样的论证，还是不充分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过，对于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历来所坚持的，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绝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①。改革开放之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初尚且如此，今天，就更有必要“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也以十分明确的话语，表达了对党的执政地位和先进性的新的认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意味着，对曾经以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而体现思想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依然需要继续证明自己在思想上的先进性，这就需要以发展的视角，对“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命题所包含的基本话语，作出新的诠释。

**（一）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作出了“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①]的论断，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今天，我们讨论何谓“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时候，不得不深究毛泽东关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的意蕴。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马克思是从物质出发，论证了物质运动的规律性，并把它运用到社会历史，从而揭示了五大社会形态依次“线性”更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样，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普遍性”，是从物质运动的普遍性中演绎而来的，因而是绝对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必须按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顺序演进，这是“不可抗拒”的普遍性，特殊性仅仅在于每一阶段演进的表现形式的区别。这一解读，同黑格尔主义在形式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8—659 页。

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置换成“物质”概念而已。当然，这一解读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然而，它恰恰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因为依据这样的认识，我们忽视了社会的实践条件和人民的实践需求，誓言“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而搞了“穷过渡”，结果是，我们不仅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也重新拉大。同时，我们也落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陷阱：本想通过这一所谓物质运动的“铁的规律”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被人反讽，“既然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

问题的要害，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出发点的认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就批判了仅仅从物质出发来看待世界的旧唯物主义，认为它们是“冷冰冰”的唯物主义，认为如果不从实践的视角来看待物质，这一“物质”概念就等于“抽象的零”。他们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在于把以“物质”为参照系转为以“实践”为参照系，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的结合。因此，马克思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称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他们并不是从所谓“物质运动”的普遍性来演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现实性中来揭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他们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论证，是以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批判为基础所作的分析，而非对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发展历程的所作的经验归纳。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普遍性，恰恰来自它的特殊性，其思想进程本身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指导和运用，就必须而且也有可能结合具有特殊

性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条件，而这一结合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内容上的。

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个将非本土产生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南的党，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突出其基本立场、核心观点和根本方法，而不是照搬马克思的“本本”，是非常必要的。

马克思确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即从人的实践出发来看待外部世界特别是人类历史，才决定了其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马克思继承了欧洲思想史上关于“物质第一性，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积极的思想元素，但他具有原创性的观点，是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而发现的关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社会基本矛盾的动力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等核心观点，而马克思也正是运用这些观点，才回答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就同它的世界观是一致的，因为其基础是“社会实践”而非“物质”。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内容展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其实质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以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以及立场观点方法的解读，不仅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现。因为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和立场观点方法，从毛泽东开始，就不仅是抵制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需要，更是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需要；第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之所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理论立场的张扬；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论、社会结构论、历史动力论、历史主体论等核心

观点，以及实践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观点和方法。

厘清以上关系，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十七大关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的科学性。我们今天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再是过去具有强烈斯大林主义色彩的、以“物质”为核心话语所构建的“绝对普遍主义”的话语体系，而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即在当代中国条件下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上所表达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

**（二）“在社会生活的哪个层面”或何谓“意识形态领域”？**

要厘清什么是意识形态领域，先得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有个界定。学界对什么是意识形态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认同的是，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的是 18 世纪后期法国哲学家托拉西。他以经验论为基础，提出了研究观念的起源、基础和可靠性的学说，即意识形态。然而同时代力图恢复帝制的拿破仑，对于主张把一切不能还原为感觉经验的观念清除出意识形态的学者，却极为鄙视，称其为“空想的意识形态家”。于是，“意识形态”概念诞生不久，就被打上了“清谈”和“脱离实际”的贬义“印记”。马克思在剖析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构时，对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思想上层建筑的传统意识形态，提出了批判，认为它们都是现实的“虚幻的反映”，因此称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认为它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又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

---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1954 年 9 月 16 日。

益，因此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从而把意识形态同科学联系在一起。

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看，不管如何给意识形态下定义，也不管人们曾经对意识形态有着怎样的理解或取怎样的态度，意识形态并非是纯客观的或“价值中立”的科学理论，它强烈地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利益，所要表达的思想，最根本的是价值观。当然，如同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有着自己的世界观，但并不都有哲学理论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但并不都有意识形态理论。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形态，简言之，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它需要论证，具有逻辑。意识形态不是一般个体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心理体验和目标追求，而是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系统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而需要对其所追求利益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目的性，作必要的理论论证，亦即它是具有一定逻辑形式的理论体系。

既然意识形态都要表达一定的利益，然而任何社会的利益都是分化的，于是，某一社会集团在实质上是代表某一特殊利益时，为了获得社会对自己政治利益最大程度的认可，便需要尽可能赋予自己所代表的特殊利益以普遍性。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性。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应该逐步表达自己所代表利益在现实上的普遍性，以使自己不断获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毛泽东晚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教训之一，在于继续强调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性，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以及“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此来获取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资源”。

今天，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转型，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它决定了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于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只反映“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的利

益，而应尽可能为协调各种利益矛盾提供根据。这样，它就需要根据意识形态对利益关系所反映的密切程度的不同，或者说，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性强弱程度的不同，区分不同的领域。除了对外交往领域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外，国内的社会生活可划分为政治生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

首先，是政治生活领域。它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直接体现人们的利益（基于物质利益，还衍生出政治权利、文化利益和社会权益）关系，特别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为无论是为国家利益构筑安全网以及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还是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确立国家正确的发展方向，都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基础。

其次，是思想文化领域。它大部分属于意识形态，或不同程度地具有意识形态性，即在以不同的理论范式和价值取向来反映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为一定的利益关系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作论证。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掌握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主导权。

再次，是日常生活领域。它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和多样，价值观念更趋向不确定和不统一，但更多地是具体问题，而并不都能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形态或“主义”，故不应将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化。但是，由于社会转型中诸多问题的集中爆发或凸现，背后往往存在“主义”的影子，而如何化解这些矛盾，也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因此，意识形态应关注日常生活领域。

**（三）何谓“指导地位”？**

正是由于我们承认今天社会生活中多样化价值观存在的合理性，亦即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才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元化地位的必要性。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否认意识形态多

样性的事实存在，而是在于需要在指导思想一元化和社会意识多元化间保持必要张力，以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为此，除了对社会生活领域依意识形态性的强弱而作出区分外，还须对何谓“指导地位”作出新的界定，而不能把“指导”当作“取代”，把“指导地位”当作“指导一切”。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指导”，是指“指示教导；指点引导”。以此词解，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生活三个不同领域“指导”，分别理解为“教导”、“指点”和“引导”：在政治生活领域，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指示教导”作用，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他理论可以作为思想资源被参考和借鉴，但不能在整体上成为理论基础；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点”作用，即在包容理论多样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要通过对各种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以及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力的彰显，发挥其对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点”作用；在日常生活领域，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引领作用，在尊重因社会分化而形成的不同价值观的差异性以及选择的合理性的基础上，体现马克思主义对某些重大社会问题背后的利益趋向和价值取向的揭示作用，以“引导”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而不是将所有的日常生活“问题”都打上“主义”的烙印。

对于区分三个社会生活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不同解读，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对“统治”、“支配”和“引领”三个不同概念的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

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①]这是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革命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运动的指南，执政后，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在社会生活分化的今天，应该把“统治思想”的作用限定在政治生活领域。今天，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统治”所有的社会生活。思想的“统治”地位，往往又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有关，既然如此，能够在政治上成为“统治”思想的，未必能够“支配”一切思想文化理论，一种思想要能够在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上对其他思想文化起到“支配”作用，是不能仅仅依靠这一阶级在政治权力上的统治地位的，甚至根本不能依靠权力的统治，而必须发挥自己的理论对社会问题的解释能力，以及对其他思想文化的整合能力和对话能力。至于在日常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则既不可能“统治”人们的所有思想，也不可能“支配”人们的所有思想，但必须而且可能去“引领”人们的思想的健康发展。

**（四）何谓“加强”：以执政党为视角的思考**

在开放的社会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弱化过去作为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和在计划经济年代“领导一切”的党把意识形态简单当作政治斗争工具的功能，重新确定“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即“必须”做什么，又“可能”做什么，以此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原则。

其一，把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与辩护功能统一起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社会生活的解释作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今天，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要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作价值合理性的阐发，为社会繁荣发展和公平正义秩序的建立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舆论支持，从而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它的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共产党执政以后，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依然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否则，就可能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会遇到不同矛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揭示这些矛盾，分析这些矛盾产生的主客观根源，指明这些矛盾解决的前景，化解群众不满情绪，以体现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教化功能；应该对各类社会问题背后的价值趋向进行批判，澄清其利弊和利益关系，而不能"遮蔽"这些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构，应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中的批判性与辩护性的统一，把两者统一在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上，以更好地实现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合理性的辩护作用。

其二，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功能，以人为本，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因"转化为公民精神的"动力因"。

"以人为本"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之一，以其为核心来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应该在内容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就需要将党的价值理想、社会发展理想与个人的职业理想、甚至生活理想相结合，它不应该用理想化的共产主义道德来否定个人的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它应该将马克思关于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理想作为“目的因”，将党的政治理想同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同公民的个人追求结合在一起，使之转化为人们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动力因”。这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应该从立足于教育人、改造人，转向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尊重人、关心人、发展人和激励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该面向生活世界，背靠意义世界，揭示生活意义，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关系，提升精神文化水平。

如果将“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那么，在其话语体系中应突显“公民意识”的话语地位。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尽管报告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部分提出这一要求的，但它也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即我们如何将过去长期回避的“公民意识”问题，自觉纳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构建之中。这就需要对“公民意识”，包括公民意识的起源、普遍内容、中国现阶段公民意识的现状、特殊条件、具体内容、发展变化，它与生命意识、主体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关系，以及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三者的关系等等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既不能把“公民意识”仅仅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不能照搬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公民意识。

其三，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在实践上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相互联系的四个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这四个命题提示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主要话语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交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之间存在着区别，对于意识形态概念，毛泽东在话语上比较多的使用“观念形态的文化”，强调的是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当然，毛泽东晚年为强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并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供理论根据，便不断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强调“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了适应物质文明发展同时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需要，邓小平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并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为了适应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新的变化，江泽民在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强调了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提出了“发展先进文化，支持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胡锦涛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并把它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意义在于：从理论上说，它使党的意识形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党的三代领导人既一脉相传，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涵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定位，有了重要发展，进一步表达了意识形态的本质特性。

从实践上说，它调整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路，即侧重于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想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以及提升在国际上的文化软实力。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既可以扭转“淡化意识形态”或“去意识形态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思潮，又避免“强化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泛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倾向，从而能以此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进行有效的辩护，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维护党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进而维护党的执政地位。

其四，在“大文化”的层面上建设三个紧密相联而又功能互补的文化圈，以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首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源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整合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的价值诉求，因而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应该成为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推进各个层面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其次是和谐文化。它“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①]。它涉及文明道德风尚、良好舆论氛围以及社

---

① 刘云山：《建设和谐文化，巩固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第 40 页。

会文化生活等方面，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柱，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补充。

再次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不仅包括传统文化，而且包括近代以来在与各种西方思想相互碰撞和激荡中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不竭的动力，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广泛的组成部分。

## 三、本书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本书作为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构和话语主导权的掌握”研究成果，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和衍进，勾勒了其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从“人的实践”到“物质”再到“以人为本”的过程，论证了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及途径，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掌握社会生活中话语主导权的前景。

第一章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使用的批判性考察，指出其本质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根本特性是将“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其表达形式是话语体系，它直接关系到能否掌握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第二章论证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其话语体系构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话语核心概念的确立，经过“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异化劳动”、“物质生产”到“实践”四个阶段。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作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人类活动因素和历史现象的论证，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范畴。“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决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基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马克思构建了

以“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为中心思想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第三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演化。为了适应经典自然科学危机和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时代条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作了创新，掌握了对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话语主导权。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意识形态根据，是历史发展“铁的线性的规律”，其核心话语，是自然物质运动决定人类历史活动。

第四章追述并评价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化进程中的衍进。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毛泽东创立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其“一分为二”作为“宇宙观”的话语表达，及其转化为“斗争哲学”的政治话语，是毛泽东成功和晚年失误的重要的共同根源。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以“现代化实践”为核心话语，以和平、发展、富裕、改革等基本范畴，对意识形态话语作了调整，从而掌握了推进改革开放的话语权。

第五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时代境遇。当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欲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以巩固其指导地位，须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为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性。

第六章提出了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目标和途径。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这一核心话语，以“以人为本”为价值导向，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处理好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宣传话语及其同日常生活话语的关系，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

矛盾的解释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增强在国际领域的对话能力。

第七章论证了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的相关问题。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的体现：政治生活领域的“教导”，思想文化领域的“指点”，日常生活领域的“引领”；在不同群体中的体现：“灌输”、训练、对话、感染。

本书力图在诸多方面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本质、根本特性、表达形式及其功能，提出了新的见解，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使用的批判性考察，指出其本质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根本特性是将“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其表达形式是话语体系，它直接关系到能否掌握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对何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了新的解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其理论立场的确立，决定了其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而其理论立场的确立，又是其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它以核心概念“实践”为逻辑起点，形成了一系列基本范畴；对列宁的话语创新作了新的阐发，认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作了创新，从而掌握了在经典自然科学危机和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时代条件下的话语主导权；对斯大林模式的意识形态根源及其核心话语，作了新的探究，认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会趋于僵化，其意识形态根源在于其把自然“物质”作为核心话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创立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关系，对毛泽东何以并如何创立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作了新的概括，特别是对毛泽东得以成功和失误的宇宙观的核心话语，提出独到见解，认为是将其视为“宇宙观”而实为辩证法的“一分为二”；对邓小平通过调整意识形态话语从而掌握推进改

革开放的话语权，作了深度研究；对当今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何以是必要的，又何以是可能的，以及其内涵和原则，作了新的比较系统的论证；对如何通过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社会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际交往领域的话语主导权，作了新的阐述。

当然，本书还存在诸多尚未阐述或未阐述清楚的缺陷，如：理论观点和理论的话语表达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实践”的基本观点，以及“实践”作为核心话语这三者是怎样的关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的掌握是怎样的关系，所主张构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应该具有怎样的具体内容，等等。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深化。

由于本书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涉及对某些历史人物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评价，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政治上也有一定的敏感性。本人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尽可能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但不敢说所作论证是无懈可击的。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斧正。

# 第一章
# 意识形态、话语、话语体系及话语主导权

本章旨在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使用的批判性考察，指出其本质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根本特性是将“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其表达形式是话语体系，它直接关系到能否掌握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 一、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定义和使用的批判性考察

如同“哲学”这一概念一样，“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也是一个应用十分广泛、但对其内涵的把握又往往因人而异的概念。伊格尔顿(Terry Eagelton)曾经归纳过人们对意识形态所下的16种定义，有人将这16种定义又概括为三种观点：(1)社会特定团体的信仰和观念，是在一定的社会利益刺激下形成的思想形式或具有行动导向作用的话语；(2)作为一个整

体的社会权力的生产所形成的思想观念；(3)使个体可感知"它"所存在的世界，并激活个体与社会结构的联系的中介。[①] 这三种观点，没有根本的对立，只是在不同的层面表达着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观念"，而非一般的知识体系，而这种观念又同人们一定的利益、权力及由此感受到的体验有关，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关系的一种"态度"。

以往，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中，往往把意识形态作为"中性"的概念加以解读，即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体现阶级利益、保持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体系，即思想上层建筑。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以及国内出版的各类哲学词典，均如此定义，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反映着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以及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选择。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哲学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年版)："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体现。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

这一对意识形态似乎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的理解，甚至作为马克思的定义，其实只是在社会结构中对意识形态作了定位，而并没有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因为它无法解释意识形态自其概念形成后对其使用历史上的四个问题：

---

① 参见周宏：《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35—36 页。

其一，为何自意识形态观念提出后，很快就被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

从词源上来说，“意识形态”一词在希腊文中是由“观念、概念”和“学说”构成的。人们一般公认，最早采用“意识形态”一词的是法国大革命后期的哲学家托拉西。托拉西在 19 世纪初其所著《意识形态概论》（有译《意识形态的要素》）首先用了这一概念（法文 idéologie，后英文用 ideology），其直接的词义，即为“观念学”。托拉西提出“观念学”，是欲研究观念的起源、界限及其可靠性程度，即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作为理性主义者，他强调，这一研究应通过一种关于实际的理智过程的理性批判而形成。作为理性主义中的经验主义者，他又强调，对实际的理智过程的理性批判，关键在于还原为感觉，并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唯一任务。因此，构建“意识形态”或曰“观念学”的目标，则是通过使观念还原为感觉经验的过程，寻找到观念的真正可靠的基础，并使语言表达具有数学般的精确性，从而使人类摆脱偏见。

托拉西提出构建意识形态或观念学的理论意义，在于他试图建设基础性的哲学理论，以此重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基本观念，即凡是能还原为感觉经验的，这些基本观念才有可靠的基础，凡是不能还原为感觉经验的，必然是虚妄的概念。由此，这一学说介入社会生活便引申出其实践意义：为“共和”作感觉经验基础的论证。这一实践意义，触犯了拿破仑，拿破仑试图通过恢复帝制的途径达到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目的，显然与托拉西构建意识形态的实践价值产生了冲突。为此，拿破仑便把托拉西等人称为“意识形态家”，即脱离实际、虚构观念的“空论家”。由此，意识形态的词义发生转化，而带上了“虚幻性”的含义。

其二，马克思为何对意识形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①]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是持批判态度的。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在他们 1844 年 9 月合著的《神圣家族》中。《神圣家族》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把所谓的对“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本质和历史本体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而在 1845 年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通过对以往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现代德国”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意识形态在本质上的虚假性，认为意识形态总是掩蔽或扭曲现实关系，是一种颠倒的社会意识。他们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像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②]指出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意识形态，粉刷现存的统治秩序。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后期著作中，对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了改造，把原来在否定意义上加以使用的、以“虚假性”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意识形态，表达为“思想上层建筑”这一中性概念。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

---

① 一般认为，马克思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而笔者认为，与其说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如说马克思形成的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表现，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正是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得以形成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 页。

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此时,马克思并没有严格区分后人对马克思主义解读时所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式”概念,但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尤其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思想,马克思表达得十分清晰。晚年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尽管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但它并不是社会存在的消极的分泌物,它也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具有相对独立性,常常倒过来对社会存在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三,为什么现代有诸多学者依然对“意识形态”持“否定性”的解读?

从大的方面看,现在学术界对“意识形态”本身,依然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或解读,除了“中性”的解读,即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以外,另一种持“贬义”的态度或“否定性”的解读,特别是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卡尔·曼海姆就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样,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②],即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以想象的方式去描写存在,而在这一过程中,会因为要反映政治集团的利益而竭力掩盖存在的真实关系,因而意识形态存在虚假性,是消极的精神现象,没有认识价值。而作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在其代表作《保卫马克思》中,突出了“意识形态”和“科学”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这两者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其出发点是从幻想的现实提出问题,还是从真实的现实提出问题。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②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法兰克福1929年德文版,第171页。

个基本方面，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它仅仅以神话的方式反映世界，因而其社会功能不在认识方面，而在实践方面，即人们在一个既定社会中生活，必须建立一定的社会联系，而意识形态则为这种社会联系提供必要的思想认同。由此，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主义通过“理论实践”而超越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科学，是反意识形态的科学。

其四，为什么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中，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态度会如坐“过山车”那样起伏？

“文化大革命”中，整个社会都严重存在着意识形态“崇拜”的现象，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喜欢把各种社会现象都“无限上纲”为意识形态，使社会生活“泛意识形态化”，同时，又不断“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为能投入到意识形态活动中而欢呼，为能参与到意识形态斗争中而兴奋。意识形态的作用被强化到极致，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被强调到极点。结果，“物极必反”，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实践和理论上被否定，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化，人们似乎产生了“意识形态恐惧症”，伴随着“发展才是硬道理”观念（其实它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深入人心，除了理论界少数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人，从政府官员到追求尽快富起来的一般民众，乃至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都对意识形态“唯恐避之而不及”，力图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试图摆脱所谓意识形态的“纠缠”，至少是要“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更有人直接在理论上鼓吹“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又似乎成为一个“贬义词”。在对外交往特别是外交工作中，我们在继续坚持毛泽东强调的“不称霸”（反对霸权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了邓小平提出的“不当头”、“不打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不划线”（不以意识形态作对外交

往的标准)的原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①]在同“台独”思潮的斗争中,舆论也往往以“固守意识形态”或“搞意识形态的斗争”来斥责某些“台独”言论和行动。在这些领域,意识形态似乎已成为被社会唾弃的词汇。

上述现象表明,对于意识形态,单有从社会结构层面作描述性的中性定义(反映经济基础的思想上层建筑),且至多在这一定义基础上推论出它的根本特征是阶级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是有阶级性的,因而意识形态必然具有阶级性),而没有进一步从社会需要和历史发展两个层面揭示它的本质特征,是不能深入解读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变化以及人们在思想上对意识形态的不同态度的。

## 二、话语与话语体系

由于对“意识形态”本质特性的认识,涉及对这一概念本身在不同语境中的分析,而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和支撑的,因此,要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和衍进,须首先厘清话语、话语体系及其同意识形态的关系。

### (一)话语的特征、功能和分类

近年来,“话语”(discourse)一词已被人们广泛的使用和关注,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但是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下对话语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又不尽相同。

从语源学上看，“discourse”（“话语”）来自拉丁语，由词头dis——“穿越、分离、对称”和词根coursus“线路、行走”两个部分组成，大致的意思是指对事物演绎、推理、叙说的过程。而“discourse”的动词形式是“discourrere”，它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到处跑”。一个“话语”是一种表达（utterance），或一个谈论（非规定的），这种谈论的展开或自发的发展不受任何过于严格刻板的意向的阻挠，它向不同方向展开。在法语的语境中，“话语”相当接近于“闲谈”、“自由对话”、“即席演奏”、“对事实的叙述、陈述”、“夸夸其谈的演讲”、“语言”或“言语”。在中国大陆，“discourse”通常被译为“话语”，在港台和其他地方的华语刊物上，则被译成“述说”、“叙述”、“说法”等等。

在戴维·克里斯特尔主编的《现代语言学词典》中，对“话语”的定义是：“语言学用此术语指一段大于句子的连续语言（特别是口语）。但是这个宽泛的定义有好几种不同的应用。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一段话语是语言学中具有前理论地位的一个行为单位：它是一些话段的集合、构成各种可识别的语言事件，例如一次会话，一个笑话，一次布道，一次采访等。”[①]可见，这个概念仅侧重从语言形式上的界定，还不能完全涵盖话语的基本内涵。

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索绪尔认为，“语言”（langue）指人类代代传习和沿用的由语法、句法和词汇构成的语言系统和社会上各种约定俗成的法典、规范、标准等方面内容；“言语”（parole）则是指特定情况下个人说话的个别行为，包括说话者可能说的或理解的全部内容。因此，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

---

① 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1页。

而不是言语。

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福柯在他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中都贯穿使用了“话语”(discourse)这个术语。福柯在运用这一术语时,和索绪尔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福柯不赞成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忽视了一个第三者即语言形成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话语”的存在。福柯认为,“话语”既不是简单的、个别的字词的结合,也不是仅仅被限定在规则中的意义。他强调,我们不应“再将话语当作符号集合(指内容或描写的意指要素),虽然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所做的要比用这些符号去指称事物来得更多。正是因为这个更多,使得它们不能被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而我们正是要揭示和描写这个更多”。福柯还认为,“话语”并非常识所理解的“中介”,它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活动,历史文化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很明显,福柯已经看到了话语的产生和运作过程中所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即“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然而,尽管福柯对“话语”进行了详细而又深入的论述,但在福柯的著作中,从来就没有给“话语”下个明确的定义。

随着西方语言学的传播,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了这个话题。复旦大学范晓教授曾指出,“话语是由两个互相依存的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话语内容,也就是言语者表达的思想内容;另一部分是话语形式,也就是言语者借以表达思想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语言,这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语言,是族语的个别形

态，是族语的存在形式”，是“语言和思想的结合体”[①]。因而，“语言”、“言语”和“话语”的概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其实，话语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为了传递信息的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在长期的采集果实、捕捉猎物和抵抗凶猛野兽的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语言。通过语言的交流，人们可以获悉哪里有食物、哪里有危险以及大家将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等相关信息。最初的语言是由大量的肢体动作和极其简单的声音或语词构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生产实践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将一些大家熟知的动作、声音或语词用一些固定的符号记录下来，于是，就形成了文字。可见，语言和文字产生于社会生产实践之中，并随着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通过特定的符号、语词和规则为人类所掌握的传递信息、进行交流的工具。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②]因而，人们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一方面，主体总是要根据自己对信息的认识，加以选择、创造特定的概念、语词进行传播；另一方面，主体在对信息的认识、理解和把握的过程中，必然要融入主体自身的价值判断，使之为自己及其所在的群体服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话语必然是一个语言符号和价值观念的统一体，即它既是由一定的符号、概念、词句、语音、语法等所构成的语言符号，同时又反映了特定的认知、情感、意志。

---

① 范晓：《语言、言语和话语》，《汉语学习》，1994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从上述对话语内涵的理解中，可以分析出话语具有如下的特征：

其一，符号性。人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必须首先将自身的情感和认识通过相对固定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然后才能达到交流、沟通和传播的目的。一般来说，话语至少在两个以上的人之间才能产生。因此，在人们之间进行话语交流和沟通时就需要一些双方都互为熟知的特定的符号（包括语音、文字、动作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话语本身就是由特定的符号系统所组成的。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人类认知的增长，符号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也就越来越丰富。可见，符号性是话语的基本特征。

其二，意指性。胡塞尔说："语词的功能（或者毋宁说，直观的语词表象的功能）恰恰就在于，引发我们的赋予意义的行为，指出那些在此行为'中'被意指的并且也许是通过充实的行为而被给予的东西，强迫我们的兴趣仅仅朝向这个方向。"[①]可见，任何一个意识体验都有与之相关联的对象，意识活动与其对象严格地处在一种意向关联中，这个意识活动也就是一个意向体验，与之相关的对象则是它的意向对象。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反复强调，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来，话语除了是反映社会存在以外，它还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指向性，即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世界，使现实世

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42 页。

②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年版，第22 页。

界朝着话语的指向去发展。

其三，渗透性。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话语；而人类也正是通过话语来把握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马克思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①]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了话语，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特定的话语之中，受其影响并不断地改造和发展话语。人类正是通过话语来认识世界的，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也总是在特定话语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话语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产物，又是改造世界的工具，它广泛渗透到人类一切活动之中。

正因为话语具有以上特征，使其具有如下功能：

其一，信息传递功能。话语之所以能够实现信息的传递，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主体之间对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对称性，这为信息的传播既带来了必要性，又形成了可能性。凡是有人类聚居的地方，交流和沟通就必然存在。就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来说，只有通过话语，才能使个体之间了解对方的需求和想法。一般来说，一个个体心中有某项信息想同另一个个体进行交流，他把信息用双方都熟知的符号、语词、概念等话语表达出来，并用特定的方式传递给另一个个体，当另一个个体接收到信息后，他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实际情况将自己的行为和选择也采取适当的话语反馈给信息的发布者。发布者和接收者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完成了信息的交流和沟通。然而，由于话语和主体之间语境的差异，往往要经过多次沟通才能达到双方的共识。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威廉·冯·洪堡特认为，"语言不是一个实体，或已完成的事物，而是行动"[②]。马克思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② [丹麦]奥托·叶斯柏森：《叶斯柏森语言学选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可见，话语的功能首先就表现为人们之间表达和沟通的工具，通过交往意向的表达和语言符号的意指功能影响和改变交往双方的心理和行为，进而达到确立、维持和改变人际关系的目的。

其二，思维规范功能。"语言使用中的变化形式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由于"语言使用作为生产和社会控制的一个工具正变得更为重要"，而且这种权力和控制"很少存在于个人之中而更多地隐藏在传播过程和逻辑之中"，是"通过对社会情境概念的控制而加强的"[②]。《论语·子路》有这样的论述："为政必先正其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通过正名而以言行事，以言明理，以言定礼乐，从而以言兴邦，是维护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和治理天下首先要做的事。可见，话语在通过规范人们的思维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三，思想教化功能。话语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传播者本身对所传播的信息有一个评价和选择的过程，必然要融入自己的价值观。接受者对接收的信息也有一个认识、评价和选择的过程，也必然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加以吸收和内化。这使得话语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即由最初的信息传递的功能变成了思想的教化功能。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人由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过渡。社会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断接受教化的过程，而它是通过话语实现的。正如俞吾金所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②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教化也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所以,一个人接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他学习语言的过程。"①

话语所具有的信息传递、思维规范和思想教化这三大功能,体现在话语的形式、来源和社会地位方面,可作不同的分类。

其一,就传递信息的话语形式看,可分为书面话语、口头话语和体态话语。书面话语是指以符号、文字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话语。这种话语一般具有较长的稳定性,容易被人们觉察和研究。口头话语是指通过说话者的发音系统而产生的话语,一般来说,它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它是靠听觉传播的。体态话语是指说话者的动作、手势等表现出来的话语,这种话语主要靠视觉传播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口头话语和体态话语依靠录音、录像技术的发展,也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话语是口头话语和体态话语。而书面话语跨域时空界限为维系人类文明的传承过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二,就规范思维的话语来源看,可分为政治话语(含制度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政治话语是指统治阶级在统治过程中所使用的话语,制度话语是指统治阶级在制定各种具体政策、制度的过程中所表达的话语。学术话语是指由特定概念组成并具有一定学理支撑和系统体系的话语。日常生活话语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比较零碎的话语。学术话语往往比较抽象,理论性和系统性是其典型特征;日常生活话语往往比较随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零碎性、片段性和偶发性是其基本特征。学术话语须从日常生活话语中汲取营养,进行加工提炼,进而能"反哺"日常生活话语,使其具有理性和前瞻性,从而引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

---

①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一般来说，如果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长期相互背离甚至“冲突”，那么这个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就趋于紧张，甚至会出现对峙的局面。

其三，就教化思想的社会地位看，可分为主流话语和非主流话语。主流话语是指为特定社会掌握话语权的阶级、阶层或群体所传播的，又为多数人所认同的话语；非主流话语是指一部分人所认同的，但并未掌握社会话语权的话语。一般说来，主流话语具有高度概括性和价值导向性，而非主流话语具有现实性和直接相关性。作为特定社会的整体来说，非主流话语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它必然要受到主流话语的制约。但是，由于任何人总是受到其生活范围和生存方式的影响，必定处于非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因此，主流话语只有引领和整合非主流话语，才能真正发挥主流话语的地位和作用。

### （二）话语体系的特征、功能和类型

体系（system）是指由若干要素或某些意识互相关联而构成的有机整体。从结构上来说，体系包含了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彼此相对独立的要素；从功能上来说，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要素构成体系后能够产生出各单独要素本身所不具备的功能。一般来说，体系总有一个内核或中心，各要素围绕着内核或中心凝聚在一起。内核或中心往往是体系向心力、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标志。

话语体系是在话语的基础之上构建而成的。从时间上来说，人类社会先有话语，然后才有话语体系。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和交流思想，这些都需要话语才能表达出来，人类社会最初的话语往往是零碎的、片面的，也没有一个完全统一固定的概念，更没有形成话语体系，因此，话语往往只侧重于是一个交流沟通的工具，还没有达到规范的高度。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不断地总结经验，人们在话语的交流过程中

逐渐地达成共识，形成判断，并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使话语表达的更加严密、完整，使话语不断地系统化、条理化、规范化，话语体系也就慢慢形成了。

从形式上来看，话语体系首先是由各自相互关联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概念是话语体系中最基本的单位，科学认识的主要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概念，促使概念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现实。判断是对事物情况有所肯定或否定的思维形式，它是由概念组成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映现实的结果。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的判断的思维形式。推理在话语体系中也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往往一个话语只告知了几个前提判断，虽然没有直接告知话语原义，但只要略加推理，就可以获得话语的深层含义。概念、判断和推理凝聚在一起便表达出了话语的原义，即中心思想。任何一个话语总是需要围绕一定的中心思想才能有效地表达出来。因此，在话语体系中，概念、判断和推理是话语的基本构成要素，而话语的中心思想是话语体系的内核，各基本要素都是围绕这一内核而展开的。话语体系在自己的实际演进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赋予这些基本要素以新的内涵，并在实际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概念、形成新的判断，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话语体系本身。

从内容上来看，话语体系是一个融合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表达系统。人类认识事物总是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反复推进的过程。康德指出："如果没有感性，则对象不会被给予；如果没有知性，则对象不能被思考。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①可见，感性提供直观对象，知性则以概念思

① 转引：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0 页。

考对象，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理性是专指人心中具有的一种要求把握绝对的、无条件的知识，即超越“现象世界”去把握“自在之物”的认识能力。知性是判断的功能，理性是推理的功能。人类的认识能力由感性到知性，再由知性到理性。知性和理性都是逻辑思维的能力，但以不同的逻辑形式为思想的途径。当然，人类的认识并非只是一个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单线条的终结过程，而是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不断地修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人类的理性认识又反过来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过程中引起新的感性的发展。而新的感性引导新的知性认识能力的改变和提高，并最终导致新的理性的丰富和发展。

这样一个由概念、判断和推理构成的，反映人类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话语体系，必然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系统性。话语体系是系统化、条理化、规范化的话语。只有概念明晰、判断鲜明、推理严谨的话语才能称之为一个有体系的话语。一般来说，话语体系的最终形成还需要话语主体结合本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话语加以提炼、筛选，使之更加具有稳定性，更加规范和清晰，逻辑性和思辨性更强，因而，它往往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凝聚力。从感性、知性和理性的逻辑表达系统这个角度来说，话语体系更加侧重于表达知性和理性的内容，而话语往往停留在感性的层次，因而话语体系比一般话语更加深刻、系统；从价值观念系统来说，话语体系比话语的立场往往更加坚定、观点更加鲜明。

其二，开放性。任何一个话语体系一旦形成，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话语本身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由于话语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层出不穷，因此，话语体系需要不断吸收新的话语，对原有话语进行调整和摒除。任何一

个话语体系如果不能及时根据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加以调整的话，它必将会失去对生活的解释力。一般来说，话语体系的调整首先从概念、判断等基本要素入手，往往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或词组逐渐地成为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因此，话语体系的发展变化往往是通过对核心概念的调整而进行的，而核心概念的发展变化又是话语体系发展变化的标志。

其三，历史传承性。对于一个话语体系来说，其中心思想是话语体系的灵魂，概念、判断和推理是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它们之间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但是，无论是话语体系的内容，还是话语体系的表现形式，它们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加以传播和继承。人类也正是在继承和传播话语体系的进程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知识、技术和能力。

话语一旦形成体系，就具有如下功能：

其一，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功能。相对于话语而言，话语体系在表达个体之间的信息时，显得更加深刻、清晰，逻辑性更强，更加便于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话语体系是人们长期实践、长期思考的结果。人们在自己的长期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对已有认识、已有话语进行反复地提炼和概括，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因而，话语体系对世界的解释力更强。

其二，价值观的凝聚功能。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地进行自身选择的过程，因此，实践活动必然凝聚着人类的价值追求。话语体系正是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的产物，它必然在其中起到对一定的价值观进行凝聚的作用。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必然会尽可能地对自己的价值观用特定的话语体系对个体进行教化，将自己的意志强化为国家意志，以凝结和整合全体个体的力量。

其三，文化的传承功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积淀，除了

有共同的地域之外，每个民族在自己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和稳定的心理特征，这是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根本标志。一般说来，这种稳定的心理特征必须依托于地域国家的存在而存在，通过民族的交往而认同，而话语体系恰恰既是这种交往的产物，又是这种交往的工具。从交往的产物这个角度而言，长期的民族交往互动过程，形成了本民族的话语体系和交往方式，对于这种话语体系和交往方式的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话语体系所表达的功能的不同，使之形成了不同的类型。

其一，日常生活话语体系。日常生活话语体系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生产生活资料。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行为便成了人们一切活动的根本。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这种行为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不可缺少，而且还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日常生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展开的。在人类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日常生活话语越来越丰富，慢慢地形成了日常生活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的中心思想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日常生活话语体系往往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符合大众口味，容易被大众所掌握、理解和运用。

其二，学术理论话语体系。学术理论话语体系是指人们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由特定的学术概念、范畴和语言构成的，以学理支撑的一种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学理性，因此，往往更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当然，学术话语体系也是人们在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会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研究进步，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然而，正

是由于学术话语体系强调学术的规范性、科学性和严谨性，其话语往往比较枯燥、晦涩和难懂。一般来说，人们要想掌握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训练和培训。对于人民大众而言，其日常行为活动决定了不可能完全涉及到特定的学术领域，因此，往往只有少数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才能掌握和运用。

其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社会利益分化中形成的特有的话语体系。在社会利益分化乃至产生矛盾冲突的社会中，某一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特殊利益的需要，必然将其价值立场和价值观点贯穿于本利益集团的话语体系之中，并且通过一定的政治和制度保障，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渗透和灌输，以期教化民众。

## 三、意识形态的根本特性与话语主导权

### （一）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

对意识形态深层结构中的本质特征的揭示，有多种方法和途径，也会由此形成不同的看法和结论。笔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需要所阐述的，而又长期被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忽视的一个思想，来挖掘一下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特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①这不仅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5页。

出了政权对于阶级统治的必要性，而且揭示了政权的一大功能，即把某种“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这一对政权功能的揭示，实际上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即它是价值判断（表达的是利益关系）和理论因素（需要“论说”）的混合物，其根本特性，即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要“说”且说得好，就需要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话语体系，且形成从感性到知性和理性的逻辑体系。因此，如果用最简要的语言给意识形态下一个定义，则可以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

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便可以把对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等中性表达，与对社会存在的“虚幻性”反映等贬义表达统一起来，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指向统一起来，把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内容上的根本区别与作为意识形态的“共性”统一起来。无论什么社会形态，只要存在利益分化和冲突，不同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都具有这样的根本特性；一旦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完全消失了，社会不再存在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了，就不再需要意识形态了。

对于这一根本特性，还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统一，即意识形态在内容上都反映一定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具有特殊性，而在形式上又需要说成是体现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可见，意识形态本身是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产生矛盾、社会利益急剧分化甚至产生冲突后的必然产物。这样，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的共性，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以维护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利用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来麻痹广大人民大众，从而维护其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而无产阶级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传播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

础的意识形态，从而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有机结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以推进实现人类解放这一人类“普遍利益”的事业。以此为根据，我们可以阐释意识形态的特征：

第一，形式上的普遍性，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虚幻性”。

意识形态的普遍性是指在阶级社会中，由于阶级利益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代表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存在。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把自己描绘成全社会成员的代表，维护全社会成员的利益；对于试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来说，为了赢得更多阶层的拥护，总要制造普遍的革命口舌，似乎它的革命是为统治阶级之外的每一个人而进行的。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

可见，意识形态的普遍性是指形式上的普遍性，而这一普遍性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则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试图以普遍的外衣来掩饰其特殊的利益，剥削阶级构建“虚假的意识形态”，用形式上的“虚幻”普遍利益，来掩盖其内容上的实质的特殊利益。而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科学揭示，力图表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真实统一。因此，所谓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只是其形式上的普遍性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表现。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第二，内容上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阶级性”。

尽管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普遍的，但它毕竟是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因而它总要代表一定社会的某些集团、群体、阶层、阶级的特殊利益，这就是其在内容上的特殊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称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思想。”[①]因此，要真正认识一种意识形态，必须深入探究它和该时代的统治阶级的生存要求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揭明抽象的意识形态词句背后所隐藏的阶级利益。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观点，他指出：“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②]恩格斯也说过：“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③]可见，意识形态这种虚构出来的观念往往支配着现实的世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引开，成为特定阶级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2—29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6 页。

实现自己目的和意图的工具。这就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内容上的特殊性，在一定历史时期，即阶级社会中，就表现为“阶级性”。

阶级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的特殊性在一定历史的表现，也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在其夺取政权与掌握政权的不同条件下，对自己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统一的表达应有所不同：夺取政权时，它旗帜鲜明地说出自己所代表群体的利益，揭示它与其他利益的冲突性，同时指出自己所代表利益在长远意义上对人类解放所具有的普遍性，以便更充分地动员这部分群体的投入；然而，自己成为执政党后，应该逐步表达自己所代表利益在现实上的普遍性，以使自己不断获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第三，由形式的普遍性和内容的特殊性相统一所决定的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观念体系，是经济基础的派生物，因而，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后来，他又进一步强调：“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①]然而，意识形态并非消极的存在，它对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起着能动的反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

意识形态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物质经济关系发展状况经常具有不一致性；第二，意识形态的发展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统，在继承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第三，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价值观念的指导，意识形态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人类的活动。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时指出："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这就告诉我们，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各种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在短期内不可能被消除。

抓住意识形态的根本特性，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是社会阶级或集团根本利益在观念上的体现，因此，它对于一定阶级或集团来说，具有价值定位和行为导向的功能。其最根本的功能是：为某一利益集团维护其利益格局或背叛某种社会秩序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辩护。统治阶级在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那么统治阶级就将反映其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合理化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并且对整个社会具有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的作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通过教化向社会成员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做法，他指出："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变成机器的训练罢了。"②在现代社会中，单纯依靠暴力机器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做法，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他们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须同时在法律上和政治上论证它的合法性，得到社会中大多数成员的认同，从而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取得政权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了维护本身的统治地位，必然用自身的意识形态来教化广大社会成员，为其阶级统治进行合法辩护。

当然，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一个社会集团所制造和宣传的意识形态，客观上成为社会文化得以传承的纽带。在阶级社会中，主流文化往往和意识形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各阶级在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中，必须借鉴和吸收社会主流文化，从而使自己的意识形态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凝聚力，因此，社会的主流文化正是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文明的传承过程中不自觉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 （二）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与话语主导权的掌握

国家政权在一个国家中是至高无上的，统治集团利用自己掌握政权的优势，往往通过法律、法规、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来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这些暴力机关在维护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必然渗透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也正是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力的保障，才得以推行，从而作用于社会生活。

然而，意识形态毕竟是价值观念的理论表达。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渗透，但这种渗透还只是意识形态的间接作用。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发生的直接作用，需要依靠其话语体系的普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精辟指出的："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说"得好和不好，主要应依靠话语体系。意识形态必然借助于话语体系作用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普遍性和广泛渗透

性，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天然工具，因此，“一定的意识形态形成以后，必然在社会上形成相应的话语系统，即一套特有的名词概念、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用以阐释、传播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①]。意识形态的变更，必然伴随着相应话语体系的变化；反之，话语体系的变化，其实也集中体现并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变更。

对于统治集团而言，其意识形态的推广往往更需要学理性的支撑和符合广大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从学理性的角度而言，意识形态需要在阶级性和科学性之间保持一个应有的张力，因此，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需要与学术话语体系不断地交流和对话，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借助学术话语体系的科学性使其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而学术话语体系也要进行调整，使之更好地阐述新的意识形态。从符合广大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的角度而言，意识形态需要处理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因此，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与日常生活话语体系之间不断加强联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借助日常生活话语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优势，从而更好地说服大众，而日常生活话语也将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指导下不断地提升。

话语的本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话语和权力必然要结合到一起而形成话语权，并为特定的阶级服务。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掌控话语权可以巩固其统治，维护其根本利益；对于其他利益集体来说，为了获得本集团的利益也必然要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因此，话语权必然成为不同群体或利益集团为实现其群体利益的工具。

从话语的本质和功能两个角度来分析，话语权有两个层次的

① 朱兆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含义：一是话语本身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即所谓“软权力”；二是信息传播者通过对媒介的控制并拥有传播主体信息的权力，即所谓“硬权力”。第一个层次的含义侧重于从话语传播的内容的角度来界定，即事实到底如何；第二个层次的含义侧重于从话语传播的形式角度来界定，即话语怎样才能传播出去。这两个层次的含义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一般说来，话语权获取的基本途径就是权力和权威。权威就是人们在对话语者及其话语信任的基础上，凭借话语者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优势，受到人们的推崇而得以实现的。权力是硬性的，而权威是柔性的。只有刚柔相济的话语，才是最具有话语权的。当权力与权威统一于话语主体一身时，意识形态的传播是畅通无阻的，其功能也就最容易实现；当权力与权威相背离时，意识形态的传播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其功能也必将大大削弱。因此，对于意识形态来说，既要取得权力的支持，又要加强自身话语体系的建设，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话语权。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等于是在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话语，除非该社会所有成员的思想高度一致，不存在其他任何相异的话语。一种话语体系只要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可以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一种话语体系要想在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不仅需要掌握国家政权，而且还需要该话语体系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和对社会成员的说服力。

话语主导权是一个社会中主流话语的标志，它在社会各种形式的话语中不仅居于统治地位，而且能真正起到支配作用。因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对于任何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来说，为了表达和实现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就必然要争夺话语主导权。可见，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争夺的焦点，就是话语主导权。谁拥有了话语主导权，谁就强化了本阶级或集团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整合力，从而更好地实现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

就话语体系的产生来说，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作为人类认识的结晶，话语体系必须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即有一个由浅到深、从少数人认识到多数人达成共识的过程。因此，话语体系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必然会随着时代和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话语体系还有一个普及、推广的过程，即从少数人的认识到多数人普及的“大众化”过程。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传播的主体对话语体系本身的把握程度及其选择的话语形式是不是符合话语“原义”、传播媒介是否便捷，以及传播的客体能否理解和认识所传播的话语，是影响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可见，话语体系始终有着一个不断提升自身话语力的问题，又有一个在全社会中不断推广、普及和掌握话语权的问题。

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儒学为核心、兼收其他各种学说的话语体系，掌握了“君权神授”、“尽忠尽孝”的话语主导权，从而巩固和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西方中世纪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宗教对世俗社会的统治，逐渐形成了一套宗教神学的话语体系，掌握了神学世界观和赎罪人生观的话语主导权，从而安慰和麻痹了广大被压迫阶级。近代资产阶级以人性论为基础，极力宣扬个性自由，主张人人平等，反对封建时代宗教神学的统治，从而与封建剥削阶级展开了一场话语主导权的争夺。马克思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的虚

伪性，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不合理性，从而提出了一套实现“人的自由而又全面发展”的科学话语体系。对当代中国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话语体系，从而对社会生活更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以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 第二章
#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话语体系的构建

本章论证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其话语体系构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话语核心概念的确立，经过“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异化劳动”、“物质生产”到“实践”四个阶段。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作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人类活动因素和历史现象的论证，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范畴。“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决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基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马克思构建了以“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为中心思想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 一、“无知”及对“无知”的“意识”：背景的考察

任何科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同问题的关系之中。而问题形成，或者是因为原有理论与新的实践之间产生了矛盾，或者是原有理论在

其发展过程中内部逻辑产生了矛盾，或者是不同理论之间对外部世界的解释产生了矛盾，或者是这些矛盾的交叉。对于理论的发展来说，问题的形成是客观的，然而，能否自觉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且提出问题，除了客观上形成的矛盾表明我们的“无知”外，还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对“无知”的“意识”，即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矛盾；其二，是有解决“无知”的“情感和意志”。

至19世纪中叶，欧洲的思想文化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于是“无知”产生，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解决“无知”的可能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又具备了解决“无知”的“情感和意志”，一种新的世界观得以诞生，它以新的话语体系，解释了以往所有理论没能解释的社会现象。

**（一）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历史课题的“无知”**

19世纪上半叶，是欧洲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确立其统治地位后第一次出现重大危机的时期。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基本取代了封建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充分暴露出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19世纪欧洲各主要国家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其结果是经济危机的爆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77页。

1825 年英国第一次发生经济危机，以后每隔 10 年左右就爆发一次。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经济危机蔓延到西欧各国，1857 年第一次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破产、工人失业，工人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造就的生产力，已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力量。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既造就了资产阶级，也造就了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个体农民的不断破产和手工业工人逐渐沦为雇佣劳动者，使得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起来。但是，由于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劳动力出现了剩余，而大量失业工人的出现，使得在业工人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压力，而且他们的工资水平也被压到了最低限度。这种现状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无产阶级的斗争带有分散的、自发的性质，他们反对的是个别资本家，采取的手段是捣毁机器，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机器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以后，无产阶级才逐渐意识到，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他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于是，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同整个资本家阶级作斗争。到 19 世纪中叶，欧洲先后爆发了三次著名的工人运动，即 1831—1834 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1848 年英国宪章运动，以及 1844 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表明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18 世纪是资本主义蓬勃向上发展的时代，启蒙思想家们对封

建制度的无情鞭挞，体现了时代精神。而到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暴露了出来。于是，如何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前途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思想家面前：其一，资本主义为什么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二，欧洲主要国家为什么会掀起工人运动，又为什么它们都失败了？简言之，对于欧洲社会来说，它面临着两个新的历史课题：(1)资本主义向何处去？(2)工人阶级向何处去？

已有的所有理论都无法解释现有的这两大历史课题："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但如此"理性"的社会，为何会产生经济上周期性的不理性行为，且谁都无法自觉地加以控制？工人阶级凭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参加了反封建斗争，但此后为什么没有真正获得"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用"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武器反封建专制制度能得以成功，同样用这一武器反对资本主义却遭连续失败？这表明，所有的资产阶级理论，面对新的历史课题，均陷入到"无知"之中。它实际上提出了创造新理论的客观必要性。

### （二）对"无知"所具备的"意识"和解决"无知"的"情感意志"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生出"无知"的同时，我们又看到，资本主义出现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带来的产物，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解释这些危机提供了客观条件：其一，它使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了，独立的手工业者等中间阶层，在机器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强势面前，越来越显得不堪一击而被抛入两端，少数人进入资产阶级队伍，多数人陷入无产阶级行列，这就暴露出了人们历史活动中经济根源的强大力量；其二，资本主义所开拓的世界市场，冲破了各民族的"地域性的存在"，客观上形成了"世界历史性"，这就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从各民族历史

发展的特殊性中，寻找到总体趋势的普遍性。这表明，解决“无知”的客观“意识”已经形成。

伴随着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乃至矛盾的产生，欧洲思想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解决“无知”的思想理论条件即主观上的可能性，表明了解决对“无知”的主观“意识”也业已形成。

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对恢复人的价值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他们反对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神道（或权威）主义，宣扬理性精神、个性自由和人道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君权神授”的神学历史观，主张从自然和人本身来解释社会历史，把“天国”拉回到世俗的基础。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人和环境的关系出发，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唯物主义命题。而对于“环境”，有两种解读：一是自然环境，一是社会的政治法律环境。如孟德斯鸠认为，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决定了民族的气质和命运。这种排斥神学历史观的自然主义历史观，并不能解释复杂的社会生活，最终陷于宿命论。于是，其他法国唯物主义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环境，强调了社会环境的优劣决定了人们的道德风尚，而社会环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环境。这样，法国唯物主义直接把矛头指向封建的专制制度。然而，他们又简单地把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形成的根源归结为人的理性，于是形成了“意见支配世界”的命题。这样，他们就陷入“人”和“环境”究竟谁决定谁的“二律背反”之中。为了摆脱这一“二律背反”，他们只能求助于天才人物的理性，认为既能制定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又能启蒙民智从而改变人的意见，最终改变社会环境的，是天才人物的理性。这样，法唯物主义终究没有超越理性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因的唯心史观。

继之而起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承认政治法律环境和人的社会风尚的相互作用，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人的意见就能直接决定政治法律制度，因为政治法律制度能够提出并实行，背后一定会有更深刻的根源，这就是财产关系。他们提出，财产关系所造成的经济利益的斗争，才是欧洲历史变迁的重要动因。他们追溯财产关系的变化的原因，是产业的发展；而新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则是由新的工具的发明所决定的；而新的工具的发明，则取决于天才人物的智慧。这样，历史的变迁，最终依然是由人的智慧决定的。这又回到了“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的老路上去了。

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动荡中，深刻地意识到阶级斗争对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欧洲社会变迁的意义，因为一场大的阶级斗争，既改变了政治法律制度，又改变了人的意见；同时，他们同样看到财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利益冲突，才是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他们把财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征服”，又用人的“天性”的“恶”来说明“征服”，最终还是没有脱离唯心史观。

黑格尔力图解决“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的“二律背反”。他认为，“环境”是消极的、受动的，因而不可能成为历史的最终原因；而人的“意见”虽然是积极的、能动的，但它并不是绝对自由的、随心所欲的，人只有认识到必然，才能有“意见”的自由。而只有超越“环境”和“意见”的“二律背反”，即既能制约“环境”、又能制约“意见”的更为深刻的因素，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源，黑格尔断言，这就是“绝对精神”。由于黑格尔是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以外来寻找制约“环境”和“意见”的因素，因而依然是唯心史观。

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他认为，用所谓的“绝对精神”来解释历史，只不过是用“理性的天国”来代替“上

帝的天国”，这一“绝对精神”是“概念化的抽象的上帝”，而神学的上帝则是“形象化的具体的绝对精神”而已。于是，费尔巴哈试图用“感性”的人本身来解释人类历史，认为不是上帝或“绝对精神”创造人，而是自然创造了人，人创造了上帝或精神。然而，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①，他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而单纯用人的自然属性来解释宗教的起源，又用宗教的变迁来解释历史的变迁，这样，所谓作为人的本质的“爱”，就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于是，自然观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依然是个“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还是唯心主义。

尽管自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来的马克思的前辈，对历史最终根源的解释，或者定位于天才人物的理性、或者定位于恶的天性、或者定位于天才人物的智慧、或者定位于人以外的理性、或者定位于人的爱的情感，而没能真正回答欧洲资本主义 19 世纪上半叶提出的历史课题，但是，他们毕竟意识到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而这种相互作用的背后，存在着产业发展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作用，历史是有其必然性的，这一必然性归根到底还是得由人本身来加以解释。上述思想，为回答时代课题，提供了对“无知”的主观“意识”。而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在历史中而不是在历史以外寻找到既制约“环境”、又制约“意见”的“二律背反”真正因素，这一因素，既能说明人的理性、智慧或爱的根源，又能说明产业发展和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从话语的逻辑发展看，即需要形成这样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能够涵盖“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产业”、“阶级斗争”、“历史的必然性”以及“人”，以在吸收前人对“无知”的“意识”中的所有积极内容的基础上，超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 页。

越前人，解决对时代课题的“无知”。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前辈思想家的意识形态批判，做到了这一点。如果说，对于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带来新的时代课题的“无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同时提供了对“无知”的“意识”的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以及他们的情感和意志，则实现了解决“无知”的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

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就确立了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精神境界，他们的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他们奠定了解决资本主义时代课题的情感基础。他们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欧洲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的汲取，使他们获得了解决“无知”的意识基础。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彻底批判精神、艰苦探索精神和忘我牺牲精神，使他们具备了创造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志基础。

## 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话语体系核心概念的形成

任何一个理论的话语体系的形成，都依据其核心概念或范畴的确立为基础，因为核心概念或范畴是理论之网的网上纽结。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是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而实现的。这一批判的过程，既是超越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来对历史课题提供的思想材料的过程，也是马克思思想的自我批判过程。它们统一于马克思得以回答时代课题的核心概念或范畴的确立过程。这一过程，按历史（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和逻辑（核心概念或范畴的形成）的统一来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发端阶段，以 1843 年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的写作为标志；突破阶段，以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为标志；接近阶段，以 1844 年 9—11 月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为标志；形成阶段，以

1845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和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

### （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话语体系的发端

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起点，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1835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法律，在学习过程中，马克思深感掌握法理的重要性。由于柏林大学当年为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中心，为了更好地学习法哲学，马克思1836年转学柏林大学，主攻哲学。1837年起，他积极参加代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博士俱乐部”活动，其思想与青年黑格尔派一致，即比较倾向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即使在这一期间，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还是存在一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哲学理论方面，马克思比较强调应有和现有的统一，而不是如黑格尔强调现有是应有的逻辑表现；政治理论方面，马克思比较强调理论批判和积极行动的统一，而不是如黑格尔只是强调理论批判活动。这些差别，为马克思日后与黑格尔学派分道扬镳，打下了伏笔。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它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通过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辨析，提出了人改变环境争取自由的可能性的观点。这篇论文认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认为原子在虚空中存在垂直下降运动和互相排斥运动，由此构成了万物的多样性，但是，马克思又倾向于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存在偏离直线的自由运动的观点，同时又认为不能把自由绝对化。这成为他在政治上倾向于革命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原准备去波恩大学讲哲学，后威廉四世继位，加强了专制统治，青年黑格尔派受到排挤，马克思遂放弃执教

念头，转向报刊工作。1842年4月他来到《莱茵报》，成为撰稿人，10月被聘任主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参加了社会政治实践，经常出席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以了解政治运作和社会民意。其所接触的三件事，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开始怀疑黑格尔的哲学。

第一件是关于书报检查制度问题。普鲁士政府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提交议会通过了所谓的“书报检查令”。为此，马克思发表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对此作了严厉的抨击：“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①]这不仅反映出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表明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弊端：按黑格尔哲学，国家和法应该是绝对精神或理性的产物，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取消出版自由的“痼疾隐藏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中”，而这一制度并不取决于所谓的“绝对精神”或理性。由于在议会辩论中不同社会等级对书报检查有着不同的态度，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制度背后一定涉及到利益关系。

第二件是关于林木盗窃案。针对普鲁士政府提交省议会通过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1页。

的一项把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在森林中捡拾枯枝的行为以盗窃论罪的法案，马克思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除了为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辩护、公开捍卫贫苦群众的利益外，更严厉抨击了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制度，指出封建专制社会的立法就是把贵族的特权变成法。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社会的贫富对立和阶级对立，认识到物质利益的差别使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对私人利益的考虑支配着立法机关代表的决策行为。他认为，正是维护私有财产的自私逻辑，使国家权威和制度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奴仆和工具，"利益占了法的上风"。这进一步加深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是绝对精神和理性的产物的观点的怀疑。

第三件是关于摩泽尔地区贫困问题。马克思深入考察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贫困问题，写作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文章力图揭示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的社会原因，说明这种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的贫困，并进一步认为，国家的管理原则是由客观关系决定的，而非如同黑格尔所谓的由绝对精神或理性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①

因《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强烈，引起了政府的恐惧和敌视，政府检查官经常干扰报纸的正常出版，1843 年 1 月，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63 页。

政府更是下令4月1日起查封该报。马克思不得不于3月退出《莱茵报》,“从社会的舞台退回书房”,开始结合现实问题,特别是黑格尔国家观同现实的冲突这一苦恼问题,对黑格尔思想作系统的反思。

经过整个暑期的思考和研究,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书稿。在这一书稿中,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启发,通过把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颠倒过来,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观。黑格尔把国家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因为国家扬弃了家庭(有限领域)和市民社会(私人利益领域),进入无限的和普遍利益的领域,因而国家是目的,是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创造性因素,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的走向,家庭和市民社会则从属于国家。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同时,他将普鲁士国家视为“绝对精神”的实现,而否认对国家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性,这也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产生了冲突。

马克思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天然基础,市民社会是国家的人为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因此,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私有财产决定国家。这样,马克思触摸到了隐藏在各种社会政治关系后面的客观本质,加深了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国家关系问题的理解。正如他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所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

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这表明，此时的马克思的注意力，已经放在了现实的市民社会特别是经济领域。这一思想成果，是他批判了黑格尔从观念出发来构建现实的意识形态虚幻性而获得的。

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使马克思初步摆脱了现实与黑格尔国家观之间矛盾的困惑，开始准备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于是，他受邀主编新创刊的《德法年鉴》。但后因组稿困难，《德法年鉴》办了一期即停刊。马克思在刊物中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其中表达了两个重要的新观点：

其一，关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马克思强调，要对现存的一切作“无情的批判”，这一批判必须将理论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正如他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

其二，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费尔巴哈认为，德国实现政治解放的关键是宗教解放，一旦实现宗教解放，就实现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政治解放（即民主革命）才是宗教解放的前提，但即使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等于人类解放，因为人类解放的前提是废除私有财产、消灭异化、实现人的类本质；而人类解放的力量在于无产阶级，即“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3]；人类解放的途径，是诉诸“武器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

这些思想的形成，表明马克思完成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政治观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大转变。当然，这两个转变还不足以表明马克思已创立了新的世界观。其一，是因为这时的“唯物主义”，总体上还只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这时的“共产主义”，还没有形成足以取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而只是表明，他的理论和政治立场，已超越了自己以往的唯心主义和革命的民主主义。其二，是因为此时马克思新的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还没有确立。他开始用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来解释国家，用人类解放来说明人的类本质的实现，但市民社会的本质和私有财产的根源是什么，人的类本质又是什么，还未能有深刻的阐述，而这又与他的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尚未得到确立直接相关。

### （二）“异化劳动”：马克思核心概念形成过程中的突破

1844 年 4—8 月，为了研究“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的本质，寻找“理解全部社会的钥匙”，马克思准备写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故未完成，留下第一卷部分草稿。后由前苏联将之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名出版。

《手稿》出版后，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极大的争议，甚至引发了“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之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和总结“左”的教训过程中，一些学者直接诉诸《手稿》，从而在中国掀起了《手稿》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 页。

热。而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争论，又演化为涉及政治问题的理论风波。现在看来，围绕“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存在一个重大误区，即都把“异化”当作《手稿》的核心概念。其实，无论是“异化”也好，“劳动”也好，都是马克思借用的概念，抓住“异化”来评价马克思当年思想的成熟与否，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在《手稿》中创立的核心概念，是“异化劳动”。

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创立，是批判地吸取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以及批判地吸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的成果。黑格尔提出了历史运动是由“绝对精神”到“绝对精神”的“物化”(即“异化”)，再到扬弃“异化”从而实现“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费尔巴哈用人来取代“绝对精神”，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人的本质被异化(创造了上帝又被上帝统治)再到消除这一异化，恢复人的理性和爱的本质的过程。马克思接受了历史发展是辩证运动的方法论思想，但不满意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虚幻性，也不满意于费尔巴哈基于人的“自然性”基础之上的“理性和爱”的本质的抽象性。他需要寻找历史的真正的出发点。

而这时，马克思受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源泉的思想的启发，但马克思又发现了这一理论存在一个内在矛盾，即它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之间的矛盾：从理论要求看，劳动创造财富；但从实践要求看，劳动却不掌握财富。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找到克服这一矛盾的方法，即将劳动这一概念区分为“一般劳动”和“现实劳动”，“一般劳动”创造财富，而“现实劳动”之所以不掌握财富，因为它已经是“一般劳动”的异化的结果。

于是，马克思把“一般劳动”确定为人的类本质，即历史的出发点，正如他在《手稿》中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

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而正是由于“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①这就超越了马克思的所有前辈关于人的“类本质”思想的虚幻性和抽象性。然而，马克思认为，劳动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被逐步异化了，而成为“异化劳动”。它表现为：

第一，劳动对象的异化，即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②

第二，劳动行为的异化，即劳动行为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异化为谋生的手段即维持动物机能的手段和强制性的活动："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①

第三，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即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②

第四，人和人相异化，即社会的分裂。因为当劳动者不掌握劳动产品、不掌握自己的劳动行为时，总有对劳动产品和劳动行为的占有者，而这些占有者，如果不从事劳动，它也丧失了自己的本质，而同样受到"物"即资本的支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③

马克思正是运用他所创立的"异化劳动"这一概念，来解释历史，并推测未来，而成为 1844 年他全部思想的基础。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形成的解释是："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4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48 页。

动的后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①]这就是说，私有财产并非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合理现象，而是被产生出来的，即它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而私有财产产生和发展后，又同异化劳动产生相互作用，它强化了异化劳动。

异化劳动的不断强化，使人全部丧失它的类本质，以此，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断言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是消除异化劳动。他用劳动异化观，推测了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即它是私有财产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私有财产运动的顶点，因为当劳动和资本对立达到极限时，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当然，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否定不是财富，而是劳动与财富的对立。共产主义是生产运动的必然结果，而自然科学的发展通过工业生产为人的解放作了准备。这样，共产主义就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创造性劳动、人的丰富的个性、继承人类全部文明成果），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完成（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人的本质复归，解决了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矛盾）。

由此可见，1844 年的马克思是以他创立的“异化劳动”为核心概念来构建其话语体系的，其基本逻辑是：一般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劳动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异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私有制得以产生，两者相互作用达到极点时，异化劳动必然被扬弃，从而恢复人的类本质，也即实现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

由“异化劳动”作为核心概念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对马克思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0 页。

世界观的诞生，起了“突破”性的作用。因为马克思在把研究重点转向“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以后，把劳动及其演化看成了社会历史的基础，而“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①。马克思第一次用“异化劳动”来探索历史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对共产主义作了哲学和经济学的论证。因此，不能以“‘异化’概念是借用资产阶级哲学的概念，马克思晚年也不用了”为理由，来贬低《手稿》的地位和价值，因为这部《手稿》的价值，在于创造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并以此为核心来说明历史，这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一次。

当然，《手稿》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它还带有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表现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以及私有制的消灭的论证不足，作为“哲学共产主义”，尚未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必然性、物质力量和具体道路，还没深入研究现实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活动及物质生活条件”。

**（三）“物质生产”：马克思核心概念接近于形成**

在马克思写作《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1844 年 6 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爆发了起义。起义失败后，各种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的人，都在总结其教训。而当时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强调要对工人运动所作的“批判”进行“批判”。他们把“自我意识”当作独立的本体、人的唯一本质、乃至“世界的唯一力量”，认为通过“精神批判”，使人达到“自我意识”，便能“克服物质实体而使自身得当发展”。由这一理论出发，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工人阶级的斗争都消融于“自我意识”之中，认为工人是“非批判”的群众，是缺乏“自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8 页。

意识”的消极的“物质”，只追求“物质”而违背了“绝对精神”发展的要求，成为历史的阻力。因此，要真正消除“雇佣劳动”，应该通过精神批判，消除工人的劳动是“雇佣劳动”的思想，确立起劳动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的“自我意识”。

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对工人运动歪曲，同时，在理论上进一步回答劳动的本质及其同私有制的关系，以便指导工人运动，1844年8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们的第一次历史性会面时，决定合著《神圣家族》(原名《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思想根源作了深刻批判，指出其所谓的“自我意识”不过是“虚幻”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资本和雇佣的关系并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劳动的“自我异化”的产物。他们指出，单凭思想是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的，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让用思想所无法摆脱的那种现实的、感性的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够的”①。

为此，马克思论证了历史的真正“发源地”，恰恰是被青年黑格尔派所鄙视的“物质生产”，而不是“自我意识”；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是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所谓实现“自我意识”的工具；群众对利益的追求是历史的动力，而并非如青年黑格尔派所斥责的“是精神的真正的敌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活动都不是纯粹的思想，而是为了某种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在革命进程中，“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一次革命如果不能满足群众的利益，就不能唤起群众的热情，不管它的结局如何，对于群众来说，都不能算是成功的革命。所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物质生产”和“人民群众”概念的确立，进一步把“劳动”概念具体化了。黑格尔把劳动看作是整个历史辩证发展的载体，它只是体现“绝对精神”的抽象的精神活动。马克思对劳动作了新的解读，即最本质的劳动，是物质生产，而从事物质生产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为了物质利益而从事的活动，才是真正的历史活动。这就使马克思创立新的世界观的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接近于形成了。

当然，《神圣家族》依然还存在论述上的不足：(1)还没有具体论证物质生产包含的内在矛盾及其对历史的作用；(2)尚未展开利益的变化同历史发展的具体关系。

**（四）“实践”：马克思话语体系核心概念的诞生**

1844年德国工人起义失败后，各种工人团体兴起，但受到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潮影响，为了更好地为工人运动提供能够真正反映工人阶级地位和利益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神圣家族》的基础上，感到有必要全面清算德国的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划清与费尔巴哈的界限；同时，对他们自己的前段时间的研究也作一番清理，解决《神圣家族》中遗留关于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及其对历史的作用以及利益同历史的关系这两大理论问题，从而对新世界观进行“全面阐述”。为此，他们计划合著两卷本的《德意志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287页。

意识形态》(副标题为:《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为这一合著作准备,马克思在1845年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而《提纲》围绕考察和对待世界的出发点、基本内容以及立足点和使命等根本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以往的哲学在话语上的根本区别。

第一,新旧话语体系在出发点上的根本区别。

人要认识外部世界,需要运用一定的话语体系,而话语体系首要的,是确定认识世界的坐标,亦即出发点。人作为主体,认识世界有三个不同的坐标或出发点:其一,是把人放在自然存在物的位置;其二,是把人放在精神存在物的位置;其三,是把人放在实践存在物的位置。

《提纲》第一条开门见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这里,马克思对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了概括性的、又极为深刻的批判:旧唯物主义总是把自己放在自然的存在物的位置来看待世界的一切,即把自己放在客体的位置来看待世界的一切,其优点是具有客观性,其缺点是缺乏主体的能动性。这一缺点使他们无法回答唯心主义所提出的责难: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诸如茶杯这样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东西的，如果没有人的能动性，世界上的第一个茶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唯心主义则把自己放在精神存在物的位置来看待世界的一切，其优点是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其缺点是其主张的主体能动性只是抽象的，即否认了主体能动性的客观来源。这一缺点使他们也无法回答唯物主义提出的这样的责难：如果说茶杯纯粹是精神创造出来的，那么，世界上关于茶杯的精神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一个只有客观性而没有能动性，一个只有能动性而没有客观性。现在似乎只要把客观性和能动性相结合，即能实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从而超越以往的哲学。其实，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的这一解释，是简单化了。因为思维的客观性和能动性是无法自动结合的，或者说，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会自然而然得以统一的。既要从物质出发，又要从精神出发，就是二元论，而二元论的结果，必然是导致不可知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早就作过这样的努力，并陷入了不可知论的结局。要把客观性和能动性结合起来，必须要寻找到一个结合的基础。而在《提纲》中，马克思更深刻之处，在于进一步揭示了造成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截然相反的缺点的共同根源，即都不讲实践。旧唯物主义者只讲感性的存在物，而不讲人的感性活动，这样，人就成了被动的存在；唯心主义只讲精神的能动性，同样不讲人的感性活动，这样，精神能动性的来源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

于是，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成为马克思构建对待世界的坐标或出发点，即核心话语。当然，实践概念并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哲学史上不少哲学家都对其作过有益的探讨。黑格尔认为实践是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通向客观真理的必由之路。不过，他把实践看作是一种精神活动。费尔巴哈反对把实践理解为是一种精神活动，但是，由于他把人仅仅看作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因而，

他所理解的实践也只能是消极的适应环境的、只限于饮食、日常交往的活动，而不懂得实践的社会性和能动性。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以往哲学关于实践概念的积极因素，第一次对实践概念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规定，即感性的、现实的、作用于外部世界的物质活动。它既是以外部世界为对象的现实活动，又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活动。这一目的性活动，使人的实践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和对象物本身的运动变化。在实践活动中，客观存在转化为理想的存在，理想存在通过人的活动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从而体现出人的巨大创造作用。

第二，新旧话语体系在基本内容上的根本区别。

实践坐标或出发点的确立，使马克思能够以此为视角，来看待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形成了新的话语视野。在《提纲》中，马克思展开了对人类思维和社会生活本质的论证：思维的真理性应由实践来证明，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人的本质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等。（关于以实践的视角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的话语视野，由于《提纲》没有直接涉及，故在本章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的确立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再展开。）

首先，马克思提出了实践是思维真理性的基础的观点。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马克思这里强调的思维的真理性，是指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即思维能否得以实现。这就排除了把感觉、或理性、或权威、或绝对精神、或上帝作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思维真理性的标准，同时，也排除了把客观事物作为真理的标准，而要能够把思维转化为现实的，从而证明思维真理性的，只有是实践。

其次，马克思提出了实践是人和社会生活的本质的观点。马克思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换句话说，实践既改变了环境，又改变人的意见。这就以实践把环境和人的意见统一了起来，从而真正超越了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关于“人和环境”的“二律背反”。以此为坐标，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形成了他的关于宗教本质、人的本质、乃至社会本质的观点。

费尔巴哈力图使哲学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他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宗教信仰的残余，而可以感知的世界才是唯一现实的，意识和思维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权威的恢复，给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提供过重要的启示，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思想解放的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②。

费尔巴哈对社会现象之一——宗教作了深刻的批判，“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强调不是宗教世界创造世俗世界，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世俗世界创造了宗教世界，是人创造了上帝。但是，费尔巴哈的不足，在于他没有进一步揭示世俗世界和人为什么要创造一个统治自己的宗教世界和上帝的根源。由此，他没能进一步回答，世俗世界和人怎样来解决宗教世界和上帝同人的对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2 页。

立问题。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回答了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①]这就是说，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世俗社会在实践发展中的自我分裂，因此，宗教消灭的正确途经，也只能依靠实践来解决世俗社会的矛盾。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他把人看成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即撇开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而是抽象、孤立、自然性地考察人性，因而没有能够真正揭示出人的本质，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爱的情感。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的缺陷，以实践为基础来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由于实践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属性，并制约和影响着人的自然属性，因此，实践对人的决定作用体现在人的本质的现实性上，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人构成的，由此，也决定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主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人是生产劳动实践的产物，人在生产实践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而现实的人都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

第三，新旧话语体系在立脚点和使命上的根本区别。

《提纲》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 页。

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新的哲学话语的社会和阶级基础，即旨在消除社会异化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还意识到了自己新的哲学话语的社会作用，即不再对世界作终极解释，而是致力于通过实践改造世界。

这样，我们可以对《提纲》以及马克思的思想逻辑作如下的归纳：

第一，马克思话语体系同旧哲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以“实践”（由此引申出的“社会关系”）作为其核心概念。

马克思寻找到了把客观性和能动性相结合的基础，即实践，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将唯物主义推进到新的形态——“实践的唯物主义”，彻底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如他谈到自己的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区别时所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②]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哲学倾向的实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因此，“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新的话语体系的本质，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其内容的展开，它们都是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本质特征引申出来的，是这一本质特征必然展开的理论表现。

马克思话语内容的展开，并非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再将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而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逻辑上说，正是由于实践概念的确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同辩证法的结合，以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马克思之前，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当他们的视线由自然转向社会，由于不理解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最后都把历史活动的动因归结于人的精神。而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此同时，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意义深入而全面的剖析，使世界的客观性和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因此也结合起来了。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晚年在评价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的形成理论基础时，突出了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①

第二，科学的"实践"概念的确立，是欧洲近代优秀思想文化中的核心话语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进程的逻辑必然。

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发展来看，他们对历史解释的最有价值的核心话语，是"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产业"、"阶级斗争"、"历史的必然性"以及"人"，而马克思的"实践"这一核心概念，涵盖了以上概念的积极内容，从而超越了他们的话语体系。"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本质，是"实践"；"产业"发展和"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是生产"实践"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会关系“实践”的变化；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存在于人的“实践”发展的必然性之中；而“人”本身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

从马克思自己的心路历程来看，确立“实践”这一核心概念的过程，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相统一的过程。它经历了“发端”、“突破”、“接近”到“诞生”过程，这一过程中的代表作，都是“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即《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即《神圣家族》），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些批判，系统地清算了各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使意识形态回到“实践”的基础，即用“实践”来解释了各种意识形态。正是这一批判过程，使马克思的核心概念越来越清晰：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到“异化劳动”，再到“物质生产”和“人民群众”，最后确立“实践”。“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命题，并把它颠倒了过来；对于市民社会的本质，马克思用其借用的“异化”和“劳动”的概念而创造的“异化劳动”来解释；对于劳动的本质和主体，马克思用其确定的“物质生产”和“群众”的概念来说明；最后，马克思确立了最有涵盖性又最有深度的概念——“实践”。

##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的确立和话语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新的世界观的核心概念的确立，而在《提纲》基础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

识形态》,则对这一世界观作了全面阐述,从而以实践为核心而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当然,这一话语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参加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进程中,不但得以丰富和完善,有个别话语也依据实践的变化、科学的发展以及新资料的发现而有所调整。但是,笔者认为,不管这一话语体现任何变化,《德意志意识形态》构建了其基本的框架和内容,其中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后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所阐述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每一阶段的研究所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基本是对由《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在各个侧面和不同层次上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如有的在经济学领域得以深化,有的在哲学领域得以展开,有的在社会主义领域得以具体论证。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本节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基础,同时兼顾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相关论述,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并解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其重要内容包括:与历史起点相统一的逻辑起点的确定,对构成历史基础的人类活动的因素的阐述,以及对基于历史活动基础的历史现象的论证。

### (一)与历史起点相统一的逻辑起点的确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先确定了构建新的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这一逻辑起点的确立,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即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该与所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相一致。

马克思所要着重回答的,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资本主义向何

处去？工人运动向何处去？而要回答这些时代课题，需要有新的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而以往所有的历史理论都无法回答这些课题，恰恰在于他们历史理论总体上是颠倒的虚幻的意识形态，而这些历史观之所以是颠倒的、虚幻的，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出发点背离历史的起点。

马克思是从实践出发，确定历史的起点的，即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从事活动的现实的人。马克思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①]很明显，马克思强调历史的起点，是现实的个人。

当然，"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而非只是抽象的精神的存在，因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肯定了人的肉体存在或自然属性。然而，动物也是肉体存在，也发生与其他自然的关系，而人同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之一，便是人是具有精神和意识的动物，正如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其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但进一步的考察，可以追问，人何以会有"意识、宗教和其他随便别的什么"，这些体现人和其他动物区别的根源何在，这就是马克思超越前人的地方："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因此,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真正起点是人,而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没有人,就没有历史。但是,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并非取决于感性直观,而是取决于感性活动,即人的实践。因此,马克思讲的人,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正如马克思所具体说明的:"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①

### (二)构成历史基础的人类活动的因素的阐述

由历史的起点展开,马克思阐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四大因素,并认为它们构成了历史的基础。这四大因素是:

第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马克思说:"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这就破天荒地揭示了本来应该是每个小孩都知道的真理,只是由于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而变成人类历史的"秘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所包含的深刻含义还在于,人同自然的关系,并非如同动物般是适应的关系,而是改造自然使之满足人类需要的关系。这样,马克思以实践为视角而形成了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视野,即"人化的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①

第二，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

马克思说："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②新的需要的产生，为人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提供了动力。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背后包含的深刻含义还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其原动力的，这就是"需要"以及"新的需要"。"需要"产生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产生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因而，"需要"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范畴，因为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发生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需要来抽象谈论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当然，必须注意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需要"，同纯粹在心理学范畴内谈论"需要"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对马克思来说，"需要"并非是纯粹的心理因素决定的，否则，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还是精神性的因素。马克思在运用"需要"这一话语时，作了严格的界定，"新需要"的产生有两个原因：其一，"满足（前一个）需要的活动"；其二，"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而这两个原因，都是"实践"本身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9 页。

展的结果。这表明，需要的产生尽管有生理基础乃至心理基础，但并非是先天决定的，它根本上是实践的产物，而它的实现，更依赖于实践。

第三，人口的自身生产。

马克思说："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①]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将人口的自身生产，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需要"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的，它清晰地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人们有着双重使命，一是"重新生产自己生命"，即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二是"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或人口的自身生产，这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二，"家庭"从原来"唯一"的社会关系降为从属的社会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原来的生产力非常落后，因而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而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

第四，社会关系的生产。

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同人口的自身生产两条线及其相互作用的阐述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活动的双重关系作了合乎逻辑的归纳："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系。"[①]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人的需要也好，人的生产(物质社会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口的自身生产)也好，不仅仅是自然关系，而都表现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关系。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归纳道："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②]这就用非常清晰而又简练的话语，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表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思想：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没有明确使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而是较多地使用"社会关系"、"交往状况"或"交往关系")，或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了一定的交往关系，由此，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演化和发展。

这一思想，解决了《神圣家族》中没解决的"物质生产"如何构成历史的问题。历史不仅是空间展开，且是时间发展，发展在于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根本的就是生产力和交往关系(马克思以后所使用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样，交往关系成了"物质生产"和"社会历史"之间的中介。物质生产不能直接决定历史的丰富性，历史的丰富性是由交往关系的丰富性所决定的，而交往关系的变化，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同时，交往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制约作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对生产力发展通过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对交往关系的变化这一“中介”从而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乃至对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作了具体的论证。他们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的“异化”，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其中的重要概念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逻辑关系：生产力→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类解放或共产主义的前提。

### （三）对基于历史活动基础的历史现象的论证

以“社会关系”或“交往关系”作为“物质生产”和社会历史的中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尽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要历史现象：阶级、国家、革命以及意识。

第一，关于阶级：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和阶级产生的中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来说明私有财产并非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合理现象，而是被产生出来的，即它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而私有财产产生和发展后，又同异化劳动产生相互作用，强化了异化劳动。但是，当时马克思还尚未就在私有制还未出现时，劳动怎么会被异化的原因，作更深入的探索。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劳动的发展和劳动的异化之间，找到了一个中介，即“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由分工决定的阶级，……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①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的生产，看成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而其逻辑表达则是：生产力—剩余产品—分工—交换—私有制—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越来越扩大（在行为内容方面的扩大和在地域方面的扩大），在农业同畜牧业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农业、畜牧业同手工业，农业、畜牧业、手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5页。

业同商业，农村同城市的分工，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伴随着这一过程，交换得以扩大，使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职能有了可能。私有制在交换扩大的基础上产生后，使阶级的形成成为现实。因此，这些论述蕴涵了这样一个重要理论观点：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私有制和阶级消灭的条件是消灭分工："而要使这三个因素（按：指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而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大工业本身的发展，为消灭分工从而消灭阶级提供了条件。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干任何事的描述性的话语，因为第一，这基本上是在转述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先知"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因为这里所用的，还只是"打猎"、"捕鱼"、"畜牧"，包括"批判"这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喜欢用的表达精神活动的话语，它们还都是农业社会的分工，而马克思恩格斯超越空想社会主义之处，是在强调只有通过发展大工业从而消灭分工，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其二，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没有经历现代信息化社会，我们应该区分生产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随着生产社会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生产性分工不仅不会消灭，而且将越来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5页。

专业化和细化，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应该是指“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即人类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所形成的社会性分工，如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特别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而随着生产性分工的细化，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性分工被消灭的前景。

第二，关于国家：“虚幻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者。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阶级的分化对国家产生的必要性：“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因为“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①

这就是说，当私有制出现和阶级分化后，原有的社会共同利益分裂了，产生了特殊利益同共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构成了要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共同利益”，因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有必要对同他们的“共同利益”“相对抗”和“进行实际的斗争”的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这就既需要暴力，又需要对这种暴力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而且还需要“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意识形态，这就是国家。

第三，关于革命：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革命的根源：“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5页。

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他们还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②]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注意到资本主义通过其发展的“世界市场”而带来的“世界历史性”这一时代条件，因而没有简单地陷入“自然进化论”，而是强调，革命的发生，其根源是本国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冲突，但对不发达国家来说，这一矛盾的演化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他们指出：“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③]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性：“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④]它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共产主义运动是与大工业密切相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联系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冲突的必然结果；其二，共产主义运动与以往的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它要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即消灭自发形式的社会性分工、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消除异化劳动。

第四，关于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反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②而"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③。这就既超越唯心主义认为意识和精神是自主地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认为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

正因为意识是社会生活决定的，它起源于物质活动和社会交往而非单纯的物质或精神，因而意识将随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这一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性："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扩大，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后，"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②]。正是由于意识的这一相对独立性，产生了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使之得以可能"虚幻"地去构造自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颠倒地反映与社会的关系，并把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

由于意识形态同社会生活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特性，其一，它不管是否是对社会生活的颠倒的反映，它总是反映社会的物质关系："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其二，意识形态在内容上有其特殊性，即代表特殊利益，但在形式具有普遍性，即要说成是代表普遍利益：“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②]“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③]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以往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而强调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5页。

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①]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不蕴涵着价值理想，而是意味着，他们的理想不是从纯粹理性或道德批判中推论出来的“应当”，而是在对现实批判中揭示出现实矛盾及其所产生的解决现实矛盾的条件，由此所决定的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就超越了以往的所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对价值观的理论论证，真正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了。

### （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及其所确定的基本范畴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他们得以构建成同以往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新话语体系的方法论原则，那就是："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人类历史时，首先是把作为历史主体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人的活动当作研究对象，然后把人们在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区分为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并把物质关系作为精神关系的基础，再把物质关系区分为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并把生产力作为交往关系的基础，而把交往关系作为连接生产力和其他历史活动的中介。而所有这些活动的基础，则是实践。

由这一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赋予自己的"意识形态"以"革命"的本质："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此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①这就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话语体系的革命性。

至1859年，马克思在为自己早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序言》中，对自己形成的新的话语体系的基本逻辑，又作了更完整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

这样，马克思清晰地构建了以实践为核心概念的话语体系，其最基本范畴是：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物质生活包含了生产力和由此所决定的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由这些基本范畴构成的话语体系，是人类思想史上全新的话语体系。马克思正是运用这样一个话语体系，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为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阶级力量以及前途使命，提供了新的启示，使无产阶级得以掌握超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类解放的话语权。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 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话语体系的展开

中国共产党十分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还十分强调"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合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两者统一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而不是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论断。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其实质是观察和阐释实践问题和经验现象所涉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而它们则体现在构建其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及其内在逻辑之中。

### （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理论立场与政治立场的关系

说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我们毫不讳言它的阶级性，正如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①]问题在于，从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之间是什么关系？从理论创立者这一主体来说，马克思既不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本人也并非是产业工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共产党的领袖绝大多数均如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又是如何确定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追溯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厘清"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关系。

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受到过良好教育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的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的理论起点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政治立场则是革命的民主主义。然而，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工作期间所接触到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教训了马克思：国家（包括政治和法律）并不是由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理性”所决定的，而是由浸透了财产关系的市民社会所决定的。这样，马克思开始将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批判而展开了对欧洲思想文化的批判，从而确立了观察问题的全新出发点。他超越了单纯从物质或单纯从精神出发来观察世界的坐标，强调从人的实践出发看待世界特别是考察人类历史。马克思将作为人类历史起点的人的实践，确定为其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从而确立了其理论立场，构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

当然，马克思没有否认自然物质的“优先性”，否则他就不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表达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但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接着立即强调，不能赋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野以更多的内涵：“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②]长期来，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时，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恩格斯的这一提醒，而加上了“别的意义”，最突出的，是马克思话语体系中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野取决于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

对“精神，还是自然界是本原”的回答，放大为是对“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问题的回答，或者是对“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的回答。这会把马克思的思想禁锢在旧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了。因为如果世界都是物质的，或者单凭物质就能决定精神，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出发点，就只能是“物质”，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就根本无法超越传统的哲学。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的，是“世界在本原上是物质的”，正是物质世界的这一本原性，决定了人类需要去改造它，由此构成的“社会生活决定意识”，进一步的推论，则是“人们的物质关系，决定了人们的精神关系”。也正如恩格斯在文中所指出的：费尔巴哈拒绝为那种把世界都看成是物质的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因为“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人类的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①。

而马克思从实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物质世界，并没有使自然界的客观性成为疑问，而是以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如果把存在于人类实践之先或之外的物质世界称之为“自在世界”的话，那么，现实的物质世界就是通过实践由“自在世界”转化而来的。在这种转化中，自然界的客观性并没有丧失，丧失的只是它的自在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把现存世界包括自然界“当作实践去理解”的，确认由人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包括人与自然关系在内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所构成的现实世界，才是新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唯物”及“新”之所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动物以自身对环境的消极适应获得与自然的统一，所以动物只能消极地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以自身对环境的改造，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不断发展自己，所以人自成一类，构成了独特的人类存在。人类进化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与变异，而且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延续与创新，而这二者的统一正是在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

当我们从实践的视角去理解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时，这一现实世界已经不是与人分离的抽象的自然界，而是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类所创造的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①]。马克思还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②]这就是说，现在成为人类活动对象的周围感性世界，决不是那种开天辟地以来就有的原始的自然物，人类世世代代用自己的物质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界的原有形态，创造合乎人的需要的形态。

因此，实践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实践对理解现实世界、甚至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离开了实践，无法解释为什么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问题；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精神只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又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物质属性，而具有自觉的能动性的问题。因为物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

质世界本来并没有什么精神，只是在劳动实践中，猿变成了人，才有了物质发展产生的最美丽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精神是实践的产物，所以它一产生就具有某种积极的自觉能动作用，从此以后，自然界也就不断地被打上人们意志的烙印，同时，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象世界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入，因此，现实世界是一个随着实践而无限膨胀着的世界。

正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决定了马克思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追求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正如马克思自己清晰地表达的那样：“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②

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既包含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据此确立了通过消灭异化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价值目标；还包含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以及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思想，据此确立了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力量、无产阶级诉诸“武器的批判”以实现人类解放的使命的原则。这就超越了只是以理性为出发点从而将无产阶级视为被解放的客体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使马克思成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 （二）话语体系创立的必要条件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

以往，人们往往将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世界观的核心观点归结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等，将它们运用到认识论中，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到历史观中，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的误读。从逻辑上说，构成一个新的话语体系的核心观点，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其命题得以构成的范畴，是由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提出或赋予其科学内涵的；(2)由这些范畴构成的命题，是由这一理论的创立者首次发现并确立的；(3)这些命题同这一理论所要面对的未知课题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

以此观之，所谓"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等，均不足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观点。因为第一，得以构成这些命题的基本范畴，并非马克思确立或赋予其科学内涵的；第二，这些命题在马克思以前，早被提出并得以论证，即便是"质量互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关于运动的三大规律的思想，黑格尔也从概念的辩证法角度，对此有较系统的表达和展开；第三，仅仅从这些命题出发，逻辑上无论如何推论不出对马克思所要面对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工人运动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的回答。

既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实践是其话语体系最核心的范畴，那么，由这一理论立场和基本范畴所构建的话语体系的核心观点，显然应该超越"世界是物质"等观点，即使坚持自然界对于精神是本原的立场，也只是维护了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

作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观点，在不同研究领域，可以有不同的概括。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世界观的基本观点，最核心的应该是：(1)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2)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首先，这些观点是马克思破天荒地发现并提出的；其次，这些观点同马克思确立的科学实

践观具有内在的相容性，同马克思要解决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工人运动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具有逻辑的必然性。上述观点的总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论，社会结构论和社会发展论的统一，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主体的选择性的统一。依据这些理论观点，马克思揭示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变革要求这两条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并以此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揭示了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寻找到了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

可见，马克思话语体系的核心观点，是从人的实践出发而对人的实践规律的揭示。以往，人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普遍性，解读为从所谓物质运动的规律出发所揭示的五大社会形态依次“线性”更替的规律，并称其为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这就把社会发展的规律简单化了，即忽视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社会发展规律变成了“冷冰冰”外在于人的东西。

首先，马克思并不是从所谓“物质运动”普遍性来演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是从人的活动的现实性中来揭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

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正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使人们无法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便有了客观的规律性。但是，也正由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因而历史活动便具有主体性。马克思曾经把在历史中进行活动的人比作“剧中人和剧作者”，用以说明人是历史的客体和主体的统一。也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①]人们的一切历史创造活动，包括行为的方向、途径、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和手段等等，都离不开人的选择。在历史总趋势范围内，具体的历史变化总有多种可能性，因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有能动地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余地。在历史总趋势提供的多种可能性面前，哪一种可能性能实现，具体历史进程表现为何种态势，其时间持续的长短和空间延伸规模的大小，都与在特定时代、特定条件下的人的选择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正确的选择就尤为重要。

人们历史活动的选择的依据，最根本的是满足“需要”基础上产生的利益关系。正是人在实践中所产生的连续不断的新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而从事的生产活动，推动了历史前进。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利益关系，它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活动的动机。然而，历史发展并非因此造成无序状态，而是有一个总的趋势，因为它有一条内在的主轴在发挥作用，这一主轴就是占主体地位的人民群众的动机，正如恩格斯所说：“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①]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所谓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存在于人民群众对利益的追求及其实现的过程中。

其次，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思想，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般规律深刻考察的结果，而不是对整个世界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作公理化推论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制约人们目的和动机的社会生活条件，包括物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条件、政治条件和精神条件，它们又都是在人们的物质活动、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中创造出来的。这一系列条件的制约和创造活动的关系，就具体体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从一定意义上讲，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实质上就是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力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生产过程也不过是人的生活活动和和人的本质的展现过程。这样，人类社会活动的最根本的规律，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简要地表述”的“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那段话，概括地说，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变革要求”。可见，唯物史观阐述的这两大原理，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具体条件下，应该有不同的具体表现，不同的民族，在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更替中，永远不会走绝对相同的道路和实现完全一致的模式。

再次，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共产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同义词）取代资本主义的论证，是以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分析批判西欧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而非对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发展历程的经验归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生中对唯物史观的具体阐述有过变化，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有过修正，但是，他们始终坚持了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硬核”没有变。也正是由于他们运用这一历史观来批判西欧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才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社会力量和现实道路。他们反复强调，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

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只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通过“世界市场”而带来了“世界历史性”，从而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走向，因而马克思从欧洲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这一特殊性中，提炼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具有普遍性的总趋势。

但是，各民族的发展都有其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再申明：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因而没有“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3]，也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的具体蓝图，以及关于“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4]。“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阐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5]

### （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根本方法

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理论立场出发，以生产力、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群众等基本范畴而构建其话语体系，其所运用的根本方法，是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1—34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2—74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62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43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6 页。

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过“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化的语言，它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一种概括。当人们把实事求是解释成“一切从物质出发”的时候，事实上是对马克思话语体系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把人的“实践”而不是把脱离实践的“物质”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自己的方法论的最明确概括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很谨慎地避免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而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没有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而是称为“共产党宣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那时“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当时也有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了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①]。为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必须划清与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包括16、17世纪以莫尔和康帕内拉为代表的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18世纪以摩莱里和马布利为代表的“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及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伟大的空想主义者”)，以及与同时代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由于卡贝和魏特林等人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自由和谐的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7页。

会，但是，他们的重心，也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在于构建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详尽计划和方案，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把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归在一起，称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

事实上，公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原则，是空想社会主义早就确立的，马克思把它们继承下来了。仅仅凭借这些原则，并不足以构成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实现这些原则？怎么实现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理性”的产物，还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面对这些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显示出来了。

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是空想，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只是从道德原则出发作理性的而非现实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只是从人道原则出发表示同情而非依靠；对现存统治秩序，只是从改良原则出发主张渐变而非革命。因而，他们没能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以及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其根源，在于他们只是以理性原则来构想一个尽可能完善的自由王国，从而无法解释这样的事实：既然资本主义是如此不理性不道德，又何以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整个欧洲乃至扩张到全世界，因而也无法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

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强烈主张“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们多次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①“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①

总之，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应当确立的状况"去构想"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再以这一体系去衡量或裁剪现实，而是从现实的矛盾出发，揭示现实发展的趋势及其条件，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最根本的区别，因而就成为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最基本的方法。

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解读，我们也应该深入到实践的层面。正如恩格斯晚年在总结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新的发展成就中所蕴涵的方法论时所特别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②既然马克思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那么他的辩证法，首先是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具体体现为人的历史活动的辩证法，离开了主客体关系以及人的历史活动，来奢谈客观辩证法，只能陷入抽象的思辨之中。

**（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展开**

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民群众等基本范畴，以及"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新世界”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其具体展开，则回答了马克思恩格斯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工人运动向何处去？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的理论立场和基本范畴，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决定了他们回答这两大时代课题时，在内容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这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完整思想体系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鲜明的表达。正如恩格斯晚年所反复强调的："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或"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①这一话语体系的具体展开，包含了如下两方面的基本思想：

第一，对西欧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

其一，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在于其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

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封建的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被资产阶级推翻的封建贵族的利益，因此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半是挽歌，半是谤问，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②。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被资产阶级所抛弃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此它“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①]。总之，它们根本无视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因而成为“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时，既没有像资本主义卫道士那样，以所谓“自然法则”的残酷性来为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辩护，也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来空泛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道德现象，或者像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那样，站在历史的失落者的立场上来无端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而是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来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的。他们指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的束缚，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冲突，使社会生产表现出无政府状态，从而爆发了经济危机，其周期性的爆发，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无力再驾御社会化的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而承认它作为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这样，他们就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根源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

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还推导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两个决不会”思想，概括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2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同样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而确定的社会形态更替的物质条件的制约性。它与“两个必然”一起，强调同一个思想：生产关系(进而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凭人们主观的意志、愿望实现的；当一种生产关系还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是不会灭亡的；当某种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时候，它就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这种取代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新变化，指出股份制的产生和发展包含着“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①]，“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这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②]。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国家所有”现象的发展，都“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③]。但是，资产阶级并没有自觉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因为“联合生产”和“生产力的国家所有”，并不等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只有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才是对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完全承认。

其二，对旧世界的实践批判需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现存统治秩序只是从改良原则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5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发，主张渐变而非革命，因而找不到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和现实道路。而在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还有一种“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够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①。总之，他们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但根本目的是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中，揭示出了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和现实道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冲突，还突出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而“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②。这样，“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③。他们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覆盖了整个社会，其根本利益的冲突，最终要表现在政治斗争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其中暴力革命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主要形式。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3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这就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资产阶级可能的反抗，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使无产阶级争得民主。这一专政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阶级以使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

马克思晚年，还提出了“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意在说明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恩格斯还曾设想，暴力手段和和平手段是夺取政权时可以采用的两种方式，不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也不同，如果有可能和平获得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有利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当然，即使在这个时候，也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充分准备。恩格斯晚年还根据 19 世纪 90 年代欧美一些国家新的实践经验，提出以“民主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新设想，即在国体上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在政体上，可以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其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依靠少数天才人物拯救无产阶级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组织独立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组织方面体现在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目标方面体现在为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的同时又代表运动的未来，策略方面体现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理论方面体现在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对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这些定位，找到了凝聚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3 页。

领导无产阶级这一社会力量的核心。

以上三个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社会力量以及现实道路这三个空想社会主义没能解决的难题，使变革资本主义有了科学的指南。

第二，以西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为根据所发现的新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对新世界的发现，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谁对未来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一般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来表征未来社会，而恩格斯晚年则较多地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他们那里，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义语，为了在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语时不致产生歧义，本文一般用“未来社会”)的特征规定得更详细更具体，相反，他们认为，对未来社会的蓝图制定得越详尽周密，就越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尽管他们对新世界的发现，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成分，然而，由于他们的预测是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为根据的，因而其预测的重点方面，同样超越了对社会主义的“空想”，从而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这些预测主要有：

其一，未来社会的价值目标：“自由人的联合体”。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这一价值理想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恩格斯说过，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如下一句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表达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了，这句话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731页。

在每个人都摆脱了自然关系的奴役、社会关系的奴役和精神关系的奴役之后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社会。

其二，未来社会的物质前提：社会生产的高度发达。

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等思潮对资本主义造就的文明基本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建立共产主义“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①。这就是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达到的工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为物质前提，而且创造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发达的生产力作为自己的物质基础。

其三，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过渡时期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再到高级阶段。

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把未来理想社会看作是人类理性和永恒正义的表现，企图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符合这类观念的绝对完善的社会制度不同，马克思预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待无产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再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从而使社会能够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以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后，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也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应该以其成熟程度的不同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这些发展阶段的思想，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根本变革以及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的思想，强调了人类不可能由资本主义一步跨越到理想社会。

其四，未来社会是不断变革的社会。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超越了未来理想社会永恒不变的绝对完善的社会制度的观念，得出了未来社会是不断发展和变革的社会的结论。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并不意味着他规定了历史的“终极目标”，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如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①]恩格斯更明确地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仅仅是人类史前史的终结，同时又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端。

其五，关于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

作为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未来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从区别于造成资本主义危机的制度特征，以及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价值目标两个方面，预测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具有的总体特征。在社会经济方面消灭私有制，其基本途径是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即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② 《马克思恩洛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化以后，逐步将其回归社会所有，即实现社会所有制，使之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在此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并逐步实现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转变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这一过程中，阶级将被消灭，旧式分工和一切社会差别将被逐步消除，国家将逐渐“自行消亡”，每个人将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中，由于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经验，在批判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工作中，难免会把某些未经清理的空想因素吸收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①]因此，后人不应离开时空条件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西欧当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过程中形成的对未来社会构想的某些具体论述，而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不可动摇的范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 第三章
#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演化

本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演化。为了适应经典自然科学和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时代条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作了创新，从而掌握了俄国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语主导权。列宁去世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所形成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其意识形态的根据，是历史发展线性的"铁的规律"，这一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是"物质"运动决定人类历史活动。它起到了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的作用，但也是造成社会主义模式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源。

## 一、经典自然科学危机和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特别是他们逝世后，欧

洲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相应地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依据这些变化，开始“修正”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话语，而用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话语来指导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但他们的理论却在帝国主义所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面前破了产。列宁则与第二国际分道扬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的基础上，依据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的变化，调整了一些重要话语，指导了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和理想向现实和制度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一世纪之交时代发生的最重大变化，莫过于欧洲近代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科学革命所引发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并导致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从而促使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变化，即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由此激化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同欧洲近代史上的科学革命直接相关，同时这一科学革命本身又提出了对待客观世界的哲学路线问题，这两者都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构成了挑战，而列宁正是在回应这一挑战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演化的阐述，将19世纪末自然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经典物理学的危机和革命的酝酿作为历史起点。

### （一）自然科学发展导致的经典物理学危机所引发的哲学解释

长期以来，列宁在1908年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被视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并为批判第二国际及其以后的修正主义、创立列宁主义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则是对俄国波格丹诺夫等马赫主义者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要客观评价列宁的批判的价值，

需要将马赫主义产生的自然科学背景作一番叙述。

19世纪中叶，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取得辉煌的时期，它显示了经验科学的强大力量，使得自然科学家要求摆脱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束缚的呼声日益高涨，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又将“形而上学”发展到极致。于是，对传统的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哲学的超越，便有了三种形态：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二是回归人的内在价值的生命哲学，三是把哲学拉回到经验基础上的实证主义。

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提出了改造旧哲学的任务，但他们并未实现这一任务。因为经验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唯理论还不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但是，到19世纪下半叶，数学和物理学的重大发展暴露了经典自然科学理论内部的矛盾，其一是非欧几何的诞生与欧氏几何的矛盾，其二是光学、热力学和电磁学的发展与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矛盾，它们动摇了唯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马赫和彭加勒直接感受到这种冲击，因而他们第一次试图变革关于科学认识的本质和基础的旧的观念。

“公理自明、逻辑严密、体系相容”，是唯理论所主张的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标准。唯理论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是欧几里德几何。欧氏几何五条公理看来那么“自明”，其体系的逻辑那么“严密”，体系内部相容，其结果又与现实符合得那么好。然而，长期以来，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即平行线公式：“过直线外一点，能够且只能够作一条直线与该直线平行”）的“自明性”，却始终遭受到人们的质疑。数学家终于以与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相反的公设作为公理，而推演出的几何体系，与欧氏几何一样，同样可以说是“公理自明，逻辑严密，体系相容”。这样一来，数学家发现，他们所能证明的只是数学蕴涵关系，即“如果—那么”的关系。他们不再认为

存在绝对正确的理论了，于是唯理论的主要自然科学根据之一便进一步被动摇了。而与此同时，旧唯物主义经验论关于“理论是对客观实在的绝对模写”这一观点也被动摇了。

19世纪中叶，借经典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而发展起来的经典物理学体系，反过来冲击了牛顿经典力学的基础，暴露了牛顿经典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某些局限性。其一是光学。按经典力学原理，光如果是微粒，就有质量和广度，但光被吸收后，又变成什么呢？光如果是波，则它有媒介，但这种媒介（假设为以太）既充斥全宇宙又绝对静止，密度又极小，小到毫无阻力，这又与经典力学的观念相矛盾。其二是热力学。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与热现象有关的物理过程具有不可逆性，但经典力学认为力学过程的可逆性是普遍的，特别是热力学的统计性质，也与经典力学的机械决定论相矛盾。其三是电磁理论。牛顿力学的“超距作用”拓展到物理学各领域，但是，麦克斯韦建立的电磁理论表明，电磁作用是通过电磁场（或以太）以有限速度传播的。经典力学中粒子是能量的唯一载体，但电磁理论中连续的场也具有能量。在电磁理论中，光的传播速度是常数c，这也与使牛顿力学相矛盾。

19世纪上半叶以前，由于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就，人们对牛顿力学和牛顿的崇拜达到了迷信的程度，牛顿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被人为地打上了“思维的必然性”、“先验地给予”等烙印，使它们成了永恒真理而完全忽视了它们的经验基础，如同欧氏几何公理一样。但是，牛顿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终于使极少数科学家和哲学家率先怀疑牛顿经典力学概念和原理的先验性质，以及对它们的唯理论解释。

马赫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背景下产生的。马赫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马赫接受孔德的实证主

义原则，强调科学要基于感觉经验。同时，他进一步认为，客观世界只是“感觉的复合”，而感觉则是“中性要素”，既不是如唯物主义所说是物理的，也不是如唯心主义所说是心理的，科学的认识，就是分析这些“要素”及其联系。

基于这一基本思想，马赫以其“感觉经验”为标准，对牛顿经典力学基本概念的“形而上学”的“先验”性质作了批判，其批判的结果，是认为“原子是假设”，“相信有原子存在并不比相信女妖存在高明多少”。他还认为，牛顿的质量概念(即“物质的量”，它等于体积×密度)是缺乏感觉经验基础的“循环定义”。他还揭示了作为牛顿力学观念基础的“绝对时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因为在经验中只有相对空间和相对运动。对于这些批判的结果，爱因斯坦曾经评价道：马赫依据经验论原则，把那些被“放到虚无缥缈的先验的顶峰上去”的基本观念，一个一个地“从先验的奥林帕斯山上拉下来”，揭露出了“它们的世俗血统”。

基于这一思想，马赫还对经典力学基本定律的机械性进行了批判。马赫认为，经验世界中只有相对性，而无必然性。因此，自然界没有一一对应的必然性，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在批判牛顿经典力学两方面“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马赫提出了他的科学认识的本质的理论，即函数关系论。他认为，感觉以外的物理学概念都不能反映客观实在，而只是解释经验现象的假设，而科学理论则是对感觉要素之间关系的函数描写，(如同几何学的“如果——那么”关系)。世界本身不存在所谓的机械的唯一的普遍必然性，因而这种科学认识也并不是对客观世界本质的反映。马赫的这一思想，既区别于唯理论，因为他认为认识的基础是经验；又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经验论，因为他认为认识并不反映客观的世界本质。由于感觉经验的相对性，以及对“决定论”的否定，故这种函数关系

描述不是唯一的。既然如此，人们对科学认识就不存在十分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评价标准，而只有优劣的选择标准，这一标准就是"思维经济原则"：最简单性的描述是最方便的，因而是最优的。

如果说，第一代实证主义还承认感觉经验是对经验以外的客观世界的反映、且这一反映具有唯一性的话，那么，作为第二代实证主义的马赫主义，则否定了感觉经验同客观世界的联系，并认为科学认识对感觉经验的描述并不具有唯一性。这一思想的产生，既是对经典物理学发生危机而作出的一种反应，同时，它对牛顿经典力学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批判，在物理学家中间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导致了对经典物理学的科学与哲学基础的生气勃勃的讨论，因而被誉为"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但是，马赫主义在抛弃机械论和先验论的同时，也抛弃了整个的唯物主义基础，这是他的致命弱点。正是对这点，列宁作了详尽的批判。

马赫之后，对物理学危机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是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称为"卓越的物理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彭加勒。在20世纪初，彭加勒以其"约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发挥了马赫主义。如果说马赫主义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危机的准备时期，那么彭加勒约定主义思想产生的自然科学背景，则是20世纪初自然科学危机的爆发。

世纪之交是物理学危机和物理学革命交织的时期。物理学和经典力学理论的一些内在矛盾虽早已存在（如前所述），但人们只不过把它们看成是经典物理学还需要完善的表现。马赫批判了牛顿经典力学的基本观念，但这也主要是在理论上的批判。而两个重要的实验事实与经典物理学的矛盾的出现以及随后涌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终于导致了经典理论的危机。这两个重要的实验事实就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迈克尔逊—莫雷

实验排除了以太的存在，实际上从实验上否定了牛顿力学体系的绝对时空观；而黑体辐射实验所产生的公式，可能推导出物体辐射在短波部分会产生无穷大的能量。这使人们进一步怀疑经典物理学的可靠性。世纪之交，还有 X 射线的发现，铀元素的放射性的发现，电子存在的确证，放射性元素钋和镭的发现，元素嬗变理论和原子有核模型的提出，等等，彻底动摇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

彭加勒正是在物理学“危机”爆发的基础上，发展了马赫的思想。他认为，科学认识的真，现在既不能被理解为它是符合客观实在的，甚至不能再被理解为它是符合经验事实了。因为经典物理学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符合经验事实的，但现在又出现了违背实验的情况。因此，“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同时，科学定律也很难说它们是起源于经验的还是先验的。既然如此，科学定律便是一种“约定”，而无所谓真假，因为它不能被普遍的经验所确证或完全否证。既然科学是“约定”，那么选择的标准就应归结为在经验中是否有用以及用起来是否方便。

彭加勒把科学定律完全看成是“约定”的观点，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批判。但无论从哪种角度进行批判，一般对认为他否认了知识的客观真理性而陷入了相对主义。因此，彭加勒的观点为 20 世纪的各种倾向的科学哲学家所拒绝。

### （二）自然科学发展引发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变化

19 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新发展，特别是电磁理论和新的热力学理论的诞生，一方面导致了经典物理学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又很快转化为新的技术，引发了欧洲近代史上以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它的社会意义在于，“科学研究开始走到实际的应用与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与

发明。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①。第二次技术革命带动了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欧美和其他一些国家，掀起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浪潮，18世纪开始的以轻工业为核心的产业革命，让位于以电气化和内燃机的使用为中心的重工业革命。

第二次技术革命引发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第二次产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国家所带来的变化，不只限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更体现在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上，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垄断现象的出现。技术的不断进步，重工业的不断发展，企业规模的极端扩张，使资本日益集中于少数大企业，逐步形成垄断资本。在工业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发展的同时，银行资本的集中也在进行，并且与工业资本紧密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建立起金融帝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起来，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一方面使生产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生产资料更加集中，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了。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工业革命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同样是如此，这不仅加剧了原有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加剧了资产阶级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和资本的集中和兼并而导致的矛盾的尖锐化。

---

① W.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83页。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还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矛盾。由于重视技术革命和大力发展垄断组织的德美日等国迅速崛起，生产能力超过了固守成规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曾经是“世界工场”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开始从原来独领风骚的世界霸主地位跌落。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资本输出和新的国际垄断同盟形成，同原有的世界领土和势力范围被瓜分完毕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走向垄断的同时，更加紧了争夺世界市场和势力范围的竞争，掀起了殖民扩张的新高潮。它们通过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输出资本，抢夺资源和倾销工业品，使广大落后国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客观上加快了这些国家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和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但这是以这里人民的极大痛苦为代价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加剧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而且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新的经济地位与旧的国际格局之间的不相符，使资本主义各国不可避免地要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展开激烈争夺，对殖民化的争夺引发的大国间的冲突和战争，如1898年的西美战争，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等等。这些冲突和战争，表明资本主义结束了它的和平发展时期，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即将到来。从1914年开始，资本主义进入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大动乱时期。

资本主义的危机，既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给人类文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坚持和发展，正是在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导致的危机的背景中，而得以实现的。

## 二、列宁的话语体系及其对俄国革命和建设话语主导权的掌握

对于上一世纪之交自然科学因危机而爆发的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因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而产生的危机，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都作出了反应。这些反应客观上渗透到工人运动内部，对工人运动乃至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途径和前途等重大问题，都产生了消极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列宁根据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使之能更灵活地应对实践的发展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更好地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和策略方针，从而掌握对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话语主导权。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丰富发展，总体上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提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和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命题；其二，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提出了落后国家一国可以胜利的理论；其三，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提出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

### （一）意识形态话语：哲学的党性原则和科学的意识形态

马赫和彭加勒依据19世纪下半叶起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材料，对牛顿经典力学中的“形而上学”概念和思想提出的批判，对科学认识的本质和基础认识的深化，是有其积极价值的。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作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列宁的主观条件，他毕竟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新的发展及其所提出的哲学问题，没有作出更全面的分析和批判性思考。今天，指出列宁的这些局限性，并进一步分析造成这些局限性的原

因及其对斯大林的僵化的话语体系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必要的。

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列宁对马赫和彭加勒的相对主义批判的积极意义。第一，列宁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可能对工人运动的思想理论产生的消极影响，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第二，要完整地解读列宁的话语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丰富和发展，还不能忽视列宁在此后所写的大容量的《哲学笔记》。因此，今天，重新评价列宁主义话语体系的价值，不仅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演化环节的需要，也是我们今天充分认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重要性的需要。

马赫主义和彭加勒约定主义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材料，否定了从客观物质出发到感觉经验再到认识的路线，否定了按照这一路线所达到的认识所反映的世界的客观真理性。但是，它只能说明，科学认识的真理性并不完全来自于感觉经验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这一思想，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早已通过哲学批判而达到了。见本书第二章）。然而，马赫也好，彭加勒也好，都试图割断感觉经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以感觉经验来判断认识所能达到的一切，这必然坠入相对主义。就马赫来讲，有两个问题对他是极为棘手的：(1)暂时不能感觉经验到的东西，并不等于不是客观实在。如果承认经验的相对性，就应该承认它的暂时性、发展性，既然如此，随着感觉经验的发展，有些科学概念所反映的客观物质的实在性，目前只是一种假设，但可能今后被感觉经验到。如原子，到 20 世纪，它的存在就不只是一种假设，而是实在了。(2)科学理论中包含的许多观念并不能都还原为感觉经验。例如“无限”等，还有数学关系等。但是，它们反映着一定的客观关系，否定了人同世界的实践关系，就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时空的客观性。

在对马赫主义的批判中，列宁强调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野。指出哲学上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派别，是恩格斯晚年对哲学基本概述的理论贡献之一。列宁在继承恩格斯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哲学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最新的哲学像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①]。党性本身是一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概念，列宁把它引入哲学领域来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更加强调了哲学上被那些折衷主义者弄得含糊不清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野。

列宁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两个基本党派。他说道："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繁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②]应该注意到，列宁这里依然是肯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野，是关于物质和精神谁第一性，而并没有超出这一范围。正如他强调的："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③]同时，他还强调："生活、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109页。

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①]这同马克思主义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并不能因为列宁根据当时思想斗争的需要，而突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野，就解读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倒退回了旧唯物主义。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列宁在此后所写的大量关于辩证法的哲学笔记，更能前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列宁的思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始终坚持一个重要思想，即实践观点的基础地位。他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②]在谈到黑格尔关于范畴对思想进程的重要性时，列宁吸收了黑格尔的这一观念，认为范畴是认识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但他把黑格尔认识范畴是绝对精神的产物观念倒了过来，而是实践的产物，“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③]。认识范畴的产生，既不是精神世界自身的产物，也并非物质世界自动赋予人类的，而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④]。具体地说，认识范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化：“逻辑的范畴是‘外部存在和活动的’‘无数’‘局部性’的简化(在另一个地方是‘抽引出来的东西’)。这些范畴反过来又在实践中(‘在活生生的内容的精神制作中，在思想的制造和交流中’)为人们服务。”[⑤]列宁的这些思想表明，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是，真正决定精神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0页。
③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页。
④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
⑤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6—87页。

内容的，并不是物质，而是人们的实践活动。

当然，列宁此时突出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野，是为当时的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划清哲学路线上的根本分歧，以免哲学上的折衷主义打着最新自然科学的旗号，侵蚀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而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为此，在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问题上，列宁还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①。进一步明确了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阶级倾向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宗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③。

列宁强调哲学党性原则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即为了洗刷马赫主义在俄国的泛滥，批判诸如波格丹诺夫的折衷主义。而折衷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标榜"中立"，极力宣扬哲学上的"超党派"性，企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列宁认为，哲学上的折衷主义是介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它们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混合物"，而不是异于两者的第三种东西，不是"化合物"。对于这种糊状的"混合物"，如果仔细分辨，仍然可以辨别出哪些是唯物主义的成分，哪些是唯心主义的成分，尽管它们会有各种不同的比例，有时强调这种混合物的这一因素，有时主要强调它的另一因素。

---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1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9 页。

肯定哲学的党性原则，并不是把哲学等同于或附属于政治。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它与阶级、政治的关系不像政治经济学、法学一样直接、集中、明显，而是经过迂回曲折的过程。同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根源也是极其复杂的，仅仅从政治、阶级层面去说明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道：哲学党派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既然是"归根到底"（列宁并未肯定比此更多的内容），就不应该直接以政治去说明哲学，就不应该把哲学的术语、体系与社会的阶级结构直接等同起来。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经感叹过的那样："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聪明的唯心主义这个词可以用辩证的唯心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愚蠢的这个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动的这些词来代替。"[①]如果把哲学倾向与社会的阶级对立直接等同，就是对列宁哲学党性理论的庸俗化理解，正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一样。

事实上，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做了必要的切割。如列宁在政治上把普列汉诺夫当作论敌，但在哲学上却当作批判共同敌人的盟友。相反，当时俄国一些在政治上"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比如波格丹诺夫，却在哲学上充当了马赫主义的俘虏。列宁为了澄清非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不良影响，对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路线作了无情的批判。而且列宁对他们的批判也是旁征博引、有理有据的，即使对折衷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的一面，也加以积极的肯定。而且，列宁并非简单地把马赫主义者都看作是资产阶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5页。

级的辩护士，而是看到了马赫主义与当时的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危机有密切的关联，特别指出了其认识论根源："马赫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派别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论的崩溃的影响下，在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了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①

当然，列宁也并非把哲学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完全割裂开来，他意识到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的泛滥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党的领导人和革命群众中的号召力和战斗力，进而影响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资产阶级也必然会利用唯心主义去消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消解他们的革命要求。列宁因此还提出做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口号，号召广大干部群众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俄国的革命和建设。至于后来有人把哲学党性原则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当作空无内容的标签滥贴，并不符合列宁的本意。

列宁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同他一直坚持不同思想体系的阶级性思想是一致的。他一直担忧自发的工人运动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甚至控制。还在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前，他就竭力呼吁工人运动要避免自发性，必须接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灌输"。他指出："既然谈不到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会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

列宁不再一般地谈论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他认为，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辩证统一。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就不是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是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适应社会历史潮流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与历史上一切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的虚假的意识形态的不懈斗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能够真正地得到发展。可见，在列宁那里，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已变成了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了。

总之，列宁的党性理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不可调和性，有力地抵制了非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对第二国际的以唯心主义历史观武装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有力的打击。这些对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 （二）革命时期的话语创新：落后国家一国胜利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的挑战：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何在？无产阶级革命是否一定要在发达国家首先爆发而且同时胜利？列宁在领导俄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继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的可能性后，又提出了落后国家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思想。这些新的话语的提出，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6—327 页。

命将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首先胜利和“同时发生”的理论，从而为准备十月革命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武装了俄国工人阶级。而这些新的话语，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分析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成果，又是批判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思想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前提，而这又是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因此，在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坚持资本主义制度并反对别国搞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某个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并发展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是不可能的。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①恩格斯在 1848 年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也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②当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面对俄国出现的民主革命形势的局面，曾认为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制度革命的爆发，将推动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还得依靠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帮助，才能获得胜利。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列宁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以列宁对帝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1 页。

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揭示为根据的。

第二国际后期的“中派”领袖考茨基对垄断资本主义曾经作过研究和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垄断资本主义是“超帝国主义”，因为它将实现各国金融资本的联合，组成世界统一的托拉斯，从而可以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此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政策，使它们可以减弱对工人的剥削和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于是，无产阶级也可相应地通过“和平的、经济、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通过“人道主义和民主的道路”，取得议会多数，来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则在《社会主义与战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文中，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作了深刻揭示，得出了与考茨基完全不同的结论。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不仅没有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在更高层次更残酷的展开，使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国内，它不仅加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还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在国际，它不仅加剧了帝国主义同殖民地人民的矛盾，还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可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的话语，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的思维框架，而没有脱离马克思的基本话语。

列宁进一步指出，由于上述矛盾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加剧的，因而资本主义发展上的不平衡，就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垄断程度的提高，使得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能迅速地、跳跃式地赶上和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而由于世界领土和势力范围已被瓜分完毕，于是，必将发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争夺的战争，它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历史机

遇。与此同时，也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各国夺取政权的时机不可能同时成熟，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内获得胜利。正如列宁1915年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所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①可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的话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话语体系。

"一国胜利"论提出之初，列宁并没有立即得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1917年二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此后，俄国能否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已成为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提上了日程。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以及对俄国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较有经验和统治手段较完善，工人阶级上层容易被统治阶级的高额利润收买而被贵族化，工人阶级与农民关系也较松散，相对而言，落后国家则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因为其资产阶级统治缺乏经验和手段，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较强，同农民也易于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落后国家首先突破。运用这一思想，列宁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作了具体论证。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列宁指出，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它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矛盾，又具有自身的特殊矛盾。俄国的资本主义是同封建农奴制残余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①]，它对外国资本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又长期实行集权的君主制，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决定了俄国必然存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在经济方面，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与农奴制残余的矛盾、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发达工业地区与落后边区之间的矛盾；在政治方面，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国内被压迫民族同大俄罗斯主义的矛盾、各族人民大众同专制制度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存在，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又使劳动者状况无限地恶化。

列宁还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的卷入，俄国同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加剧，也使国内各种矛盾更加激化，俄国已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和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战争使俄国工厂倒闭、农田荒芜、通货急剧膨胀，力量消耗殆尽，经济全面崩溃。不可避免的灾难和饥荒威胁着俄国，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能从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实际出路，“现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②]。这使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

① 《列宁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0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7 页。

为此，列宁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以这一既深切把握俄国社会矛盾，又透彻把握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迫切需求的话语，掌握了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把大多数人吸引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中来了。

在当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一国胜利”甚至在“落后国家首先胜利”的思想，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的。普列汉诺夫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当时就说列宁是在“说梦话”、“发疯了”，其依据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而列宁在其晚年的著作中，通过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总结，批驳这个在表层话语上固守马克思的教条主义思想。

首先，列宁认为，落后的俄国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确实有一定的偶然性，即它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但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可以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这又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所决定的，因此，十月革命是具有必然性，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提供了“导火线”，这表明，面对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工农群众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奋起斗争，充分发挥了历史的主体性，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胜利，同时，对于俄国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及无产阶级数量和质量上的一定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经过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二月革命这两次民主革命的锻炼，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开始成熟起来。

其次，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

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你们在哪本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呢?"[1]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在发展程序上与马克思设想的不同:不是先工业化、现代化,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业化和现代化。列宁对此的解释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

再次,列宁提醒,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一国胜利"后,巩固革命的成果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任务更为困难和艰巨,他多次指出:"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3]因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毕竟没有发达资本主义所提供的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政治上缺乏民主的传统,文化上充斥着文盲,国际环境上处在经济科技文化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十分强调要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加强同世界的联系,"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4]。

历史的发展表明,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一国胜利"的话语,经受了考验。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多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之前,这同马克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3—794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思设想的顺序是不同的。而其背景之一，是帝国主义造成了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这些落后国家中纷纷流产，从而在那些工农力量空前增强的国家，造就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背景之二，则是帝国主义战争，促成了这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矛盾尖锐化。

### （三）建设时期的话语创新：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即在俄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根据自己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落后国家一国胜利"可能性和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艰巨性的思想，对此作了艰苦的探索，并以其特有的话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话语。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以经济文化落后的事实判断为思考的基点，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理论的推测。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概念，同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过程，先要经过一个革命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剥夺剥夺者"，即"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当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消灭私有制后，社会即进入共产主义，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成熟程度的差别，共产主义又可分为"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十月革命一胜利，党内就存在着要求制定措施尽快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列宁已意识到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艰巨性，因此把这些要求斥之为“胡说八道”。列宁认为，根据俄国当时的情况，不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需要经过一系列小的过渡，逐步走向共产主义，他指出，“目前我们俄国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但是“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需要经过多少阶段”①。为了使全党保持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冷静态度，列宁进一步将马克思的话语具体化，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并且设想，社会主义还能够区分为初级、发达、完备等不同的发展形式。

还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持谨慎态度：“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即过渡到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立即把全国所有银行并成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②，等等。此后，列宁还更明确地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既没有必要立即消灭私有制，也没有必要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可以在土地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等条件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把这种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称为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并把社会主义经济设想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依次实施了土地、银行、外贸和大企业

---

①《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

的国有化，并实行了工人监督等措施，使苏维埃政权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然而，当工人监督机构和企业主之间发生冲突时，其结果往往是宣布工厂收归国有，但由于还没有可能立刻从工人中培养出内行的领导，企业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从而加剧了经济的混乱。面对这一局面，列宁于 1918 年春天提出了更加谨慎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新计划，强调"现在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剥夺剥夺者，不如说是计算、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①。提出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不等于社会化"，建议放慢剥夺剥夺者的速度，反对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等等。

然而，1918 年夏天，俄国爆发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使"苏维埃处在危急中"，列宁关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也成为泡影。为了应付战争局面，巩固苏维埃政权，俄国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是：(1)企业全部国有化；(2)生产由国家实行集中管理；(3)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由政府规定农民消费所需粮食和种子粮，其余全部上交国家；(4)贸易实行国家垄断，禁止自由贸易，国家实行原料和产品的统一调拨，以及居民消费品的统一配给；(5)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制剥削者参加体力劳动。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对于粉碎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列宁后来所说："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②但是，由于环境的恶劣，加

---

①《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8 页。

②《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02 页。

上这些措施实现的干脆利落，使党内和苏维埃政权内又激发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度热情，人们（包括列宁）设想通过这套政策更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本来是在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采纳的“非常措施”，被当作走向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政策，而在战争被平息以后继续推行，终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到1921年春天，在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关头，农民危机、工业危机、政治危机立即出现。由于对继续推行“余粮征集制”的不满，再加上灾难性的干旱导致了一场大饥荒，使农民暴动四起。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原料供应严重短缺，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1921年2月28日，在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水兵暴乱，参加者多是刚穿上军装的农民，它表明，国内存在的不满情绪已经严重到了危及革命政权的程度。列宁后来对此教训的总结是：“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①“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②因为它脱离了俄国的实际。

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21年起，列宁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开始，实施了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1）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这意味着纳税以后的余粮归农民自由支配，它立刻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2）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如个别小企业恢复私营，除大型企业为，大

---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

多数企业实行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租借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等等；(3)改变工业管理方式，实行企业的经济核算；(4)适当开放市场，发展商业和有组织的商品流转；(5)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这些政策的实施，曾经被有人视为“似乎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但是，仅过了一年，俄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就明显好转，到1925年，就基本恢复了国民经济。对此，列宁作了深刻的总结，在其晚年，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

第一，要根据经验而不是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不能按照革命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而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为此，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个人利益问题，即如何把个人利益同共同利益正确结合起来。列宁既肯定了革命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热情的巨大作用，又指出单靠热情和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得出了必须关心个人利益的结论。新经济政策就是从如何对农民个人利益的思考开始的，列宁说：“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进一步则“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①]。二是市场和商业问题，即如何在国家的正确调节下活跃市场和商业。列宁认为，“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582页。

调节。""这是完成任务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①]而这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列宁强调,这些重要的改变,表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②]。"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③]

当然,不能列宁提出要活跃商业和市场的思想,我们就把这一思想拔高到列宁已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话语。因为第一,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中所包含的这些思想,均适用于十月革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列宁并非在探索如何建设发达的、完备的社会主义。第二,列宁在思想上,依然认为,商品生产属于资本主义,只不过作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使用,而不能尽快消灭,自如列宁所说,"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④]。

第二,在经济建设上,落后国家必须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的国家该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然而,十月革命后,经济落后的俄国,不可能立即从社会化大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同他们交换粮食和原料,为了发展经济和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

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全部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首先应当尽可能明确到想到，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范围内，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将是怎样的，而且可能是怎样的”[1]。这就是说，对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来说，一定程度和一定期限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的前途，又不能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就需要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统治秩序里，利用和发展商品、市场关系来活跃经济，并培养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他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迂回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包含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列宁还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建成社会主义，还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否则就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他强调，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他还用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来进一步说明向资本主义学习的意义和主要内容：“乐于吸取外国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而列宁关于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政策思想背后，蕴涵了他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505页。

② 《列宁文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页

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战略关系的思想。他认为，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是因为“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①]。“同社会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②]列宁这一对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作历史评价，而并非基于抽象的理性而仅仅作道德评价的。

第三，在政治建设上，有步骤地发展民主，加强人民监督，防止官僚主义。

列宁晚年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经验从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认为共产党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到领导国家建设这一地位的变化，客观上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诸如“适应群众”、“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责”、“加强集体领导”、“加强党的监督”等要求。

首先，列宁提出调整党同领导对象的关系，使党的上层适应群众的思想。

针对国内战争结束后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造成的危机，列宁尖锐地提出了党的政策选择的出发点“是党的上层去适应它的群众，还是相反”[③]的问题。所谓群众适应党的上层，就是“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④]。这就依然如同共产党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0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570页。

在领导革命时那样，把先锋队的要求自上而下地直接“灌输”给工人运动，但列宁后来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因为现在共产党领导的是整个国家，它要面对是全体人民群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经常爱谈论‘我们’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却没有明确地想到这个‘我们’究竟是指谁。……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为了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1]他还指出：“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一家拥有良好发动机和第一流机器的上等工厂，如果发动机和机器之间的传动装置坏了，那就不能开工。”[2]

所谓党的上层适应群众，即只能以满足群众个人利益要求的方式来引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人民、全体劳动群众认为，对他们最重要的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使他们能看到情况确实有改善，并且符合农民的需要和习惯。”[3]为此，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应当生活在工人群众之中，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正确无误地判断群众的情绪，判断他们真正的需要、愿望和想法，能够不带半点虚假拔高成分来确定群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50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众的觉悟程度，确定这样那样的旧偏见和旧残余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能够用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满足群众的要求，以此赢得群众的无限信任”①。

其次，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同时，列宁更多强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思想。

列宁建议党的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确立集体领导体制。为了防止因中央书记权力过大而削弱集体领导，他强调中央书记只执行中央作出集体决议的，即由组织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出决议的那些任务。列宁还提出，集体领导要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列宁去世前一年，多次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列宁对他一旦去世后党和国家将面临怎样的危险的思考。他担心党的领导集体中因各个成员的个人性格和品质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将导致党的不稳定甚至分裂，因此，他对当时党的几位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和托洛斯基都作了评述，寄希望于集体领导的加强和民主集中制的健全，使各人的性格缺陷能得以弥补，不致因日后领袖人物之间的某些分歧和冲突而造成党的分裂。

1921 年在列宁主持下召开的党的十大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要求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党的工作制度必须由“战斗命令制”改为“工人民主制”，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党内一切机关均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制，党内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党的决议未通过之前，要展开广泛的讨论，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决议一旦通过都必须遵守和执行。

---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26 页。

列宁还萌生了扩大党的中央委员会，并将中央委员会发展为每两个月开一次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设想。他在1923年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中提出："我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它现在平均每两月至多开会一次，至于日常工作，大家知道，则由我们的政治局、我们的组织局、我们的书记处等等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我认为，我们应当走完这条已经走上的道路，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①

再次，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强调加强党内监督和改造国家机关的思想。

鉴于苏维埃政权从旧政权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官僚主义，鉴于党员在担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工作后，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和党组织的监督，就会产生官僚主义，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强烈主张健全党的监督制度，从上至下地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列宁的基本思路是，将中央监察委员会自上而下的监督，同工农检查院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扩大监督权限，提高监督水平。

在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权限方面，列宁提出监察委员会应该由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因此它应该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即保持自己对中央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以后，他又提议成立党的地方监察委员会，各级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会平行。1923年，列宁又建议增加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9—780页。

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列宁还提出："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①

在提升监督水平方面，列宁提出改组工农检查院，即减少人数，给予高薪，提高专业水准和专业化程度。列宁建议："应该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 300—400 人，这些职员要经过专门考查，看他们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

列宁认为："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工农检查院因此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走上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为了在以下两方面正确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一方面，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②

## 三、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意识形态根据及其核心话语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其主观原因，

---

①《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80 页。

②《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80 页。

在于斯大林所构建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体系，其核心话语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它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铁的规律”，因为这是由“物质运动”所决定的。由这一意识形态核心话语所构成的话语体系，其产生的客观根据，是为斯大林推动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作合理性辩护。而由于苏联共产党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的地位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巨大影响，使得这套话语体系一直被受第三国际影响的共产党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统，它对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战后取得政权并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但同样，由于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僵化，使这些国家（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没有更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优越性。深刻揭示影响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如何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无疑有重要的启示。

### （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及其主客观原因

1924年1月，列宁与世长辞。一方面，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苏联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另一方面，当时的苏联依然处在严峻的历史环境中：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干涉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在国内，现代工业比重仍然很小，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经济结构中依然占主导地位，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和物质基础并不十分稳固。于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怎样建成社会主义？建成怎样的社会主义？便成为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党内许多人一样，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临时措施，试图尽快结束新经济政策，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为此，斯大林在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

义”的争论中，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为了给这一理论提供逻辑依据，斯大林区分了“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获得最终胜利”两个命题，在“建成”和“最终胜利”两个概念上做文章，使得否定后一命题，并不必然否定前一命题，从而既可以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是世界性的设想保持衔接，而又通过对前一命题的肯定回答，为逐步取消新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根据。正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很短时间里，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

在斯大林主导下，1925 年 12 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声明，“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①]，为此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并把工业化的中心，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保持发展高速度上。斯大林强调，如果机器设备不能自己生产而依赖进口，就等于让苏联隶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为此，需要在 10 年内缩短同工业化先进国家落后了近百年的差距；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保持发展高速度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依靠三个途径：一是国营企业创造的利润；二是农民交纳的税赋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收益；三是人民节衣缩食，将消费资金转化为建设资金。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不断推进，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实际利益，从而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对此的判断是：这是农村资本主义利用新经济政策对他们的退让而向苏维埃政权发动的进攻，它说明个体农业经济已无法满足工业化对粮食、原料和资本积累的要求，因此，必须加快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① 《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09 页。

以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于是，1929 年斯大林宣布中断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方针，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①]接着，斯大林又发表了关于消灭富农的讲话，一场自上而下的集体农庄运动席卷全国农村。1935 年，苏联集体农庄制度得以全面确立。它基本上解决了多年来困扰苏维埃政权的商品粮供应问题，也为国家工业化的资金积累作出了贡献，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阶级结构，为苏维埃政权对农村的管理提供了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集体化运动挫伤了诸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苏联的农业受到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同时，工业企业国有化的程度也迅速提高。至 30 年代中期，国营工业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 92. 76%，私人商业成分被彻底清除，一切生产资料基本归国家所有。由此，斯大林提出了国家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支配和管理、对财富进行统一分配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思想，并付诸实施。这一思想的理论根据是：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固有特性，因为它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形成，保证了苏联能够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基础工业和新兴产业部门，在最短时期内实现了工业化。

1933 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成为工业中唯一的经济体系和农业中的统治力量，从而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1936 年，苏联宣布基本"建成"了社会主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32 页。

义。它是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施的结果，因而被后人称之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在体制上的主要特征是：其一，经济上高度集中。所有制结构方面，建立了理论上的全民所有制而事实上的国家所有制，以及理论上的集体所有制而事实上的“准国家所有制”（因为集体农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业机械归国营拖拉机站掌握，生产经营没有自主权）。运行机制上，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实行集中性、全面性和强制性的、“命令经济”式的计划经济。经营管理上，推行政企不分的、行政直接管理、控制和监督的管理体制。其二，政治上高度集权。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体制和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其三，文化上高度统一。文化体制上，中央集中控制和行政干预，使文化教育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导致思想上教条主义盛行。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人类历史上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尝试。其历史地位在于：使社会主义从理想、理论和运动，发展成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对反法西斯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产生了间接的影响。然而，斯大林模式又存在严重弊端，其僵化的体制，使经济和社会生活缺乏必要的活力，特别是其民主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使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压抑。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早在 1949 年就对这一弊端作过深刻揭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前途在于社会主义，但他又强调，“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

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才能使个人的权力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①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客观根据是，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践形式，是斯大林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这一发展道路由相互关联的发展战略和体制两大部分组成。加快实现工业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是苏联人民的心声。但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的包围，资本主义危机所酝酿新的战争对苏维埃政权的现实威胁，经济技术和文化水平的低下，市民社会基础的薄弱，市场交换能力的匮乏，民主传统的缺乏，等等，都制约了发展战略的选择。因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战略，只有靠相应的集中体制来实现。而苏维埃政权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又是可以利用的政治优势，采用那种简单化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更容易操作，也更容易使人接受。因而，在列宁逝世后的党内争斗中，斯大林的理论被中央多数派所接受，高度集中的体制得以建立，不断延续并强化。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更有其主观原因。这当然有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影响，使这一模式打上了斯大林的深刻烙印。列宁去世前一年的病重期间，曾对他去世后高层领导的团结和集体领导问题表达过忧虑和深入思考，他建议，由于斯大林太粗暴、太急躁和缺乏耐心，希望中央能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但在列宁去世后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相继清洗了各个反对派，巩固了其在党内的地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斯大林“太粗暴”的个人品质等缺陷，加重了这一体制在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方面的弊端。

---

①《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2—63 页。

然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更重要的主观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的偏差。斯大林想早日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但他忽视了对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度，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短暂阶段，经过一二十年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再过二三十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并早在1936年就确定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将因特殊历史条件形成的这一形式绝对化和普遍化。所谓绝对化，是他认为这一体制已不存在社会基本矛盾，因而不再需要不断变革，作为已经"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其任务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所谓普遍化，就是其他国家搞社会主义，也必须按照这一模式，任何其他道路的探索，都是背离社会主义而站到了帝国主义的一边。将发展模式"绝对化"和"普遍化"，其结果必然是形成"唯一化"的模式，而任何一个系统，如果是"唯一"的，必然是封闭的，就将丧失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以及内部自组织的能力，从而必然导致僵化而逐渐失去新的生命力。

**（二）历史发展的"线性规律"：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意识形态根据**

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对社会主义认识产生偏差所形成并强化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据是，历史发展存在着斯大林所谓的"线性"的"铁的规律"，即人类历史发展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经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是依次更替的"线性"的过程，这一规律是自然的物质运动所决定的，因而每

一社会形态都有固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于是便不存在人的主体活动的选择性，人的历史作用只在于促进被物质运动规定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种特征的早日实现，否则就是抗拒客观规律而一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斯大林1938年在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①]1939年，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遵照斯大林的逻辑，把五种生产关系引申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又阐发了相对应的五种上层建筑，从而构成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由于斯大林的权威以及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意识形态成为第三国际旗下或受其影响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绝对权威的解读，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论证过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线性更替，是所有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必须经历的不可抗拒的"规律"。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实分析过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式，但是，他们对"部落所有制"的认识，并不完全等同于斯大林论定的"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原始社会。因为第一，这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尚未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原始状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7、132页。

态的认识，还缺乏科学的材料，他们在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还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直至1888年，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对此加的注中，特别说明：“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①]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还未将人类的原始状态列入历史发展序列。第二，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部落所有制”是这样论述的：“社会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②]可见它基本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第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分析的三种“所有制形式”，是为了论证所有制同分工的关系，以进一步阐述马克思在《19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遗留的私有制和“劳动异化”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即“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③]。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并未论证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序列。

诚然，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④]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并非像斯大林那样把“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人类所有民族的绝对普遍的社会发展图式。因为，第一，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后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才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认为它的特点是，土地不属于个人私有而属于君主，村社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可见，它与无私有制、无阶级和国家的原始社会没有共同点。第二，马克思用“大体说来”的话语，表明他只将其结论看作是基于对现有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大致认识，特别是他只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一加以阐述，而并没有说它一定是所有民族的历史发展所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一直强调，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起源的论证，主要是基于西欧历史发展资料所作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并不认同后人将他的概括当作绝对普遍的模式强加于世界各国。1881 年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就俄国村社制度是否必然应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进行讨论时，针对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思想所遭受的教条式理解，作了澄清：“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①]1877 年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曾尖锐指出，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他强调：“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1 页。

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①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论证过离开人的主体性和选择性的所谓的历史发展的"线性"的"铁的规律"，他们是在"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这一旧世界，即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只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及其内在矛盾所引起弊端的暴露，通过"世界市场"而造成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所以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恩格斯晚年更是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他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而"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②。由于目的和动机（当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的目的和动机）决定历史主体的选择性，因此根本不存在永恒的"线性的"历史规律。恩格斯晚年还基于 19 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甚至对自然规律都提出了如下看法："永恒的自然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1—34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8—249 页。

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①]以人的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历史就更不存在“永恒”的线性规律了。

然而，斯大林反复强调历史发展的“线性”的“铁的规律”，并对此作了独断论式的表达：“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如同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由此，他所作的推论就是：“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②]否认偶然性，否认动机的作用，其实质是否认人的主体性和选择性。

斯大林这一历史规律的独断论表达，是为其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作辩护的意识形态。它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两大作用：其一，对内，达到苏联现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的宣传目的，以有效地进行政治动员，并封杀所有反对派的声音，正如斯大林所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③]其二，对外，要达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苏联现有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宣传目的，以有效地鼓动其他国家人民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并扩大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

正因为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绝对化，斯大林把每种社会形态所包含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简单化了，这才造成将苏联在发展进程中因特殊历史条件所作的体制安排，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

③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6页。

为此，在经济上，斯大林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社会化（即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消灭商品货币、以消除重新产生阶级的土壤的设想，而把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和行政化的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斯大林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即国有制）完全等同于公有制，为了把国有制说成是“全民所有制”，他把执掌国家政权的党的领导集团，说成是天然没有特殊利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从而在逻辑上演绎出：其一，由这一集团掌握生产资料，就是“全民所有”；其二，既然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就等于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那么，就必须否认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曾拒绝经济学家提出的把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的改革建议，其理由就是，假如这样做了，“第一，结果就会是集体农庄成为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这样的地位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不是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反而远离共产主义……；第二，结果就会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①]。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国家所有制当作公有制的全部，而只是当作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第一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资料实行强制性的干涉。”[②]因为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0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3 页。

非如此，就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又强调，这只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以后又多次强调了把生产资料变为国有，只是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第一步，而不是它的完成，最后应该逐渐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特别是恩格斯晚年，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由股份公司直至最后由国家占有的新现象，得出了“生产力的国家所有”，只是“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而并“不是冲突的解决”①的结论，并指出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当作社会主义，这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国有化之所以并非都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是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合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有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②。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还认为，随着国家的社会地位的加强，国家权力机关获得了对所代表阶级的相对独立性，即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恩格斯晚年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并不能自然根除，因为国家政权是需要有代表来掌握的，因而“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因此，代表国家掌握了社会生产资料的领导集团，即使它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遗产的继承，也并非能永远正确地代表“全民”的利益。如何使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以及由此掌握的“国有制”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是马克思留给后人一大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

然而，为了进一步给“国家所有”等于“全民所有”提供支持，斯大林一方面在理论上强调，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实行，以及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掌握，意味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已完全适应，全体人民的利益已根本一致；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在政治实践上通过多次党内斗争和肃反扩大化等运动，对反对派实行残酷斗争甚至肉体消灭，而其理由则是，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存在根本矛盾，因此，如有反对者，一定是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或是帝国主义打入的内奸和间谍。这样，斯大林模式通过片面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导致个人专权，从而在制度上扼杀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①]

### （三）物质运动决定人类历史活动：斯大林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

为了给所谓人类历史发展的“线性”的“铁的规律”作哲学论证，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开篇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了如此解读：“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

---

① 转引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①]这段话完全曲解了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逻辑及其实质，而这正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总根源。因为斯大林将人类所有历史活动的根源，都归结为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其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论证，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推导出来的。

斯大林不厌其烦地用同样的排比句式强调着这一“推论”：“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②]“不难了解，把辩证方法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③]“显而易见，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15—116 页。

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28 页。

③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21 页。

律。"[①]这些论断鲜明地表达了斯大林意识形态的话语结构：社会发展规律是自然发展规律推演出来的，因而由于自然物质运动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也是不可抗拒的。

按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的这一"经典"说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及其本质，以及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同前人相比，并非在于实现了观察世界的目的和视角的转换，而只是将前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即创立了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论而已。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这完全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因为：

第一，马克思并非只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再加上黑格尔辩证法而创立新的世界观的。因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是不能简单结合的，其原因在于两者的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一个从物质出发，一个从精神（无论是主观精神还是所谓的客观精神）出发，怎么能结合？黑格尔之前的康德，就曾经做过这一努力，为了回答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识何以是可能的（即既能扩大知识内容，又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他既肯定"物自体"的存在，以解决它对感觉的刺激能扩大知识的经验内容的问题，又肯定先验的主体思维形式的作用，以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内在根据问题。然而，这一二元论的解决方案，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不可知论的困境。马克思自然汲取了康德的教训，而不会重蹈其覆辙。

第二，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逻辑看，他正是在指出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物质出发和唯心主义只是从精神出发而导致的各自的优点

---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27 页。

和缺陷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造成两者截然相反缺陷的共同根源，即都没有以实践作为观察世界的视角，从而以实践为基础，才把旧唯物主义的客观性优点和唯心主义的能动性优点结合了起来。而一旦以实践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和理论的逻辑起点，则其唯物主义就是如马克思所界定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才是新世界观得以超越所有以往哲学的实质之所在。由于实践都是社会历史的实践，因而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理论发现时，都称其世界观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会有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因此，如果一定要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话，只能理解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展开的一种解读，而并非是对其实质的界定。

第三，斯大林把“物质决定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是逻辑起点，认为马克思是从“物质决定意识”推论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更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难道还有离开“社会意识”的独立的所谓“意识”吗？斯大林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概括的费尔巴哈的思想，即“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①，当作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加以引用，更是张冠李戴，这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解读成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论证过“物质决定意识”的思想，他强调的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是社会的产物”。恩格斯晚年更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对是实践而不是物质决定人的意识，作了更充分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5页。

的论证："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起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类活动中，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 post hoc，那么它便和 propter hoc 等同了。"[①]他还指出："18 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至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抛弃了。"[②]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反复使用的话语是："社会生活"、"人的活动"，亦即"实践"，而非在实践之外的物质。恩格斯在以物质和精神"谁第一性"或"谁是本原"来界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特别强调了"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③]把自然物质对于人类意识是第一性或本原的地位，说成是"世界是物质的"或"物质决定意识"，便是过度解读了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述，而以物质观取代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观的地位，从而无法同旧唯物主义根本区别开来。

第四，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解读成"对自然界现象的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8—33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4—36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4—225 页。

法和解释”，同样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随着欧洲近代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乃至心理学都从旧哲学体系中纷纷独立出来，黑格尔哲学解体后，试图完全解释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①]旧哲学，事实上终结了。马克思对旧哲学的超越，不仅体现在其观察世界的视角、由此所决定的内容以及解释世界的目的上，也体现在其形式上，即不再构建一个解释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的体系，而是以实践为视角，立足于对旧世界的批判，并以此作为改造旧世界的思想武器。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②]。甚至对于自然科学，恩格斯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所用不着的。”[③]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去探索整个宇宙，而只能根据实践的需要和可能，探索与人类实践有关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否则就重新陷入古代自然哲学的猜测之中。

总之，在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其核心话语是旧唯物主义强调的“物质运动”，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的活动”。他以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必然性，来推论人类历史活动的必然性，是独断论的；他以人类历史活动的“线性的”、“铁的规律”来为苏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4 页。

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所形成的模式作合理性辩护，并以此彻底排斥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探索，同时也漠视了人的主体性，而把人仅仅作为实现斯大林所界定的所谓“共产主义”这一“历史必然性”的工具。这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所存在弊端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源。

# 第四章
#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化进程中的衍进

本章追述并评价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化进程中的衍进。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毛泽东创立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毛泽东一生的核心话语，是“一分为二”的“宇宙观”，它转化为“斗争哲学”的政治话语，是其得以成功和晚年失误的共同根源。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以“现代化实践”为核心话语，以和平、发展、富裕、改革等基本范畴，对意识形态话语作了调整，从而掌握了推进改革开放的话语权。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及其与话语转换的关系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

程度。"[①]"满足需要"包含着两个问题: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如何才能满足需要?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逐步解决如何满足需要的问题,即把理论具体化为切合实际的行动纲领、路线和政策,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表明这一理论是能够满足需要的。毛泽东也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②]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开启,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有了这种需要,而且中国社会发展准备好了适应这种需要的基础。当各种条件都具备时,由此产生的客观要求便在历史的舞台上付诸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成了历史的必然。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之所以会有这一选择,一是经过比较,即无数志士仁人在鸦片战争后援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器,都不能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二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探索"走俄国人的路"的可能性,而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然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5 页。

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它直接能够满足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需要，因为它毕竟不是在中国土地上开出来的思想之花。这就产生一个如何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满足中国需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有一个过程，其根据在于对革命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失败教训的总结。

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想应用到中国，还提出了在应用中要制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但是，由于党在初创时期革命实践还没有充分展开，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因而还不可能在指导思想的层面上自觉提出并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27 年国民革命的惨重失败，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方面还很缺乏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书本里，包括照搬照抄其话语体系，可以说这正是当时党内右倾错误滋生并居于中央领导地位的思想基础（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话语就是照搬了《共产党宣言》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论述）。

在实现了党的第一次伟大历史性转折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危害中认识到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或俄国革命经验都不能给中国革命带来成功的希望。于是下决心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按照中国的具体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推动了土地革命高潮的到来。

在江西革命根据地领导武装斗争的时候，毛泽东鉴于红四军绝大部分成分来自于农民甚至旧军队，为了加强红四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他在 1929 年所写的一封信中，分析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所引起的一些争议问题，指出：“近日的

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一名词。同年,毛泽东起草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决议时指出:必须教育全体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同志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

为了反对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 1930 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还指出:"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③]称依靠"本本"、反对"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的思想倾向为"保守路线",把通过调查研究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和实际经验中形成正确的斗争策略称为"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从而第一次把"思想路线"问题同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联系在了一起,倡导要确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可以说这是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的思想先导。

但是,在这一时期,特别是 1931 年开始在党内具有教条主义倾向的人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推行的"左"倾路线,混淆民主革命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112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5—116 页。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农民作用，主张整个反对资产阶级，把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低估军事斗争特别是发动农民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为中心工作，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等等，最后导致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党中央和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系列严重的挫折，几乎陷入绝境。这一“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在于教条主义，即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否认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从中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而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作教条，并且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下车伊始，哇啦哇啦”，污蔑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同志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指责“山沟沟里怎么出马克思主义”，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或唯苏联指示是从，去吓唬人。

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从反面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满足中国革命的需要。毛泽东长期以来坚持的这一思想，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比较，从 1935 年遵义会议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逐渐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

为了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了全党领导地位的毛泽东，遵循着“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原则，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取得了很大进展。毛泽东在此后发表的许多论著，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

战》等，就是这种探索取得的理论新成果，代表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特别是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即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标准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等等。这些思想，揭露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的思想倾向，特别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错误，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正确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并直接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开会时间最长并由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的中央全会。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借用了古代成语中的"实事求是"一词，提出："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他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这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史任务。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实践斗争的概括，或者说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反映了那时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所能达到的水平，体现了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完全自觉的状态。经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已成为全党的共识。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话语转换何以是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形态上，必然是一个话语转换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演进，跟它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原因，在于它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是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体现出了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其话语体系的转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起源于欧洲，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这种普遍性依然来源于特殊性。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思想，是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般规律深刻考察的结果，而不是对所谓“物质运动”的概念作抽象演绎的产物，他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论证，是以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分析批判欧洲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而非对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发展历程所作的经验归纳。只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走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因而马克思从欧洲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这一特殊性中，提炼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而赋予其普遍意义。

但是，各民族的发展都有其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再申明：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关于历史的基础、社会的结构、发展的动力，以及人的活动在其中受到的制约和作用的世界观，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可以转化为我们认识自己民族发展问题的根源、出路和前途的方法论，使我们得以自觉地为历史的进步而奋斗。但是，由于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同样是源于特殊性，即欧洲文明的传统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因此，它的运用，就必须而且也有可能结合具有特殊性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条件。

其实，早在 1936 年，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就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②]他在 1937 年写的《矛盾论》，更是从哲学上强调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并认为，矛盾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同欧洲相比，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一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完整发展，受到的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二是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于是，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结合，才能体现出理论的普遍性价值，才能满足一个国家的需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中国革命的特点。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42—74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1 页。

回答的是两大问题：首先，什么是中国革命？即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它的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联系？又有怎样的区别？其次，根据这一联系和区别，应该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即选择怎样的路线和道路来实现这样的革命？由于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态，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 1943 年 5 月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①]这一结合，既是理论指导与实践需要的双向运动，也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向运动，即既从特殊的实践中学习和运用普遍理论，用普遍理论指导特殊实践并满足实践的需要，同时又总结实践经验以深化对普遍理论的认识的运动。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既体现在内容上，同时也体现在形式（主要是话语体系）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在内容上，就是"运用"而不是"引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过程中区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引用"："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1 页。

学习。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谓“引用”，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词句出发，套用到中国。所谓“运用”，就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出发，“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①]。这就需要深入考察什么是中国的实际问题，深刻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进一步思考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途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在形式上，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体现中国特性，使之民族化。为了能够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寻找到一种能够为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使其在中国的每一表现都带有中国的特性，即带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之扎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而得以繁荣。由于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是以西方文明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为基础进行创新的成果，因而其话语体系可以为西方人所熟悉和惯用。由于东西方在思维习惯、惯用的话语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形成一种障碍。因此，为了使中国民众对起源于欧洲文化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种理论上的亲近感和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就必须用中国人惯用的思维习惯和话语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对它进行解释。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和形式，又是统一的，它统一在中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1页。

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中，即回答中国的现实矛盾的根源及其解决矛盾的出路中。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开篇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这一问题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颠覆旧世界的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区分"敌、我、友"概念，无论在革命内容上，还是话语形式上，都极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在马克思那里，革命的主客体表达为"阶级"的话语，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描述，习惯使用的是"敌、我、友"的话语。毛泽东从"敌、我、友"概念切入，运用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正如他所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②]从所分析的内容看，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已使阶级关系简单化，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仅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更由于中间阶级和阶层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震荡下，纷纷被打入社会的两端，已成为"暂时"的阶级而不能主导社会矛盾的解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③]而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2—283 页。

在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既没有成为社会力量的主力，也没有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简单照搬马克思的分析话语，就不足以涵盖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状况，更无法确定中国革命各种社会力量的分布。毛泽东将"敌、我、友"的话语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分析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是革命的主力；帝国主义及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等，才是革命的对象；而小资产阶级等是革命的"朋友"，至于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敌人的中等资产阶级，才是"动摇不定"的可能分化的，即其右翼可能是"敌人"，而其左翼则可能是"朋友"。这一分析，其话语形式是中国化的，其内容则奠定了中国特色的革命路线和道路的国情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话语转换何以是可能的**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精华部分作为中华民族长期实践经验的沉淀和总结，存在着不少跨越民族性和时代性、具有人类文明普遍性的内容，其中有一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似性，因而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找到结合点和生长点。这决定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实现话语转化，具有了可能性。当然，在这方面，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都需要我们做更深地发掘。在这里，本文只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在人文关怀、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和重视实践的作用三个方面的相通性，而具有话语转换的可能性，做一些粗略的分析。

其一，关注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方面的话语相通性。

马克思的一生，贯穿了强烈的人文关怀。还在青少年时期，他在其中学毕业论文中就立下了这一志向："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

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当然,他对一般人道主义的超越在于,他不是仅仅停留在自身的道德完善上,而是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要实现人的解放,需要批判现实世界,要解决人的苦难,需要揭示现实苦难的根源。正如他在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①]马克思还强调人的社会价值,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

当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并不具有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结合起来的传统。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同样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如儒家强调"仁者人也",主张人要把自己跟物体和动物区别开来,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和对待,还提出"仁者爱人"。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进步的思想家也提出了"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等思想,强调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听政于民"。同时,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了人的群体价值。

其二,在追求未来理想社会方面的话语相通性。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同时发现了新社会,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在这一理想社会中,不仅生产力高度发达,而且消灭了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级和一切社会差别,国家自行消亡,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中国古代进步的思想家在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同时,大都要对理想社会做一些构想,其中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这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其中的合理因素也为毛泽东所吸取。在毛泽东看来,"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①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科学指明了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现实途径。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②他在为他所起草的《论联合政府》报告所作的说明中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③这样,毛泽东就既坚持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也自觉吸取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关于未来社会的话语中的合理因素,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其三，在强调践履重要性方面的话语相通性。

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强调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

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概念，更没有马克思所强调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活动"的思想。但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有重视习行践履的传统，从孔子提出"学以致用"的思想后，历代进步思想家大都主张"经世致用，以学易道"，强调"知"和"行"的统一。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践履"、"致用"和"行"，基本上局限于人们的道德行为，但它要求每个人应把所学知识外化为自己的行为，并通过这种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重视习行践履的传统，可以在话语上实现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相通。

## 二、毛泽东创立的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毛泽东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农村出身的背景以及深入农村对农民运动的考察，又使他非常熟悉底层农民的思维习惯和话语方式。他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元素的批判继承，对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吸收融合，以及对人民群众喜闻乐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见的话语素材的加工提炼，创立了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

### （一）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元素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①]毛泽东以这一原则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进行话语整理和改造，对基于欧洲思维传统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网的"纽结"的哲学范畴，实现了中国化的话语转换。

毛泽东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但是，实践同理论的关系，是西方长期争议的哲学命题，毕竟比较抽象。毛泽东为了争取党内绝大多数文化程度比较低而不可能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志对反对教条主义的认同，并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便使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实事求是"这一话语。在中国传统的意义上，实事求是指的是讲求实用、不说空话的治学态度。毛泽东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深受这一学风熏陶，不喜空谈、提倡力行的湖湘文化，更给毛泽东以直接的影响。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不仅把实事求是当作治学态度，而且还把它提升为思想方法，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而且把它同尊重群众的实践创造这一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这是他后来能够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涵义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代哲人都围绕知和行问题展开过长期争论，如"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合一"等。为了说明"实事求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重视习行践履的传统作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了提炼，改造了“知行”范畴，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的《实践论》一文，其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以“知行”关系切入，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毛泽东还以“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②]的话语，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的思想。这些都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中华民族的话语形式，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其中矛盾学说是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精华，而矛盾学说的基本观点又表现在阴阳学说与和谐统一的思想之中。毛泽东学生时期就对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着深厚的兴趣，并作过一番研究，使他能在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体现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话语，进行了提炼和改造。在斯大林那里，辩证法只是方法论，而唯物主义才是世界观，正如斯大林在1938年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①。

而毛泽东在1937所写的《矛盾论》，并没有受斯大林这一机械论的影响，而明确把辩证法视为是一种"宇宙观"，即对宇宙"发展法则"的见解，而并非仅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他接着就引用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论断，即"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②，深刻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建构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精髓、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基础的辩证法话语体系，其精髓又是批判地借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一分为二"的话语。1957年，他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中明确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用以说明一切事物和过程都可分为两个互相对立和统一的部分，并把它作为观察世界的根本方法，也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达。

毛泽东一生对自然科学都没有从事过特别专门的研究，然而，就是因为坚信对"一分为二"的宇宙观，使他对作为物理学尖端理论的基本粒子理论，发生了浓厚兴趣。20世纪中叶，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提出了关于基本粒子的"坂田模型"，其中蕴涵了基本粒子可分的假说，引起了毛泽东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重视。在看到坂田昌一的著作《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时，毛泽东就反复

---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5—1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进行研读，并作了批注。为此，他还接见了坂田教授，并当面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好。1964 年，毛泽东还约中宣部分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和哲学工作者到中南海谈话，并亲自召开了一次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会议。在谈话和会议中，毛泽东从坂田文章谈起，多次谈到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阐明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基本粒子也可以分，一分为二。他强调了列宁讲过的“凡事可分”的思想，肯定了庄子的万物永远可分的观念。他还认为，尽管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

**（二）对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吸收融合**

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是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文化气质、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发展等因素交互作用在本民族心理上的积淀，反映一定时期普通民众典型的精神状态。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中国文化，还须在中国民俗文化和社会习俗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心理中吸取合理因素。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民族危机的加重，救亡图存和反抗意识，已成为各阶层群众普遍存在的愿望和心理。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挖掘了中国世代农民的期盼，且把它们同整个中国当时的社会变革大趋势联系了起来。他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

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①]于是，一方面，毛泽东充分肯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并用“打土豪，分土地”、“工农武装割据”等话语，来动员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而非用“共产主义”这一对农民来说还远离其现实利益的口号来“武装”群众。另一方面，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农民反抗最终失败的教训，强调要提高工农红军的思想水平，使大家认识到“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及时地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危险，要求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③]。警惕“糖衣炮弹”和“两个务必”的话语，是对广大群众对新政权的期盼心理进行提炼的结果。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义利之辩”话语一直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其“重义轻利”话语对民众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积极作用是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的话语元素，但历代统治阶级“重义轻利”的道德教化，又往往具有很大的虚伪性。毛泽东批判地对“重义轻利”的话语进行提炼和改造。一方面，他依据马克思主义，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④]同时，又对把“利”的概念上升到革命功利主义的高度，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3页。

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①]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肯定“重义轻利”话语的价值取向，强调“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②]。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话语所表达的均平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心理，它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平等要求。毛泽东对中国广大农民的均平要求有着深刻了解，对此进行话语的提炼和改造。一方面，他承认平均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强调“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③]，赞成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等等。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均平思想的负面作用，提出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话语，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三）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的加工提炼**

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而其主力则是基本没有经受文化教育的农民，为此，他喜欢用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所熟悉的话语素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换，使马克思主义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关系比作“矢”和“的”的关系，强调要“有的放矢”。他用“吃一堑长一智”来说明亲身参加实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践对于形成正确认识的作用，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论述理性认识的形成过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论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成语，以及《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典故，来阐述研究问题不能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道理。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想，毛泽东用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这一中国人典型的话语方式。马克思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方式，但“暴力革命”的表述不大适合一般工农民众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于是，毛泽东用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话语，以后逐步形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明确语言。他还使用“武装斗争”这个工农民众所熟悉和惯用的话语，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他借用了《水浒传》中的景阳冈武松打虎的典故，指出：“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①以此阐述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

总之，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的、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在不同阶段，它会因时空条件的变迁和历史使命的转换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除了含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外，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自己时代的特色。毛泽东对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成功经验，依然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宝贵财富。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3 页。

### （四）毛泽东“宇宙观”的核心话语对其一生政治实践的影响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为了解决民族与人民的“生存”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观念的革命话语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受制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观念的革命话语体系的惯性束缚，因而造成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严重贻误。

一般认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人们也习惯有“毛泽东晚年错误”来表达对党和国家所走过的弯路的责任。但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这一话语的使用，须厘清两个问题：第一，不能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全部归结为错误。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以现实作为参照系，毛泽东都提出过正确的思想，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初提出过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尽管“三个世界”理论依然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和高估了世界革命的形势，因而没能将关于世界格局的理论上升为关于时代主题转换的理论，但是，它毕竟突破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传统意识形态，而是以经济、军事实力和对外政策作为划分世界政治格局的标准，突出了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矛盾，揭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的历史作用，从而为中国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根据。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①。甚至还为我们今天的开放“开辟了道路”②。第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7 页。

二，不能把毛泽东的晚年思想与他的早年甚至是成熟时期的思想绝对对立起来。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生中思想的发展变化必然体现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不可能没有任何逻辑轨迹而颠覆使自己获得巨大成功的思想。毛泽东绝对没有而且不会承认自己晚年的思想违背了自己早年的思想。

既然如此，贯穿毛泽东一生思想始终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他早在青年时期就确立的价值观，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这一价值观，又是他所坚信的宇宙观的具体表现，这一宇宙观就是：“宇宙是一分为二”的。

辩证法是毛泽东的主要话语。他反对机械唯物论，强调意识和理论的巨大能动作用：“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①他甚至认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②

毛泽东“一分为二”这一辩证法的“宇宙观”，转化为他看待世界、特别是历史的方法论。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写的一系列诗词中，也极为鲜明地体现这一历史方法论。例如，在1964年春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写的《贺新郎·读史》中，他对人类历史的概括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①]1965年秋在《念奴娇·雀儿问答》中，他对苏联领导人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讽刺和揶揄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②]

毛泽东"一分为二"这一辩证法的"宇宙观"，内化为他的价值观，则是"斗争哲学"。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特征的解读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③]。他对共产党存在价值的概括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当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试图以整顿混乱局面和集中力量抓好经济建设来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而将毛泽东所说过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一切工作的"总纲"时，遭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④]按毛泽东的逻辑：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毛泽东将"斗争哲学"的政治话语，引入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考，而特别重视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使"斗争哲学"这一政治话语转化为国际"战争与革命"这一实践话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逐渐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毛泽东透过东西方冷战的意识形态表现，看到了美国等西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③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

④ 《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6页。

方国家的战略意图，即“这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因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

50 年代中期以苏伊士运河斗争为标志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苏伊士运河事件平息不久的 1957 年初，毛泽东就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作了分析。他认为，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是帝国主义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争夺亚洲非洲的地盘。他指出，当前世界的矛盾除了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外，还存在着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②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观察世界格局的视角，已由两个阵营的斗争，转向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斗争。

时至 60 年代，不结盟运动开始兴起，中苏裂痕公开化并扩大化，而法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对美国闹起独立的倾向。毛泽东认为世界局势正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他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我们不感到英法是威胁，我们希望英法强大起来。这表明，毛泽东已不把帝国主义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敌人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93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8 页。

随着苏联对外霸权主义愈演愈烈，毛泽东断言苏联已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这样，毛泽东就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即亚非拉地区为第一中间地带，西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二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已成雏形。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 年中苏爆发边境冲突，尼克松接任美国总统后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亚洲实行收缩战略，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苏联在同美争霸过程中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毛泽东深感战争的危险的增长。正是在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以及对战争与革命形势做出新的判断的背景下，毛泽东决定促使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为了给这一重大举措提供意识形态根据，70 年代初，毛泽东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逐步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主要观点是：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等国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是第二世界；亚非拉除日本外，政治、经济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是第三世界。1974 年 4 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就当今世界的格局、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三个世界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世界主要矛盾、三个世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自的地位、中国在三个世界中的定位以及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方面面临的任务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由此，“三个世界”的理论宣告问世。

“三个世界”理论对世界格局划分的标准是经济、军事力量和对外政策；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苏争霸世界的矛盾和第三世界同霸权主义的矛盾；第三世界属于革命的力量，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第二世界则具有两重性，是可以联合的对象。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表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意识形态主要话语，已超越了以往的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划线的

"两大阵营对抗",而转为"三个世界"。这一话语转换,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和娴熟地运用国内政治斗争经验,对经过 60 年代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后国际局势变动的正确反映。

然而,世界格局自 60 年代开始动荡,有其深刻的根源,它蕴涵着时代主题的演变。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毛泽东没能进一步揭示世界格局变化的根源,忽视乃至完全否定了东西方自 70 年代开始的缓和进程的一面,而夸大了美苏争夺导致战争的危险性,更没能明察到世界格局新变化下涌动的经济发展的潜流,而高估了世界革命的形势。"战争与革命"的主题被强化,与毛泽东的思维话语有密切关系。在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特别忌讳赫鲁晓夫鼓吹的"三和一少"(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对世界革命的支援要少")路线,因为他强烈感觉,这不仅丢掉了斯大林的"刀子",而且丢掉了列宁的"刀子",而列宁和斯大林的"刀子",对内是"无产阶级专政",对外则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在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战争必然引起革命"的思维话语不仅被坚持了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战争的策源地已由老牌帝国主义转变为美国和苏联,革命的内容也已由"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为第三世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人民革命",因而,战争更危险了,革命形势也更高涨了,这个世界的前途在于"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由此,毛泽东也把"备战"放在党和国家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支援世界革命放在外交工作的首位。

毛泽东将"斗争哲学"的政治话语,引入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思考,而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使"斗争哲学"这一政治话语转化为国内"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实践话语。

1956 年党的八大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

盾的实质界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对这一“提法”有一定的保留，认为“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①]。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提出了“中国还要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②]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更明确表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③]1958年中共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要求，确认了他在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并进一步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④]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断言，党内也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⑤]的话语，这样他就把正常的党内斗争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1962年中共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观点：“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

---

① 《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8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页。

③ 《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18页。

④ 《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14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452页。

路的斗争。”[1]毛泽东还强调，对于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2]。

根据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思想，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社会现象，其根源在于一部分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尽管阶级斗争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但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国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了，如果说阶级斗争还将始终存在并且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则其根源又何在呢？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和思想领域，逐步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从“一分为二”的宇宙观出发，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思想还要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同无产阶级斗争，国际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它们一直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因此，要开展“灭资（资产阶级思想）兴无（无产阶级思想）”斗争。他还把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看作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这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就带上了强烈的理论色彩，从而导致毛泽东在后来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话语。

“一分为二”的宇宙观运用于经济建设中，导致了毛泽东急于求成的实践，离开现实的可能性，片面地强调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切实际地提出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3]；片

---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年版，第653页。

② 《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0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页。

面地强调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甚至毫无根据地提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①]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话语超越了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由此掀起的两个运动必然带有空想的色彩。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话语是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是有其主客观根源的。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也知之不多；同时，建国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群众心里长期积压的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也构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话语的社会心理基础，所以能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当然，“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也是重要原因。

## 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

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进程中所推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同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过程。他通过区分社会主义之“名”和“实”，确立了“中国特色

---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0 页。

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同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价值观、发展道路、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基本话语，实现了转换。然而，出于对以往意识形态领域强化阶级斗争话语的否定，许多人从“淡化意识形态”甚至“去意识形态化”视角，解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导致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知上的混乱，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的削弱。为此，深入阐发邓小平通过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来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对我们在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大众化，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核心话语的确立：区分社会主义之“名”和“实”**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需要通过重塑党和国家“形象”，来表明自己是中华民族最高和最普遍利益的代表，这一“形象”，需要有意识形态话语的支撑，这就必须尽快调整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作必要的话语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奠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调，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们同时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话语。

在邓小平理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话语的确立，实践根源是“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和改革开放起步，而在理论上，则是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基础上，进一步区分社会主义之“名”和“实”的结果，而并非是所谓“不管姓‘社’姓‘资’”的“去意识形态化”的产物。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尽管当时对“拨乱”就是“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返正”（“反”在汉语字解中通“返”），却产生很大

争议:什么是“正”? 是否是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体制,在此基础上来完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初期遇到姓“社”姓“资”争论的实质,盖源于此。三中全会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下放自主权、创办经济特区等改革举措开始探索,这些举措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涉及,以往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没有成功经历,有的还曾被当作资本主义受到批判。因此,有人困惑于“要社会主义,还是要现代化”思维矛盾中。在人们的传统思维还难以很快扭转的情况下,为了不至于纠缠于原有争议而使改革裹足不前,邓小平以思想家的智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内,转换所争议话题的焦点,逐步引导人们转变原有思维方式。

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明确指出:没有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保证中国实行现代化。为了超越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的争议,他将话题的焦点,从社会主义同现代化的矛盾,转换成现代化实践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观念之间的矛盾。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当理论和实践产生矛盾时,应该以新的实践来丰富原有理论,而不是用原有理论来裁剪新的实践。于是,欲化解这一矛盾,只能通过解放思想,对长期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观念进行再认识。为了规避争议以开辟新的道路,邓小平力图赋予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以新的内涵,使人们摆脱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当作社会主义本质观念的束缚。

1980 年春,邓小平决定把解放思想推进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再认识这一层面,其实质,就是区分社会主义之“名”和“实”。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这就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3 页。

用简练明白的语言，点出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能满足于“名”而要追求“实”的思想。两年后，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从而把握了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权和改革开放的话语权。

常有人把“不管白猫黑猫”论当作邓小平“突破姓‘社’姓‘资’”的“去意识形态化”的例证。从这一所谓的“事实判断”出发，又恰好存在两个极端的价值判断：一种认为“好得很”，改革开放就得益于这一“去意识形态化”；另一种则认为“糟得很”，今天诸多社会矛盾的发生，均根源于此。其实，认为邓小平的“猫论”就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事实判断”，本身就是失真的。

所谓“猫论”，最早出于邓小平 1962 年关于“包产到户”争议中所表达的观点，他主张：“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①]然后借用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不搞“本本主义”道理。可见，邓小平的这一比喻，并非涉及根本制度，而是在关于农村生产组织形式上，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其背后蕴涵的思想，则包含了生产力、群众利益和实践创造等丰富内涵的“实践标准”。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 1975 年年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一比喻两次被当作“不管姓‘社’姓‘资’”遭到批判，而导致人们在事实判断上错误的思维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3 页。

定势。

澄清这一事实，对于邓小平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实质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就无法与邓小平始终强调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等话语相协调。当然，邓小平也突出强调：“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①而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突出“中国特色”，目的也是摒弃对社会主义之“名”的抽象固守，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之“实”。正如他所说的，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②。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话语的转换**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从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话语进行转换和调整，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实现其“大众化”。

其一，价值观话语：从“贫穷的社会主义”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不仅总结“文化大革命”鼓吹的“越穷越革命”的教训，甚至以一些非洲国家在民族独立后的教训为例，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③。他曾指出，苏东国家发生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经济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不去，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告诫："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①]通过对这些教训的总结，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而不能长期建立在贫穷的基础上。

随着改革的深化，贫富分化问题开始出现并逐渐突出。对此，邓小平又逐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不是极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②]。

由此，"共同富裕"成为邓小平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并转化从中央领导到基层百姓共同的追求，从而确立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其二，发展道路话语：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是体制僵化，要发展生产力，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出路在于改革。为了使"改革开放"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中掌握话语主导权，他把改革同以往掌握所有社会生活话语主导权的"革命"联系起来，提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对此，邓小平从理论上作了论证："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①]而过去之所以没有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是因为我们过去往往把社会基本矛盾不适应的方面，归结为旧社会遗留的痕迹、新制度建立之初的不完善以及敌对阶级的反抗。而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揭示了社会主义自己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某种条件下也可能"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得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以及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结论。这就把"改革开放"从现实的具体政策选择的层面，提升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高度，以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进入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中，而成为其基本话语之一。

邓小平还强调，作为对生产力的"解放"，改革就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它必然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并影响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变革，还必然涉及人们利益格局和观念领域的调整，其"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②]。"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③]这一对改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的清醒认识，把改革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改革开放"从理论层面，渗透到社会心理，从而把握了对社会心理的引导权。

正因为如此，"八九政治风波"刚平息时，邓小平就指出，必须"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于民的第一条”[①]。“改革开放”成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基本话语。

其三，审视外部环境的话语：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

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意识形态的新的核心话语，邓小平在外部环境的审视上，强调“和平与发展”，致力于塑造“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形象。

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事实，通过对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揭示，指出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战争并进而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二战结束后，世界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全面抗衡的格局，战后初期的时代主题依然是战争与革命。面对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强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通过备战和支援世界革命来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战略思想。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事实上的解体、资本主义阵营出现的分化，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壮大，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突破了“两大阵营对抗”的意识形态。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毛泽东依旧坚持了战争不可避免以及革命形势高涨的思维方式。

1977年底，邓小平第一次作出了“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②]的判断，它改变了我们过去较长时间所坚持的“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为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作了重要思想准备。1978年底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进一步作出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判断，为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找到了国际环境的客观依据。进入80年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代，潜伏在三个世界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发展问题更为突出，从而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为此，邓小平在前两次调整对战争问题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当代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1984年5月，邓小平概括了当今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即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1985年3月，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两大问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①]这两大问题既覆盖了全球，又涵盖了政治经济，且都关系到人类的命运。由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把和平与发展分别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

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揭示出来，不仅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际局势的变化的事实，更蕴涵了意识形态问题上价值评价的调整。因为邓小平是把东西关系的实质概括为和平问题，其重要理由是，一旦发生核战争，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邓小平是把南北关系的实质概括为发展问题，其重要理由是，南北差距的扩大，不仅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也制约了北方国家的再发展，从而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邓小平强调，和平解决争端，才能对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人民交代，同时，也“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①]。这些论述，反映了邓小平以整个人类命运为视角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思维方式，而其中蕴涵的价值观念，是人类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统一。由此，他确定了“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理念。

正是邓小平在判断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时，因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的调整，而确立了“和平发展”的话语，并成为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主流价值的基本话语。正如他在谈到中国在世界总体政治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强调：“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②]“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证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③]

## 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衍进的基本经验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 （一）根据实践主题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同时，还要求根据不同时期实践主题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3 页。

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①。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第一大历史课题，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话语，与之相适应，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实践主题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根据这一时期实践主题的需要，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话语体系，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的历史课题话语转变成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与之相适应，中国人民的实践主题也转变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从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出发，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话语，从而使得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站稳了脚跟。此后，又明确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话语，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但是总的说来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符合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在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我们党也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并以此为基础在探索的初期提出了一些富有思想理论价值的话语，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

盾”、“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等话语，这些话语所反映的思想不仅对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遗憾的是，1957 年以后，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某些设想的教条化理解，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最终走向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歧路。邓小平在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时深刻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历史证明，为了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事业的发展，就必须根据不同时期实践主题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创新。

### （二）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命题，除了反对经验主义外，主要反对的是教条主义。同样，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仅是反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思潮的需要，更是反对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思想的需要。

邓小平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但是，他又表明不能丢的，是老祖宗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8 页。

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就指出："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①在全面改革开放过程中，他进一步强调："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②这样，我们不能固守马克思根据对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状况的研究所得出的所有结论，而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还提醒全党："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③贯穿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相关论述始终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理论联系实际，而要把握能够联系实际的理论，只能是这一理论体系中的精髓，即立场观点方法。

在社会阶级结构越来越复杂化、无产阶级队伍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首先是坚持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它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转向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确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领导者、还是理论工作者，其政治立场，不再取决于他的职业所决定的经济地位，也不再有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条件下形成的朴素的"阶级感情"，这就更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而这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思想史伟大变革的实质之科学性及其当代价值的认同，有了这一理论认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同，才会奠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从人的实践出发，还是从物质或精神出发这一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影响到我们对现象的判断和对实质的把握。同样是看待中国基本国情，从物质出发，会得出“地大物博”的判断，而从人的实践出发，只能得出“物薄”的结论。无论是重新认识基本国情，还是深刻把握时代主题，邓小平都把人的实践所确定的人同自然关系、人的社会关系以及包含于其中的价值关系，作为坐标系，从而更掌握了国情和世情的实质，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实践根据。同样，党在确定科学发展观时，明确将“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突现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以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和价值目标本身的重要思想。

基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从人在实践中遇到的社会矛盾出发，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求实和创新的统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科学精神和民主政治的统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不能排斥理论的指导而限于盲目的经验主义之中。因为这一“实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指“社会实践”，它涉及人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权益的复杂关系，需要全面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需要看准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实质和主要矛盾，以便正确地“总结经验”。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而对如何评价同样的实践结果，价值评价体系和观念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判断。因此，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就并非是纯客观的事实标准问题，而是蕴涵了价值观因素。对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来说，其价值观又包含三方面内涵，即要不要讲利益、讲谁的利益以及怎么讲利益。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将实践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

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邓小平还把激励机制和民主法制问题纳入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制约因素，认为没有“赏罚分明”的好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体制，而是家长制、一言堂，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这表明，能否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不仅仅是认知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思想境界问题，它还涉及到人们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机制。人们需要精神激励，同样需要有能得以实现讲真话、办实事的利益激励机制。能否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不仅需要科学精神，还需要民主精神，需要尊重人民群众包括少数人的意见和权利，而民主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如果没有形成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包括少数人意见和权利的体制，就很难使人们在缺乏理性的狂热中做到实事求是。邓小平在实事求是问题上的上述思想，更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精神实质及其时代价值。

### （三）处理好意识形态所表达价值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意识形态本质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当社会利益从根本上产生分化甚至产生冲突后，特别是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产生矛盾后，社会就既需要国家，又需要有表达各种利益的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即意识形态，以论证和维护一定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以及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科学揭示，力图表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真实统一。同时，无产阶级在其夺取政权与掌握政权的不同条件下，对自己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统一的表达形式，应有所不同：夺取政权时，它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所代表群体的特殊利益，同时揭示这一利益在本质上和长远意义上对人类利益的普遍性；然而，自己成为执政党后，应该逐步表达自己所代表利益在现

实上的普遍性，以使自己不断获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把“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等作为基本话语，便体现了在共产党执政和时代主题转换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力图表达所代表利益的普遍性。邓小平一直强调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强调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看问题，这两者的统一是真实的，因为中国的发展，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正如他所说：“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①]与此同时，邓小平并非抽象地谈论全人类利益在现实层面上的一致性，而是清醒地看到其中不同利益的冲突性。他在强调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时候，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②]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意识形态话语的创新中，高举社会主义利益、中华民族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一致性的旗帜，同时揭示西方一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同中国国家利益、人类共同利益的对立性，以掌握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而非否认全人类利益的共同性。

今天，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继续处理好意识形态话语所表达的价值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既不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当作可以拯救世界的核心话语，也不把西方文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1 页。

化的话语当作“普世价值”的话语，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中反映现代化普遍规律的积极因素来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体现时代化的内容和特征，使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在世界上能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

**（四）处理好意识形态话语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关系**

邓小平在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和转换意识形态话语进程中，十分注意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以及党的形象的统一性，而不至于割断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党的历史，使思想解放与“不争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中，邓小平始终强调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不能丢掉“社会主义”的关键词。他强调，中国之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是通过维护党的思想和形象的连续性以增强凝聚力的需要，也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稳定大局的需要。然而，邓小平还强调，我们需要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一步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①。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历来所坚持的，“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要写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①]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又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讲出新的话语。

在改革开放初期调整意识形态话语时，如何保持党的形象延续性和统一性，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粉碎“四人帮”后，意识形态领域既存在“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又出现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邓小平强调政治上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否则，“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②]。同时，为了不让“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掌握话语主导权，邓小平对“高举”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关键话语的内涵，作了转换和调整。他厘清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精髓的概念，又区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从而顺利地排除了“两个凡是”和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两种错误思潮的纠缠，既最大程度维护了政治稳定，又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

邓小平一直把实事求是视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把实事求是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话语，从而保持了党的思想路线在意识形态核心话语上的稳定性；同时，他又没有固守马克思和毛泽东用过的话语，而是在新形势下调整了基本话语，以丰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三中全会后很少有人再公开挑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然而，此后并没有消除对改革开放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其重要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8 页。

原因之一，是以往将实践标准简化为经验标准即在经验中能否得到成功，而忽视了由于不同思维方式和不同价值观念，对实践成功与否完全可能作出不同评价。为此，邓小平将实践标准具体化。改革开放之初，他先强调生产力标准，随着改革的深入，他又把实践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其实质是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的统一，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的统一。正因为邓小平将实践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掌握了改革开放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今天，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上，我们不能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话语，用需要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核心观点和根本方法等内容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其中，特别需要厘清对马克思主义阐述的斯大林主义话语体系，既避免在对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不足的问题，又避免对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不当”的倾向。

**（五）处理好政治话语、理论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关系**

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核心话语，要能够确立它在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还需要有一系列的政治话语加以辅助，以理论话语加以支撑，以大众话语加以传播，这样才能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邓小平的思路是，在政治问题上坚持符合大局需要的话语而“不争论”，在理论工作中鼓励做更多的研究并表达不同的话语，而面向群众则更多的让事实来说话。

邓小平强调，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顾及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家、理论家”[①]。三中全会后，针对有人鉴于对评价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重大争议而不要急于搞历史问题决议的提议，邓小平坚决主张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基本总结，其着眼点，不在理论是非本身，而在政治实践大局，即为了在拨乱反正基础上轻装前进。他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②]同样，面对中央习惯文件的起草中是否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议，邓小平主张要写，他的理由是，这是政治大局的需要，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之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概念，“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③]

当然，对于具体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始终鼓励理论工作者进行研究，他说："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④]对于理论问题，他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还认为不仅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更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以保障公民表达自己话语的权利。

而对于因陷入争议或困惑中的干部群众的教育，邓小平则强调，为了不使争论扩大而影响安定团结，应通过实践让事实来说话。他反复表明：“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①]针对1989年政治风波中部分大学生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告诫全党：从长远看，真正说服青年相信社会主义道路和拥护共产党领导，归根到底要靠我们的发展；从当前看，维护局势稳定，也要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才会平静下来，党的形象才可以树立起来。邓小平强调，“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②]。

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构建上，要立足于创新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话语和学术话语，并在沟通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中发挥桥梁作用。一方面，通过理论和学术话语的创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提供学理根据，同时针对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提供科学框架，以增强其解释力；另一方面，将契合党的政治话语内涵的理论和学术话语，转化为符合大众接受心理的日常生活话语，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和基本话语能真正掌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动权。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 第五章
#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时代境遇

本章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时代境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欲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巩固其指导地位,须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为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性。

## 一、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何以是必要的:以时代变迁为维度的审视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体系形成于19世纪中叶。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日俱增、对外扩张疯狂加剧、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凸现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一场史

无前例的转型和变革，特别是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上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在调整着自己传统的对外战略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相契合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论是对持续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还是对形成于建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主导下的社会结构，都进行着根本性的解构，它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无情地冲击着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内外的社会转型概况及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相关话语体系的挑战，无疑是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条件。

### （一）全球化和时代主题的转换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挑战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及其所导致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就此而言，认为“全球化始于十五、十六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的论点，也不无道理。早在160年前，马克思就曾对因世界市场而形成的“世界历史性”作了深刻剖析，他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的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

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1]“各民族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追求剩余价值并且因此不断向外开拓市场是资本的本能冲动。资产阶级在这种本能的推动下，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使一些狭隘、封闭的民族和国家进入到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中，而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在开拓“世界历史性”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以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为中心，以东方等殖民地半殖民国家为外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资本以其固有的扩张性逾越地理、民族和政治国家的界限，把越来越多的人口、民族和国家纳入到世界市场中去，并且从整体上对其中的各个部分进行深度的整合和同化。因而，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历史进程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全球化本身是在近代以来形成的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的结果，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二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日益多样化，国际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分工进一步加深，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使得国际范围内的现代化生产取得空前的发展，各国经济在资本、劳务、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经济全球化趋势渐趋明朗。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去。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及我国等一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也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之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系与市场经济体系并存于全球的局面不复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格局，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于是，“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也正式在1990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利（S·Ostry）正式提出，其本意指的是“生产要素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现代通讯和传媒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交通、通讯、信息成本的锐减，各国在科学技术、生产、资本、市场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增强，全球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普遍联系和交往在日甚一日地加强。物资流、信息流、文化流、资金流等在全球范围内循环，全球依存度不断增强。“全球化”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时髦的话语，而对世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影响。“全球化”概念日趋成为一个总体性的范畴，因为它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是宽范围、多领域、高速度的进程，而影响到各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融合或矛盾冲突，政治上的全球治理和主权国家关系的互动。参与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主体，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的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还有分散于各个领域的其他民间组织。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球互动，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现实和加速发展的趋向。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其一，经济方面表现为全球性市场体制的确立，国家间经济依赖度的明显提升，经济危机影响的普遍化，贸易、金融、商品、劳务、生产、投资等的全球流动和循环；其二，政治上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在反恐、防核扩散、防治病疫、环保、生态保护、禁毒、打击走私等跨国犯罪等问题上形成“命运共同体”，全球协商和治理机制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的产生及其功能作用的日益增强；其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国际范围内的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文艺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地域的文化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形成跨文化交流融合和矛盾斗争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包容意识、发散性思维、整体性思维逐步萌生；其四，在科学技术方面，信息技术、网络和通讯技术和现代交通突破传统的时空局限，把各个国家、民族、区域、团体、个人在全球范围内联系起来，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全方位的重大变革。

总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而影响到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历史进程。它是在近代以来形成的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的结果，是近代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既是市场经济自发的发展过程，也是发达国家有意推动的结果，其中免不了也是一个强权与反强权、干涉与反干涉、斗争与反斗争的博弈过程。今天，整个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扮演者，仍然是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化的整套运行规则也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信息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领域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所占的先天优势，也势必使它们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和制度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全球化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

性”。它虽然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但它又并非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它虽然首先发端于经济领域，但随着全球化自身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其他诸如思想、政治、文化等诸领域也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的全球化进程，无疑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带来许多新的挑战。然而，“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而言，又有它内在的不可拒斥性。世界各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在全球化这种大开放的时代背景中，一个国家想要在世界发展大潮中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就不可自绝于世界范围的国际交换和分工，就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全方位的交往合作。不论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比如亚洲“四小龙”等，都是在全面参与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近代以来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则从反面证实了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落后就要遭挨打。历史已经证明也将继续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任务只能走对外开放的道路，封闭必然导致落后。

鉴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果断地主动地选择积极参与全球化浪潮的搏击。在对内方面，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对外方面，纠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路线，以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大踏步地走向了世界。特别是于 2001 年我国成功地加入了 WTO 这一“经济联合国”，使得我国参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得到大大的提升，也使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著名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曾说过，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先

进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先进的人文文化，不打自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安全关乎文化的灵魂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全球化使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包括本土的和外来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先进的和落后的、健康的和颓废的，相互激荡和斗争。这种多元的思想和价值观的碰撞，也势必会冲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使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其一，强势经济的文化"渗透"所带来的挑战。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因素，赋予民族文化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以时代内涵，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体系构成新的挑战。这种挑战，由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遏制"和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而转向社会生活的更深层次，即伴随着大规模、广范围、多层次的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而带来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渗透。

人类生活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从来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复杂过程。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必定承载着某种价值和文化信息，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科技思想和成果以及审美意识的影响。在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输出、技术输出、劳务输出等，无不夹杂着思想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输出。整个全球化进程是多向度的而不是单向度的，是整体的而不是部分的，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以代表美国饮食业的"麦当劳"为例，它背后本身

就是一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运行，也同样渗透着美国的饮食快餐文化，而快餐文化背后则是高节奏高效率并且充满紧张压抑感的市场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再如代表美国电影文化业的“好莱坞”大片，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产业现象，同时也传递着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渗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我们加入 WTO 之后，原有的贸易壁垒被打破，西方国家大量的商品涌入国内市场。西方强势经济的压境必然伴随着强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入侵，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固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国际交往中，与经济的文化渗透相伴随的，还有经济本身对文化的排斥。随着经济因素在国际交往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主导对外的话语体系也相应地由改革开放前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的话语系统，转变成为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经济主义”式的话语系统，如国家利益、贸易自由、经贸合作、外汇储备等等。这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泛化的反拨，另一方面也与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功利主义趋向有关。只关注经济利益，不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因而，意识形态在对外交往中不受重视的现象就会在我们这个时代表现出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自然要防止传统的意识形态泛化的错误，同时，在经济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也要警惕经济因素排斥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危险性。

其二，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全球意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挑战。

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已成为各个民族国家责无旁贷的任务。在此背景下，“全球公民意

识”不断凸显，诸如环保、生态安全、防扩散、防治艾滋病、反恐等观念已深入人心，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但同时，“全球利益”和“人类利益”也不是抽象的，它与民族国家的具体利益优势相互交错。过分夸大“全球意识”或“全人类意识”而忽视甚至牺牲民族国家意识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从本质而言，完全超越民族、国家、阶级的“全人类意识形态”是空洞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利益倾向性。这种利益倾向性具体到阶级就是阶级性，到民族和国家上就是民族国家意识。在没有形成一个完全自由平等的利益共同体之前，或者说，当现实的人类社会仍旧存在严重的利益分化，各种利益团体之间仍存在紧张对立的前提下，那种声称代表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注定是空洞抽象的。

然而，西方国家正如它在国内以全民性掩盖阶级性一样，在国际社会中势必以全人类的利益去掩盖国家利益。它们时不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口号，披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外衣，大力渲染“全球一体化”、“全人类利益”、“人权高于主权”、“新干涉主义”，绑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全球意识”，以维护人类利益和人权卫士自居，背地里兜售的正是西方资产阶级虚伪抽象的意识形态。在全球意识凸显的今天，这些口号越来越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这类极具迷惑性的理论面前迎拒两难。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确实反映着人类利益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和愿望，拒绝这些理论和价值观念就有可能陷入道义上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又确实在利用这些“普世”的理论和价值观念兜售他们的意识形态，干涉别国内政。这点只要看看美国等一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其所标榜的意识形态的本质也就昭然若揭了。

全球化过程中所萌生的一些“普世”价值观所蕴涵的双重性质

对我们构成的挑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建设，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果我们停留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去驳斥这些具有双重性质的意识形态话语，必然显得十分无力。比如"主权高于人权"、"不干涉内政"等类似的过于刚性、缺少灵活性的话语，在应对诸如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就很难争取到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民间舆论的支持。再比如在西藏"3. 14"打砸抢烧事件中，正如香港一些评论员所说，我们几乎是在套用"文革式"的高度政治化的语言去抨击"藏独"分子所策划的这次事件，结果使主流媒体的宣传声音未能很好地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这固然与西方国家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有关，同时恐怕也与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在应对这种突发事件中所惯用的一套过于陈旧、呆板的宣传话语有关。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建构一套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价值取向，同时又可参与国际间对话的话语体系，显得十分迫切。

其三，西方强势文化的"话语霸权"对我国成为国际大国的挑战。

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整个全球化进程中占居主导地位。它们凭借发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国际贸易和分工甚或其他的国际交往中占据明显优势。它们既是国家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国际事务中的裁判者。它们这种在生产、分工、贸易、金融、投资、科技、文化输出中的强势地位以及在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运行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势必也使它们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中居主导优势。因为物质经济关系的强势地位势必使得它们的思想上层建筑在全球范围内也占主导优势，致使主导整个国际的制度模式、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和话语体系基本上都出自西方国家。

主导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话语往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这些话语往往在表面上以“客观公正”等“非意识形态”的面貌去掩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比如美国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把那些与他们的制度和价值体系相异或相反的国家称为“恐怖主义国家”、“邪恶轴心国”，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集权专制国家”，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国际社会”，把西方的舆论称为“国际舆论”，并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民主”的代名词，以人权的卫道士自居干涉他国内政，并冠冕堂皇地称之为“国际干预”、“新干涉主义”等。还有诸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机会均等、贸易自由、国际接轨、生态主义等话语，无不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且程度不同地都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分。面对着强势的西方话语，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之不一致的国家往往苦于招架。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倾向于以意识形态划界，主导我们对外交往是一套意识形态倾向极其鲜明的话语系统，比如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霸权主义、国际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等。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但是，在国家交往的具体层面上，比如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我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意识形态的标准去审视一番，生怕引进资本主义的东西。随着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实行，我们一改传统的以意识形态论亲疏的观念和做法，强调以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作为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积极引进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既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也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对于我们打开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要成为国际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能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性，也

不能仅仅消极地被动地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而是在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作出调整，以体现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优势，从而为人类文明作出我们的贡献，这是更大的挑战。

其四，互联网所提供的技术支撑带来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挑战。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和普及起来的国际互联网以及其他现代通讯技术的应用，直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向全方位的、多主体的全球化方向发展，直接触发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互联网以它所固有的穿透力，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突破地缘政治和区域地理的限制，形成一个以数码信息为中心的跨国界、跨地区、跨文化的极具开放性的网络世界。

极具开放性、包容性、扩散性、交互性的网络世界的形成，固然开辟了人类生活的新空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国际间的交往更加方便和频繁。同时，这一开放的网络世界也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进行政治、思想、文化的渗透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技术支撑。它们运用先进的传播理论和技术，通过网络向世界各国的网民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网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冲垮民族国家所精心架构的意识形态樊篱。互联网和现代传媒的隐蔽性、便捷性和自由性，也使得西方的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念可以长驱直入。也由于互联网和现代传媒的上述特点，使得接受者易于也乐于接触各种西方国家的文化消费品，比如青少年所钟爱的西方国家的电视电影、电脑游戏等。特别是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向全世界推行各种电子网络游戏和相关的交互软件，亦使得网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在无形中受到那些电脑游戏和交互软件所承载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些都有利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掌握着话语权和话语传播的主

动权，也威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长远健康发展。

总之，以西方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过程及其产生的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思想理论和话语系统，无疑对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及其话语体系的调整重构提出新的课题。面对新的国际环境，我们一方面自然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和挑战，同时，我们也要自觉地调整和转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价值观念和话语，积极吸纳那些代表时代发展潮流和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为我服务，从而重构一套有别于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话语系统，并可参与国际对话的新的话语体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及其话语体系形成于19世纪中叶，那是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年代，也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大扩张的年代——中国也正是在那时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炮轰开国门的。到了20世纪，那种激烈的战争与革命的形势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人类被迫卷入两场世界性的大战。战争（包括阶级战争、民族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战）的硝烟弥漫全世界。这种局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然而，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整个国际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关系也随之发生重大的调整。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原有的以“战争与革命”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渐被“和平与发展”所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取代。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历史际遇的国家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合作双赢”等价值取向逐步深入人心，“零和游戏”也愈发没有市场，“全球公民”意识和“全球治理”观念也正在被人所关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

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在这种时代主题大转换的历史大背景下，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不免要与鲜活的时代气息相脱节。特别是原有的话语体系基本上着眼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侧重于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社会实践，处处表现出两个阶级和两种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之间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诸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定要去占领”等等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话语，已不尽符合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环境。

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想继续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并对不断发展的实践做出正确的指导，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进行相应的转换。这既是世界发展趋势和时代环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要重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正确定位自身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还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

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壮大，“中国向何处去”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是否可持续的疑虑，也是对我们传统的价值取向的关注。当然，这个“传统”不仅仅是两千多年以儒家文明为主的“传统”，还包括“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化传统，更应该是形成于上世纪革命年代“谁战胜谁”的“革命传统”。因此，调整我们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既是我们“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要求，也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消除国际社会疑虑的战略需要。

当然，根据时代发展的趋势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作出调整，并不意味着同化于资本主义价值观体系中去。恰恰相反，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才能在国际交流与文化对话中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否则，将只能导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失去自我。

**（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和社会转型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挑战**

社会结构是某一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也是一个社会将不同个体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其中有广义的社会结构和狭义的社会结构之分。广义的社会结构，指的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狭义的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有机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也对这种广义层面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剖析，他说："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很显然，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为：社会生产、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式（包括意识形态）四个部分。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狭义的社会结构指的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又相对独立的社会，或指与国家、市场相对应的"社会"，是由公民及其社会组织机构组成的社会，其成员通常包括了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和利益团体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了三十年，在这短暂的三十年中，中国社会所发生令世人眼花缭乱的变革，它是继中国近现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革命”之后的“社会革命”。整个社会因之出现了急剧转型和变迁，它既是对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结构的瓦解，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十年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转换。这种整体性转换不仅表现为微观层面的社会组织的逐步发育和成熟，更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包括所有制结构、利益关系结构、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就业结构、社会价值观念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职业结构等的重组和变革。主要表现为：

其一，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变迁。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单一，全民所有制（实质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整个社会中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整个社会是典型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得到了大大的发展，我国在所有制结构性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不仅包括国有制企业，还包括集体所有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原有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基本形成了一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必然使得分配方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方式和按资本、劳动力、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

其二，组织结构的变迁。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体制是中国社会普遍实行的

一种组织制度，单位是社会进行组织、调控和分配资源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个人与国家互动的纽带和中介。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以单位为细胞，以纵向的组织为中介、高度集权的体制控制之下。在横向层面，各单位和组织基本处于条块分割的状态；在纵向层面，各单位系统的下级高度依附于上级。社会组织之间不是由于自然的分工相互结合、相互配合，而是在人为因素，特别是政治权利因素的作用下，相互隔离，各组织之间缺少沟通、合作和信息互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在实行市场化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大量涌现。政府与企事业单位、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位体制在市场化改革中不断被消解。单位的自主性越来越大，并且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日益密切。个人也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个人对组织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更多的是在职业分工上的配合，而不存在身份上的隶属关系。组织对个人的控制力减弱，个人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社会组织之间也由原来的相互隔离的状态变成了多元互动的、纵横交错的网络格局。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机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崛起，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覆盖范围广，业务范围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社区、环保、公益、慈善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其三，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僵化格局，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除了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外，还产

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大体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更有甚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在不断分化。比如，以所有制标准划分，工人阶级包括国有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中外合资、合营企业工人，个体私营和外商独资企业工人等；以从事职业的知识含量划分，可分为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随着整个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也在不断的分化，农民在很大意义上已经仅仅成为一个户籍的或居住地域的群体概念，而在现实中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外出的农民工人、农村雇工、农村文教科技医疗工作者、农村个体工商业者、农村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干部等阶层。每个群体内部还可以按照收入、财富、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或职业声望等分成若干次级群体。并且，这种阶层分化、流动的现象仍在继续，并未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阶级阶层结构。

其四，就业方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就业结构、就业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从宏观上而言，我国已由一个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农业社会的就业结构，逐步转变为以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为主的工业社会的就业结构。农业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微观上看，突破了传统的“统包统配”的就业路径，就业方式和途径日益多样化，用工方面实行多种用工形式的劳动合同制。传统单一的国有企业就业选择也被打破，在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及其他各种非国有经济中就业的职工日益增多，就业领域也日益广阔，自主创业、自谋职业者队伍也愈发庞大。

上述四个方面的转型，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在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强力的政治统治下，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即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社会的利益主体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群体，个人利益诉求经常在“个人主义”的帽子下遭受批判而得不到合法性辩护，属于被“兼顾”的地位。并且，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和社会分工受到政治强力的抑制，个人利益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停留于维持基本的生存权利上，个人的政治权益和文化利益往往被忽视。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整个经济政治体制的转轨，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出现明显的分化。具体表现为：

其一，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

随着社会群体的分化，原有的单一且抽象的整体性的利益主体趋于瓦解，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利益群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分化，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利益主体。个体利益也由于得到法律的保障而愈发伸张，不再盲目狂热地服从抽象的整体，个体利益意识日益觉醒。

其二，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

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关系必然趋于复杂化，其中有旧的利益主体内部的利益关系问题，也有新生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更有旧的利益主体与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这些利益关系问题随着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制观念的提升而浅表化、公开化、复杂化。不仅牵涉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同时也涉及同一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利益。并且由于各利益主体发展层次的不同，对各种利益的诉求也显现出层次性。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其三，利益实现方式多样化。

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日趋开放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实现利益的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在“市场经济”的这个大海中，各利益主体“各显神通”，竞相发展自己的利益。并且，只要是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各种利益的实现方式基本上都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同时，由于转型期社会制度环境的不尽完善，各种非法的利益现实方式也大量存在，比如权钱交易、欺行霸市、偷盗抢夺等。

其四，利益诉求多样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利益诉求也在不断的提升，不再停留于争取基本的“生存”利益上，而且要向“生活”层面进军。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还要求“吃好”、“走好”、“住好”。并且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各种需求也随之不断被生产出来。此外，当人们获得了经济利益之后，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各种社会利益也随之成为他们争取和奋斗的方向。整个社会的利益领域不断扩大化、多样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马克思认为，思想是不能离开利益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因此，一切历史活动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从而引起最广大群众关怀的程度。于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一定会导致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在“放”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邓小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曾经说过，对外开放是“放”，对内改革其实也是“对内开放”），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社会日益“活化”，在所有制、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思想也必然不断解放，不断开拓创新，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结构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其一，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增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广大人民群众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人民的思想收到意识形态的“禁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解放思想”的浪潮下，人们思想日益独立，不再盲从，整个政治和社会环境也日益开放，“开动脑筋”一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时髦用语，人民群众独立思考的积极性被大大激发出来。

其二，人们思想活动的选择性增强。

改革开放之前，文化生活单一、匮乏，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无从谈起，也就不存在思想活动的“选择性”问题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外大量的社会思潮和各种文化产品涌入国内，国内因自身社会环境的分化而滋生出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这些多样化的思想价值观念在现代传媒、通讯和互联网的作用下得以在整个社会传播开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文化产品不断被生产和引进，人们文化生活的可选余地大大扩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使人们思想活动的选择性成为可能，人们也总是站在各自的利益立场在多样化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系中进行选择。

其三，人们思想活动的多变性凸现。

市场经济是崇尚创新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作用下，各种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不断萌发，使人目不暇接。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变性做过惟妙惟肖的描述，他说：“生产的不断变

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变革，……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的这段描述同样是适用的。

其四，人们思想活动的差异性增强。

思想活动的差异性，实际上是思想活动的选择性、独立性、多变性的逻辑必然，同时也是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的体现。在舆论环境和政治环境相对开放的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思考，并且把思考的结果通过各种媒介表达出来。也由于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民族风俗不同、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其思考的结果必然不尽一致。

上述思想结构的深刻变化，意味着拘泥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工作传统，试图用一套意识形态话语来“支配”所有人的所有思想，肯定是不行了。这就提出了重构意识形态话语的任务。因为：

第一，社会分化产生的各种社会思潮，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化。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使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也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转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而取代所有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局面，已不可能维持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反映市场经济要求和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如民主法制意识、公平意识、效率意识、诚信意识、自主意识、创新意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识等，不断得到推崇。这需要我们将之纳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之中。同时，在此过程中，一些同样是现代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固有的消极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消费性、分散性的固有性质所萌发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小团体主义等，也随着交往的普遍化得以泛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形成了挑战。同时，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流动性的增强，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已出现“真空”现象，无法覆盖到一些新生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辐射范围势必受到影响。

第二，社会结构转型的代价，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社会对其的认同度。

一个社会如处于结构的转型期，往往会使维系传统社会结构的价值体系逐渐被解构，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来不及形成。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性的，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完成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因而需要通过政治力量加速社会结构的转型，加上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稀缺、基础薄弱，有形无形的传统力量依然强大，以及中西固有的发展水平的落差等，我国社会转型的这种特有境遇使之缺少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其产生的矛盾尤为复杂，代价尤为集中。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现代病”，我们都可能遇到，并“压缩性”地爆发，而这些“现代性”弊病，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

因此，虽说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更是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相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未很好地体现出来。而以往意识形态上所作的

"资本主义已彻底腐朽、将被社会主义埋葬"等宣传,其说服力大打折扣,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认同也由此不断下降。转型期的这些社会问题存在时间愈长,愈会使社会成员丧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心,势必会在社会成员中形成一种淡漠、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离心力",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影响力。

社会转型使得某些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公无私"、"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等等,在日常社会生活和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越来越失去现实土壤。相反,那些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价值观话语,却较易被人们接受和认同。而不论人们愿意与否,这种世俗化、功利化的发展趋向,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世俗化、功利化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要求我们改变长期以来习惯于空谈的意识形态话语,去驾驭并超越世俗功利的社会现实。这种"驾驭"和"超越"不是去否定世俗的社会现实,而是在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去引导、整合功利化、世俗化的社会环境,防止陷入功利主义泛滥的境地。即是说,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及其价值取向首先必须是"从社会中来"的,立足于现实的世俗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概括、提炼、升华,再"到社会中去"。这才不至于犯马克思所批判的"头脚倒立"的错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 (三)新的历史起点对重构意识形态话语提出的新要求

如果说我们从农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转变是我们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大背景"的话,那么,我们当前进入改革开放的"关键期"则是我们调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期形成的一套话语体系——的"小背景"。"大背景"要求整个话语主题的转换,"小背景"则只能是对先期话语的"调整"。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它所面临的问题，比起三十年前改革开放起步时还要多，还要复杂。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所说：我国社会正进入一个“空前的社会变革”期，“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在这样一个“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并重的时期，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逐步浮出表面。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问题、“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就业问题、腐败问题、能源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住房医疗卫生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安全生产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等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相互激荡，国民的公共道德、职业道德等方面的素质总体上还比较低下，信仰危机、诚信危机等精神文明建设上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所有这些问题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都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遇到的问题很多都是与发展水平有关，特别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然而，进入“关键期”的社会问题，其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问题范围，除了市场经济体制须继续完善外，还牵涉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相互交错，相互关联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系统工程”。甚至很多问题的解决都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比如，为了解决资源环境的压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我们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淘汰高污染、高能耗、技术含量低的落后产业。同时，又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扩大就业，还要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经济较高速度的发展。再如，近两年我们为了

从总体上缩小投资规模，防止经济过热，实行了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企业的贷款利率。然而，由于很多中小规模的企业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发展道路。结果就是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倒闭，从而不仅威胁到我们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还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更有甚者，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需求层次也在提升。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更高的政治民主权利、教育文化权利、公共福利和安全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被大众所关注。反过来，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主要发展的是经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显得滞后。这样就产生了人们对这些方面的需求与这些方面的发展无法满足人们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总之，正如邓小平所说，发展起来的问题比不发展的问题还要多，还要复杂。在这一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必须以和谐的理念、包容性的价值观来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化解现实中不利社会和谐的各种因素，排除干扰、凝聚人心、坚定信念，从而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地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已经形成了一套以经济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比如“四个现代化”，“富裕”、“小康”和“中等发达”，“发展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三个有利于”等等，而诸如马克思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尚未被自觉纳入每个人的视野。这套以经济为中心的话语体系的形成，既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有它内在的历史合理性。而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和规模，已完全摆脱了改革

开放前物质资料匮乏的状态，社会主要矛盾也有新的阶段性表现，如贫富差距拉大，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民生问题大量存在，社会发育相对滞后。这不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要更加关注这些问题，同时也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要进行自觉反思，把新的社会问题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体系中去，对原有的一套以经济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作出适当的调整。事实上，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作出了一些调整，比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统筹兼顾”等范畴，愈发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话语。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一些反映社会生活变化的新的范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未加以很好吸收和回应的状况，比如利益协调与利益博弈、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社会统治与社会治理、公有财产与公共产品、为人民服务与公共服务、利益团体与利益集团、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实际上，这些话语层面上的差异，反映的是更深层面的理念上的差异。比如：“利益协调与利益博弈”，二者必然涉及进行利益协调或博弈的主体问题。利益协调的主体是超出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本身不是“利益中人”，而利益博弈的主体就是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平衡、协商。前者不仅牵涉到利益协调的主体是否真正客观公正、是否存在偏于特定利益方的幕后交易等问题，还存在一个利益协调的成本问题。如果利益协调的主体是政府，就又涉及到政府是否有必要进行利益协调、以何种方式进行利益协调、进行利益协调的效果如何等诸多行政管理层面的问题；“社会统治和社会治理”，一般地说，社会统治是政治主体利用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干涉、专政的过程，而社会治理是指治理的主体根据法律法规对社会行使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职能。社会治理的主体不仅可以是政府，还

可以是各种社会自治团体或协会，是社会内部的一种自治行为，而且，随着社会系统的发育发展，后者越发显现出其生命力和重要性。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否能很好地吸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内在地体现了意识形态自身理念的转变与否。它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转化，本质上是内容和价值层面的转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和国际形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进行理论创新，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并且起到凝聚民心、整合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这就要求根据转型期的社会变化的现实特点，自觉调整原有的一些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所倡导的不相协调的意识形态话语，对诸如“阶级”与“阶层”、“集体主义”与“公共利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劳资关系”与“劳动关系”、“资本家”与“私营企业主”、“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领导”与“执政”等一系列范畴，在学理层面作深入梳理和论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在逻辑更加严密，思想上更具说服力，精神上更符合现实的“国情”和“世情”。

## 二、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何以是必要的：以理论发展为维度的审视

### （一）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它的批判性。马克思正是将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特别是将理论批判和实践批评结

合起来，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发展史，就是批判的历史。这一批判，深刻地揭示了以往各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深刻矛盾，才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使之成为“彻底的理论”，并从而把握了群众。

改革开放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觉调整的结果，它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随着社会自身的演变而不断调整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固然，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是合理的，但实践超常规地跑到理论的前头，理论自身就应该作出反思。理论不仅要反映社会存在，但更要超越当下的社会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发挥“指导”实践的功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所以常常落后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固然与我国社会转型的快速有关，同时，也有意识形态的自身建设不足的原因。某些意识形态内容甚至话语形式也创新不足，而无法给新的社会矛盾提供有深刻批判力的解释，更无法统摄新的社会现象。例如，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基本上仍然停留于经典作家的已有成果上，尚未有新的概念和范畴能涵盖这些新变化，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如马克思般的深度理论分析和批判。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无法对当前重大经济问题和现象都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从而在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已被边缘化，用来说明解释我国经济现象的，大多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我们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积极成果，但是，必须认识到，由于政治体制和所有制结构不同、发展水平不同，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尽一致，西方经济学理论未必完全适合国内的经济运行机制，未必能完全解释国内的经济问题和现象。如果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用”，则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其整个话语体系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的。其所指向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是属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复存在。然而，我们是在一个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境遇使得我们的社会不仅还保留着农业社会所特有的弊病，同时也存在大量的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弊病。如果从马克思的社会“三形态”①划分理论去审视的话，我们当前的社会还存在着与马克思所说的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类似的问题和困境，如贫富分化；还存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没有而特有的社会矛盾和消极现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犯了“恐资病”，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资本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从而将马克思所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范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作了绝对的“切割”，这就不免要陷入矛盾的困境：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及其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否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对社会主义现实矛盾批判的合理性。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主义”和“现实”的反差，是造成人们思想困惑的根源所

---

①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可见，马克思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学界据此称为“三阶段社会形态论”。

在，它从另一个侧面给“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提供了炮弹。

面对这种挑战，意识形态的工作做过努力，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构不理想，还未完全摆脱上述困境。我们曾经试图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对一些社会现实作出解释，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问题上，其解释逻辑是：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因此，公有制企业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其他所有制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所有制是剥削的根源，因此社会分配贫富悬殊的症结在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为了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因此需要“国进民退”。这套话语体系，没有回答国有企业在实行了政企分开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与其他企业在分配方式上有没有质的差别？如果有，理论上这种质的差别又在哪里？现实中又体现在何处？又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上，传统意识形态主要是抓住“所有制”、“分配方式”和“调控方式”三个话语对二者进行区分，但深入研究市场经济的现实会发现，按如上标准对二者进行区分，在理论上并不那么自洽，因此也难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在“对内话语”与“对外话语”方面，也缺乏一种“必要的张力”，存在某些“紧张”状态。比如在整个社会结构分布并没有质上差别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对资本主义国家用“阶级”概念，如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等；对内用“阶层”概念形容新生的社会群体。还有把西方的贫富分化称为“两极分化”，把国内的贫富分化称为“贫富差距”。对外使用“劳资关系”，对内则用“劳动关系”。当然，这种“内外有别”的现象是意识形态内在固有的“辩护性”和“批判性”的外在表现，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增强国民对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效果。但在全球化的今天，

由于对外交往的普遍扩大，以及现代通讯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往那套“内外有别”的话语体系的实践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给人造成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经常把许多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的东西，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同时面对现代化的规律，我们又不得不引进、借鉴这些东西，并在前面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加以掩饰，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反差造成了宣传上的许多自相矛盾的现象。实际上，过去我们常常强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对于“什么是当代资本主义”也同样没有完全搞清楚。造成的结果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于成长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现代性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造成意识形态衡量标准的泛化。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对内和对外话语上的区别，有时反映了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念上的矛盾。如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对外话语上，我们提倡“文明的多样性和世界的多极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的价值观”、“普惠共赢”、“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等等；但在对内宣传上，依然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将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等话语。对外话语指责西方应摈弃“冷战思维”，对内话语则始终强调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对外话语强调“不划线”，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对内话语则依然坚持“西方敌对国家”的话语，等等。主流意识形态对内对外两套话语及其蕴含的深层次矛盾，都要求我们必须对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作出新的、前后逻辑一致的梳理。

总之，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

重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 （二）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创造力

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迁而随之发生调整和变化。一方面，意识形态必须植根于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把朴素形态的社会实践经验通过加工提升为系统的思想理论形式，从而实现自身的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又要求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秉持包容性、开放性的精神，积极与其他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形式对话交流，从中吸取合理有益的成分丰富和发展自己。如果说前者是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与时俱进之“源”的话，后者则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之“流”。

在中国，占据意识形态统治权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遇到挑战，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性，然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涵建设的角度作一下反思，不可否认的是，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学科分类原因（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被分在三个一级学科分别加以研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础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理论结构以及价值目标研究不够；另一方面，近些年对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根据、理论主题以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研究，能提供深度学理支撑的少。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认识以及对其当代价值的发掘，从而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巩固，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积极应对和理性批判能力。

而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观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创造力不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角度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把“主义”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很好结合起来，

或者是就“主义”来研究“主义”，或者为了急功近利，对“问题”的研究陷于“实证”的倾向；二是没有很好地实现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互动，不能积极地吸收改革开放以来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对各种历史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新成果、新范畴和新概念。

这样，在当代中国面临的体现“主义”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前，如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原则和特征的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及其与现实途径选择关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关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和谐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以及社会矛盾的关系，阶级、阶层、群体、集团的关系，时代主题和国际战略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选择性的关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世界存在的多样性的关系，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依然在固守原有话语体系，力图“自圆其说”，却常常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解释力，从而影响到对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对同类问题研究的指导力。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许多范畴对反映今天的社会转型已是捉襟见肘了。例如，关于“个人、集体和国家”，尽管改革开放后理论界力图纠正单向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加上了“国家和集体要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的内涵，但这依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利益分化的状况并规范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调节，因为在这一话语关系中，有“利益”而无“权利”，有“国家”而无“社会”，有“集体”而无“集团”、“团队”以及“公共”，而无论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还是社会学，早已使用“权利”、“社会”(指“小社会”，含“社区”、“社团”、“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等)、“群体”、“团队”、“集团”、

“政府利益”、“公共利益”、“公共产品”等概念，并以此为研究社会矛盾的基本范畴。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其话语的创造与更新，一直滞后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以“社区”概念为例。当社会学刚引进“社区”概念时，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基层社会组织，这就是“街道”和“居民委员会”，由于“社区”的组织形式是自下而上的，而“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则是由党和政府领导的，于是把“社区”概念的引进当作可能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加以拒斥。殊不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的发育，才能使社会完善和进步。这样主流意识形态才逐步接纳了“社区”概念。同样，早已成为社会学基本概念的“社会中介组织”、“民间组织”、“社会建设”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接纳它们，都是滞后的。而如今，社会学中的“非政府组织”、政治学中的“执政的合法性”、政治学和伦理学中的“公民社会”等概念，在这些学科中已成为基本范畴，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依然加以排斥，或羞羞答答勉强运用。

总之，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创造力，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突破在原有话语体系中“自娱自乐”的状况，在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对话和互动中，不仅吸收这些学科能更科学地反映社会生活变化概念和范畴，更需要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需要重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 三、重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何以是可能的

所谓“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话语体系，是在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的基础上，坚持它的核心话语，调整和充实它的外围话语，使之能够更鲜明地体现党的理论创新多带来的新的丰富的意识形态观念。因此，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可能的。

### （一）理论的审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不断建构和更新的过程

任何科学的理论，其科学性都不在于它的所有结论和支撑这些结论的话语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有它的内在结构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观察经验并不能直接“证实”或“证伪”某一理论，这不仅是由于观察有主观性，更是由于科学理论是复合体，具有“韧性”。而科学理论之所以有“韧性”，是因为它们都具有自己的“范式”，即这一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以及共同使用的理论模型和方法，从而形成共同的研究传统和发展方向。这样，科学史的发展，就是一个量变和质变互补的动态模式：当某一时期的某一研究领域形成了“范式”，科学家会尽力维护它，并用其解释各种经验现象，科学发展处于常态时期；当原有“范式”解决问题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科学发展进入“反常”和“危机”时期，这就需要抛弃旧“范式”，建立新“范式”，这就是科学革命。之所以称其为“革命”，是因为新旧“范式”因其具有不同的信念和理论模型，因而具有不相容性和不可比性，类似政治革命。拉卡托斯则更进一步把科学理论看成是具有硬核、保护带、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等一整套“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结构体系。其中，硬核是基础，它不容被“证伪”；保护带是由硬核所演绎出的一系列辅助性假说；反面启发法是禁止将经验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的规定，正面启发法是完善辅助性假说以避免硬核被证伪的鼓

励性规定。由此，科学发展即是由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到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再由进化的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的过程。而在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由于理论的上述结构，使其在面对不利于自己的经验事实出现时，能通过调整保护带来转换问题指向，促进理论进步。

借鉴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理论，可以认为，任何理论都既有“硬核”，即由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所组成的“范式”（包括出发点、基本原理和价值目标），它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又有“保护带”，即由这些核心观念适应一定时空条件而推出的具体结论，它们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外围”。一个科学理论的时代价值，既体现在它的“硬核”上，又体现在它的“保护带”中，即它的“外围”在多大程度上能提供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因此，如果实践和时空条件发生了变化，就需要调整“保护带”，以通过解释新的现象而支持“硬核”不至遭到“证伪”。而调整“保护带”，就需要调整话语体系。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同样应该作如是观。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做到“四个分清”：什么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什么是需要结合新实践加以丰富发展的判断，什么是需要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什么是需要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态度。

我们需要重构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即这一话语体系应该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思想进程来看，马克思是把理论批判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形成了他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在理论批判中，马克思首先确立了其理论立场，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即他既

不是从物质、也不是从精神出发来看待世界，而是从社会实践的“人”出发看待世界特别是社会历史，他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由社会实践所确定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理论立场影响到马克思的整个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使他确立了通过无产阶级解放来实现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立场，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而诸如“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和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原理，不仅是马克思从他的理论立场出发而破天荒地发现的，而且正是运用了这些原理，马克思才论证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回答了时代课题，因此，它们才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而马克思在整个理论论证过程中，也是从他的理论立场出发，形成了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超越前人的科学性之所在，而且具有了超越一个半世纪时空条件的价值。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它们一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得以支撑这些立场观点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话语，我们必须坚持，才能更好地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形成中所蕴涵的新的话语。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一理论品质来源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本人及其发展者始终都把人类社会的实践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曾提

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的千古名言。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看待，而是自觉地根据新的实践条件和时代条件不断调整原有的一些过时的结论。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之后重新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作序时就说：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中的一些观点、一些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如果可以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②]。这高度体现了经典作家十足的理论勇气。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才可能根据新的实践背景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此过程中必然也要根据新的内容的需要，不断地对调整原有的表达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更新。实践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④]。因此，语言本身也必然随着人类实践领域的扩张和深化而不断发展、更新，以适合新的交往实践的需要。

**（二）实践的审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审视：重构话语体系的新空间**

十六大以来，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等战略思想，这些重大的理论创新，包含诸多意识形态理念的变换，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例如，改变了对脱离人的现实需求为目的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理念；超越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解决，形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新目标的理念；调整了以利益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的观念，形成了推进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念；肯定了群众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进步意义，强调维护公平正义以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体系是维系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基础，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保障和党的执政基础的思想；摒弃了自上而下的一元化领导方式，形成了党以执政者的角色来调整同社会组织和群众的关系的理念，以及社会管理主体和手段多样化的理念，丰富了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管理的思想；形成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战略的思想，等等。

而这些理念的创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视域中，力图更好地体现马克思所揭示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形式的统一，它们自然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但是，这些新的理念，不仅亟须获得有力的学理支撑特别是深刻的哲学基础，而且还需要有能得以沟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新的话语来加以更清晰的表达。因而，党的理论创新，已经为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学术语言以及意识形态宣传话语，提供了激励的动力和丰富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调整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 第六章
# 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本章提出了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目标和途径。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核心话语，以“以人为本”为价值导向，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处理好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宣传话语及其同日常生活话语的关系，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矛盾的解释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能力，增强在国际领域的对话能力。

## 一、目标：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权

所谓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内涵是指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体系，其目标是增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而并非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话语，或者西方话语来取

代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但是,原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又必须调整,才能明确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一)基点: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仅具有反映社会生活,还具有规范社会生活的功能。而意识形态的这些功能的实现,往往是以话语体系作为载体的,即通过特定的语言(具有特殊内涵的概念及其之间构成的逻辑关联),对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心理进行“过滤”或“反哺”。在这一过程中,某种意识形态要能获得统治地位,不能单纯依靠政治权力,而必须牢牢掌握这种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产阶级政党动员群众的口号,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过滤”社会生活,其中体现了对社会生活的“顺应”,如,如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前提出“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毛泽东领导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构,使其获得了社会大变革中的话语权。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话语,改革开放之初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话语,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也反映了群众的期待与愿望,成为老百姓的日常话语,从而掌握了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并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党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它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既不追求思想的绝对统一,也不对社会思潮放任自流,而是要既承认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对增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和活力的积极作用,又要整合和引领多样性的思

想文化和社会舆论。而由于社会认同和思想共识具有相对性，是一个依社会条件和人们实践地位不同而发生的“变量”，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有效地发挥其反映社会现实、影响社会思想、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就需要不断调整其话语体系。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诸多话语，还存在比较严重脱离日常社会生活的现象。网上评选的2009年部分热词，如“钓鱼执法”、“欺实码”、“楼脆脆”、“被就业”等，表现了群众对社会公共事件关注的主动性和推动事件发展进程的强大力量，更是公民意识觉醒的体现。特别是“被……”的广泛使用，如“被自杀”、“被就业”、“被捐款”、“被涨薪”、“被幸福”、“被艾滋”等等，其流行表达了公众对于公民权责名实相符的诉求。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网络媒体语言分中心、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09”网络征集，经由网民推荐、专家评审、网络票选等阶段，最终“被”和“民生”分列国内年度字、词的第一，反映了网民对当下情势的心态。遗憾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没能敏锐地深入研究这些话语的社会批判意义和对社会进步的价值，因而无法吸纳其积极内涵以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同日常生活话语的和谐，并最终影响日常生活话语。

不仅如此，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有时依然显得内容空洞、抽象，甚至充满被毛泽东当年辛辣讽刺过的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八股”味。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党政机关领导人的演讲发言，而且大量存在于各种党刊杂志和其他电视等媒体，甚至于很多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文章。面对新情况、新形势，仍然不加分析地简单照搬照抄旧时范畴，大量的老话、空话、套化、废话不绝于耳。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对某些理论的阐

述，动辄就是“新口号”、“新概念”、“新论断”、“新思想”、“新思路”、“新举措”、“新规划”，几年甚至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有那么多的“创新”，而干部群众更是难以消化和吸收。对党的写创新理论思想的宣传，动辄就是“关键是……，核心是……，灵魂是……，精髓是……，主题是……，本质是……”等等，不一而足，“关键”的不是“主题”，是“主题”的又不是“本质”，制造了诸多逻辑混乱，使干部群众更难把握这些思想的要领。事实上，“核心”、“灵魂”、“精髓”等话语，本身只是比喻而已，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内涵是需要界定的，现在不加任何界定，使它们失去确切的价值，而仅仅成为“文字游戏”而已。领导作规划报告，动辄就是“中心”、“核心”、“龙头”、“高地”、“国际大都市”、“国内一流，国际领先”，却无对这些概念的理性批判及其转化为实践的实证研究，也被老百姓视为大话和空话。

根据波普尔的“可证伪度”理论，一个命题的“可证伪度”越高，其所可能包含的科学性就越强，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或更精确的信息。而我们某些意识形态宣传的话语，普遍存在一个“可证伪度”不高的毛病，结果就是外延广泛，内涵贫乏，没有给人民群众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而被老百姓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废话，必然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总之，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话语主导权，以更有效地引领的多样化的社会思想，需要在吸收和改造日常社会生活中反映人民群众合理愿望和要求的鲜活的话语，以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

关于话语主导权问题，有些著名专家学者，包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在理论创新上有重大建树的理论家，感叹当前“许多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批判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而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倒是

畅通无阻”。他们认为，现在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占领舆论阵地，没有真正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因而要求“给宣传正确思想，批判错误思想以更多的话语权”。

根据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①。“话语权”既然作为一种权力，就一定离不开政治统治权力。因为一定的阶级如果掌握了政权，一定会利用它所掌握的物质力量（包括物质化的精神力量），来为自己的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护。

然而，对马克思这段经典论述的阐发，须注意两个方面：其一，这里揭示的是对有阶级以来社会历史中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关系的实质，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时，更应强调自己所代表利益的普遍性，强调其思想对社会“治理”、“调控”和“引领”的作用；其二，掌握统治权力的阶级，其思想在社会上毫无疑问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依靠其掌握的物质力量和政治权力，仅仅是维护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必要条件，并非是使其思想成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或“主流”思想的充分条件，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想本身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存在和发展，有其对于物质生产方式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由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仅靠政治权力来“赋予”某种思想或言论以“话语权”，是无法充分地“获得”这一思想或议论的“话语权”的。某一思想或言论的话语权的获得，即它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或支配思想，意味着它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己，正如马克思所精辟地指出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而所谓满足“国家的需要”，归根到底是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其实，马克思的思想在1848年问世时还被视为“幽灵”，而受到欧洲一切旧势力的联合围剿，当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给予马克思“话语权”。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理论就掌握了欧洲工人阶级，并且很快传遍世界，依靠的就是它的理论魅力，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力和对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辩护力，从而在工人运动中具有了“话语权”。

政治统治权力可以为某一思想的传播，提供诸多物质条件乃至精神条件的方便，然而，某一思想要能真正掌握群众，是靠其对社会矛盾的批判能力和对社会生活的解释能力，从而真正满足这一国家和民族在这一时期的需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真理的力量。而真理同权力的结合，尽管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但它对真理本身的发展，既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有时也会起到阻碍甚至破坏作用。

邓小平在1978年被后人赞誉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对粉碎“四人帮”两年后不少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很不解放，还处在僵化半僵化状态的原因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出深刻的分析，其中第一个原因是："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①]这意味着，"四人帮"的可怕，不在于他们制造假马克思主义，而在于他们"搞禁区、禁令"，动辄"追查、扣帽子、打棍子"，而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因此，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大声疾呼，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②]。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不仅需要党牢牢掌握宣传工具，更需要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社会问题的解释力。于是，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目标应该是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使其能真正掌握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二）原则：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应确立重构的基本立场。立场是指话语体系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它是构建话语体系的出发点。任何一个话语体系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或群体的利益的，而不同阶级立场不同自然话语体系各不相同。封建主义话语体系是代表封建贵族阶级根本利益的，其核心话语是"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是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民主"、"自由"、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人权"等是其不触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核心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以实践为核心概念而展开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核心话语，代表了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导致人类不平等、片面而又畸形发展的根源都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所要批判的对象。

当前，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因为其具有不可磨灭的当代价值。

其一，国际交往领域：构筑国家文化安全网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美苏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终结后，经济全球化更迅猛席卷世界，同时，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现，网络等信息传播手段的普及，使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在国际上影响的扩大，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所受到的压力，不仅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减弱，反而越来越大。这里固然有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不适应的原因，有不同文化传统所造成的社会公众在价值观背景上差别的原因，有西方媒体在趋利本性驱使下对舆论诱导而造成的不利影响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西方一些人把他们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作为推行其"软权力"而实现其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的国际战略是推进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设，推进世界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为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我们在国际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由此，在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我们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但又不以冷战时代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来回应上述挑战。我们既要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袭，又要保

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放性。于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思路，就必然是突出既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变化的精神力量、又符合中国当代社会进步要求、同时又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价值观，使之在国际上能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而这些工作，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和整合。中国共产党有责任高扬符合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初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这样的发展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体系，既更好地延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之脉，又为后发国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现代化理论，通过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为人类文明宝库增添新的内容。

其二，政治生活领域：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确立发展方向提供理论基础。

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凸现，使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矛盾特别是不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各种社会“问题”的背后的“主义”特别是其中价值趋向越来越凸现出来。原有的在政治领域存在的包括“自由化”和“僵化”等在内的各种思想倾向，在提供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的时候，其基本思路和价值导向上，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对同一社会矛盾提出的大致相同方案，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也大相径庭。而对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案的选择，既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不至成为西方的附庸，又关系到能否把握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因此，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突出中国共产党同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价值观的一致性，是十分必要的。这就需

要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乃至核心价值体系，以此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价值观基础，并明确和保证国家和社会今后发展的正确方向。

其三，思想文化领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繁荣。

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绝大多数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或不同程度带有意识形态属性，而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因而，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直接或间接、自觉和不自觉、完全和部分地在为经济基础服务，也就是在为一定的利益关系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作论证和宣传。当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依据自身发展的逻辑越来越趋于独立性的情况下，其关照社会现实的功能和作用并没有改变，但是，它们会以不同的理论范式和价值取向来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出现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必然趋势。而任何研究社会和人的理论，都无法回避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而马克思主义在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论证上，远远超过前辈的思想，它理应成为对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具体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能够面向日常生活世界，背靠价值意义世界，在透析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矛盾的背后的“主义”问题时，在回应社会现实热点、理论解释难点和群众思想疑点时，在评价各种理论模型和思想观念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其他社会思潮的理论优势和价值观优势，同时抵制各种危害社会进步和人民思想健康的错误思潮，进而掌握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主导权，从而真正起到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作用，成为社会思想文化前进的“方向盘”。

其四，日常生活领域：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和社会转型的稳定仪。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速发展和矛盾凸现时期，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决定了人们利益关系的多样化，而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又决定了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自立、竞争、效率、民主法制、开拓创新的意识增强了，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也增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又需要在日常生活领域，尊重和包容有差异的多样价值观，在这一尊重和包容中，扩大社会认同和增进思想共识，凝聚共同的价值观，用共同的价值理想的合理性来提升群众的不同价值追求。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映社会进步价值观的理论表现，既能够对多样价值观的合理性及其实现条件作出科学评价，又能够"整合"现阶段党领导人民奋斗成果中的精神因素和人民群众对自我价值追求中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价值理想，有效地转化为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动力因"。

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应该是人民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力的社会，而其中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是参与权和监督权得以实现的前提。然而，人民在使用表达权时，往往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变动性；容易使一些人不能理性地处理义和利、权力和能力、人情和制度、关系和努力、依附和自立的关系，由此造成表达权使用上的非理性状况，而不利于社会转型时维持必要的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一个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能没有相对稳定的、既反映社会各种价值观的变动、又同党的最高价值观之间存在某种平衡点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社会转型的"稳定仪"。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善于抓住事物根本矛盾的理论彻底性，能够"解蔽"社会矛盾，就能说服人，就能发

挥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导向功能。

### （三）重点：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语言

党的理论是在应对不断产生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的挑战中实现与时俱进的。社会需要稳定，因此，意识形态要对“现实”进行辩护；但社会又要发展，因此意识形态又要对“现存”作出批判。这就需要在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和“辩护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它统一在对社会矛盾的“解蔽”而非“遮蔽”上。如果我们不仅承认利益分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的现实性，更能揭示这些矛盾产生的主客观根源，评价这些矛盾背后的价值背景，指明这些矛盾解决的价值趋向，从而引导群众正确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发挥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并非仅仅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话语，它其中蕴涵的发现新世界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新世界，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然而，我们又必须承认，从列宁主义以来，第三国际旗下的各国共产党及其后来所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均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境下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而对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和平共处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原有习惯使用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许多概念已严重滞后了。因此，迫切需要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

马克思主义是以理论形态存在的，是由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发现”的科学理论，然后由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开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获得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需要在政治话语以外，在学科范围内获得学术语言的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还建立不久，其发展初始，就面临着学科意识不强的三个倾向，即用相关学科替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的替代倾向、用教育意识替代学科意识的简单化倾向、学术研究问题意识不强导致的表面化倾向。[①] 这三个倾向，使得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其学术地位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地位不相匹配，在话语表达上出现政治强学术弱的态势。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构，就是要在话语上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科而应该具备的学术水准。要加强理论研究，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出发，建设性地思考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沿问题，这离不开一定的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发现问题、回应问题与发展理论、建构体系之间，发现问题、回应问题更具有第一性、前提性，学科体系只能在对问题的有力回应中才能得以科学的建构。

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需要处理学术话语同政治话语和生活话语的关系，以为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更好的学理支撑，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发挥更好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该给党的意识形态提供学理支撑，以使之能真正引领社会思潮，这就不能简单地搬用政治话语，否则就是作“循环论证”而降低了其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应该给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提供话语转化的路径，以使之能实现大众化，这就需要在党的政治话语和大众的日常话语中，做好转化的中介工作。

学术当然要对政治生活和日常社会生活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通过迁就政治生活或日常社会生活来实现，而恰恰需

① 郝贵生:《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06年第10期。

要通过学术对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提升来完成。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要在政治生活领域和学术生活领域体现指导地位，在日常生活领域里也要具有引领作用，这样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才不会被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要提供意义引领，即通过其价值观的确立，以及人文关怀的彰显，揭示出现实生活的意义，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为他们自己的存在”，变成人们所追求的“有意义的生活”，坚定大众对于生活的信念和信心。

总之，要重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需要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并以这一创造为着力点，去影响政治语言，并转化为生活语言。在这一过程中，要努力提升日常生活话语中能够体现社会进步的“智”和“意”的“情感”类话语，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社会影响作用，以有效地掌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 二、路径：话语批判和吸纳借鉴

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其大致途径是：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性梳理，对哲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话语的批判性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批判性继承，对国外各种社会思潮所用话语的批判性借鉴，以及对日常生活话语的批判性提升。通过在这些批判基础上的吸收和借鉴，以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意识形态的“辩护性”的统一，以对体现不同价值观（如历史性的传统价值观、阶段性的革命价值观、引入性的外来价值观）的核心话语进行综合，使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更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

### （一）对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梳理

在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处理上，除了对纯粹为革命战争服务、而已不适合社会转型特别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范畴加以摈除外，更需要对诸多过去经常使用并且人们已习以为常的范畴或概念重新加以解读，赋予这些范畴以新的内涵。

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需要确立的核心话语是“以人为本”，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中所蕴涵的核心话语——“人的实践”，又充分反映了党对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它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更体现了当今的时代精神。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遇到过教条主义话语的垄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被解读成没有人作为主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因果链条，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被解读成人类诞生前就已经被预设好的所谓“物质运动”的规律，总之，现实的人被抽象掉了，人的需求以及为满足需求而进行的活动被阉割掉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人们往往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误读成“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甚或“GDP 高于一切”。现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把确立为“以人为本”，这真正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以往，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时，人们比较突出其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话语。今天，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论，但可以赋予阶级分析以新的内涵，一如毛泽东当年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为理论基础，但并不拘泥于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作的分析，而是将分清“敌、我、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那样，以新的社会矛盾为基础，以对包括生产资料、信息，乃至公共产品以及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等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为依据，来区分各社会的各个阶层，而摈弃简单地

以“无产”和“有产”为标准的分析。

需要重新赋予“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指导”和“加强”的内涵。不仅坚持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即所具有的阶级性，更需要突出它本来具有的反映人类进步的文化理念，使其在社会意识多样化的过程中，能起到引领作用。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不能变为对各种社会意识发展的“取代”。意识形态地位的“加强”是与其功能的发挥联系在一起的，功能发挥不好就会出现意识形态的风险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充满活力，使之能够“彻底”发挥对新的社会矛盾的解释作用而非“遮蔽”作用。总之，意识形态既不能“淡化”，也不能泛化，更不能回到“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去。

需要突出“需求”和“利益”范畴在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以“实践”为逻辑起点构建其话语体系时，是把“需求”及其“利益”的满足，作为生产力实践发展的原动力，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关系不断分化的直接原因，更作为国家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得以产生的中介的。而以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缺乏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范畴的地位，这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陷于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①]发展市场经济在精神领域的突破，就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在于从重义轻利到正视利益，其中又蕴涵了自主、平等、竞争、效率、信用、法制等价值观念。党的十五大承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变化，其中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从而提出，要从制度上保证“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安定团结。而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利益”一词出现27次，频率之高实属罕见。它认为“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要把“党的先进性……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党的十七大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能够反映人民群众对利益的诉求，才能使这一话语体系形成现实的基础。

需要重新界定“民主和集中”关系的内涵。以往，我们对民主的解读，往往侧重于“手段”、“作风”，强调领导者要“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哪怕是反对自己的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些在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时形成的观念，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特别是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后，上述对民主内涵的认识，显然是不够了。邓小平早在30多年前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问题上的教训时，就指出：“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过去一个

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邓小平还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②]这表明，邓小平将思考的重点放在民主以及民主制度上，认为真正能保障民主的，不是“集中”，而是“法制”。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概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更表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发展民主已不仅仅是“手段”，而且已成为“目的”。

需要丰富关于“劳动”和“资本”的内涵。以往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话语时，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与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完全等同，将对劳动的肯定与对工人阶级的肯定完全等同，而将资本与劳动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完全是科学的和合理的。然而，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扩大劳动和资本的内涵，将对知识的创造和直接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运用，也当作劳动，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一切劳动；而将对资本的运作当作现代经济的条件甚至是核心，当作可以为不同利益服务的中性的概念，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充分发挥资本在物质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又限制它的弊端，即既用好“资本”，又不搞“资本主义”。

### （二）对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话语的批判性吸纳

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历史进行批判并揭示其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它是对人类特别是欧洲思想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和超越的产物，它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而是将人类文明推向了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高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狭隘的宗派，从来不排斥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而是要从其他学派吸收各种有用的思想资料、研究方法和有价值的意见，甚至概念和范畴。摩尔根是一位人类学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古代社会》对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不断丰富。同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反映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更在完善。而在“左”的思潮横行的年代，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或者被边缘化，或者干脆被取消，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们的发展给人突飞猛进之感。为了反映社会现实的变化，这些学科或者创立了许多原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没有的或不被强调的话语，或者从西方的理论中引进了诸多新的话语。于是，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不应该“自娱自乐”，而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互动，在互动中，批判地吸纳哲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新的直接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概念

和范畴，使它们在与马克思主义原有的话语体系的相互冲撞中，实现某种程度的对接，这样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

例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构中，需要批判地吸收“公民”的概念。我们过去强调“人民”的概念，而“人民”同“敌人”是一对范畴。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突出人民同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冲突，能起到有效地动员人民群众打破旧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作用。今天，共产党依然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的奋斗纲领，因此要保持作为革命党的本色，有继续使用“人民”概念的必要性。但是，作为将长期执政的党，必须面对必然会遇到的如下新问题：其一，作为执政党，所构建的意识形态话语如何体现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协调，而非强调某一阶层同其他阶层在利益方面的冲突；其二，人民在同剥削阶级构成的统治集团对立的条件下，其自身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利益又是分化的；其三，强调人民的革命性，是作为政治话语在使用，它体现了人民作为整体的根本利益，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重视个人眼前利益的实现和各项权利的维护；其四，以往分清敌友的依据是以经济为基础而划分的阶级，今天，根据依法治国的方略，法律原则已是无罪推定，即只要没有现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不能够“先验”地将某人或某一集团划入“敌人”的范畴的，即使是犯了严重罪行甚至被宣判死刑的人，也不一定能称之为“敌人”，何况在刑法上还取消了“反革命”这一罪名。因此，用同“敌人”相对立的“人民”这一范畴来定位社会的主体是不够的。

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早已引进并频繁地使用了西方的“公民”概念，这是值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借鉴的。其实，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已开始“借用”这一概念，如我们在道德建设中，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政治建设中，提出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公民道德”和“公民意识”概念的使用，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它们比“人民”概念更具体，更突出个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只是“公民”概念的本身，还尚未成为我们指称社会主体的主要话语。当然，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对“公民”概念的使用，需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即应赋予它适合中国国情的内涵，使之能与“人民”这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使用且干部群众已习惯了的概念相协调。因为，毕竟西方话语中，将“公民”与“社会”结合的“公民社会”概念，是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发展而来的，且它表达的是与政府、政党相对立的范畴。

又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构中，需要批判地吸收“群体”甚至“利益集团”的概念。我们过去强调“群众”的概念，而这一概念与“干部”是一对范畴。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群众路线”，把本来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工作方法，提升到“路线”的高度。其背景，是在革命战争时期，需要一个职业革命家集团来领导和推进革命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而这一革命家集团为了获得成功，必须获得最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由于他们在白色恐怖下不可能有自己特殊利益的考虑，于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因其关系到党的生命和革命的成败，而又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命，故成为路线问题。然而，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能够成为领导集团一员的，作为政治家，只是因为他有从政的愿望和能力，他也是普通公民，与其他公民只是在职务上有所不同，其权力是直接源于公民的授权，他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并不天然代表所有公

民。在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的情况下，以干部和群众作为对社会阶层的最基本的划分，显然是不够了，而需要引入社会学、伦理学等早已频繁使用的“群体”甚至“利益集团”的概念。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话语的批判性继承**

中国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续几千年而从未出现过断层的文明古国，厚重的历史积淀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人们创造历史，都是在以往继承的基础上创造的。同样，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连续性的，任何新思想和新文化都是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选择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结出的丰硕果实，它在中国的成功，是基于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亦即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适合已经融入世界的中国的需要。然而，要将这种需要转化成实践力量，还需要吸纳中国本土的文化元素，特别是其丰富的话语表达形式。

在这方面，如第四章所述，毛泽东是一位楷模，他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遵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创造了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文化。他曾经指出：“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①

毛泽东在阐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7—838页。

化元素的运用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他在强调共产党人的思想修养时，一直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源于《老子》的“自知者明”；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对于达到全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时，用了“源浊则流浊”的典故，这源于《孔子家语》的“源清则流清”；他用“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必须亲口尝一尝……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能有中肯的分析”来表达实践的重要性，这又源于《孟子》的“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王道，不学不知其善也”。毛泽东将他所著的《实践论》署上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又是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知和行”关系的哲学范畴。

今天，要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处理好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的关系，挖掘沉淀在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中的传统话语，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批判改造，赋予其时代的内涵，同时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更显示中国风格，这样才能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我们完全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诸多话语，特别是哲学范畴，如“天和人”、“义和利”、“知和行”、“道和德”、“诚和信”、“名和实”、“人和事”、“阴和阳”、“道和器”、“有和无”、“动和静”、“心和物”、“理和物”等等，进行批判性的改造，运用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因为它们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德性，与西方哲学范畴相比，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更倾向于整体性、有机性和连续性，挖掘这些话语的价值，有助于今天对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构建。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便是成功继承“和合”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话语的又一典范。当然，这一继承和吸纳，包含了批判的成分，亦即通过改造而赋予它

时代内涵。毕竟,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与儒学所主张的"和合",无论在历史基础、思维方式、还是在价值目标上,都不完全等同。"和合"思想的历史基础是农业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还只是地域性的存在,人被束缚在土地上,必须顺应自然;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是现代化,我们只能在改造自然的基础上追求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和合"思想的思维方式是静态的、形而上学的,它强调的是交往关系的狭窄性和社会关系的不变性;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维方式则并不回避矛盾,而恰恰是在正视矛盾基础上才提出和谐的理念,强调对矛盾的化解,而且认为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变化的、发展的,并存在所谓绝对和谐的"终极目标"。"和合"思想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维护等级秩序的和谐,即稳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关系,当每个人都守住自己的名分,并按这一名分行事;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则是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和谐,每个人平等基础上的和谐,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 (四)对国外各种社会思潮所用话语的批判性借鉴

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构,既要体现本土化,也要体现全球化,要有更加宽广的眼界,从东西方不同话语的对话中,重塑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非常重视学习国外的语言,他曾经指出:"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好的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

们的新鲜用语。”①

在同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上，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要以世界眼光和科学态度，充分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有益成果，批判地借鉴体现人类进步、反映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民族传统今天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具有共同价值的范畴和话语，如“物化”、“主体性”、“整体性”、“实践一元论”、“文化领导权”、“社会批判”、“社会生活批判”、“合法性”、“解构”、“重构”、“匮乏”等等，赋予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具体内涵，成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现实、解释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同时通过话语借鉴，获得并保持东西方的文化平衡，建立有利于文化沟通的概念和语言（包括学术语言），能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全方位地推向世界，在与国际主流文化平等对话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例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构中，需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约定俗成地使用的“执政的合法性”概念。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地位，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的结果，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规定了的，不容置疑。然而，中国共产党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执政党，确实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重组和扩大的挑战。当然，对于执政的合法性，我们不能陷入“选举的合法性”，甚至是“直接选举的合法性”的陷阱，因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执政合法性”理论和概念。但是，批判地借鉴这一概念，并赋予其中国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一场革命给人民群众带来直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7页。

接利益的“执政合法性”，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折旧”。而社会生活多样化所决定的利益群体的分化，必然会使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以及新形成的利益群体，来拷问具有领导地位的党能否代表他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作为执政党，是“合二为一”的，但是，无论从历史渊源的长短看，还是从承担责任的无限和有限的角度看，还是从权力覆盖范围的大小看，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内涵和外延是有区别的。我们把领导党的话语等同于执政党的话语，认为过去居于领导地位，就永远居于领导地位，而不知从执政党的视角看，“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①。

当然，在与西方学术思想进行交流和与西方社会思潮进行碰撞中，对其话语必须注意批判地借鉴，要赋予其中国的学术内涵，使之在中国具体化。切不可“以西（西方学术理论）解（解构）马（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消解在西方的语境之中。现实生活中，近年来有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十分陌生，只醉心于搬用某些西方学者（甚至是二、三流的学者）提出的理论模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本本主义”。有些人甚至把是否掌握西方理论的“话语系统”，作为他们所谓“学术圈”的必要条件。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只有防止食洋不化，才能在国际交流中创造良性互动的条件，为重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争取西方话语资源。

---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五）对日常生活话语的批判性提炼

无产阶级在成为执政党后，应该在意识形态话语中逐步表达自己所代表利益在现实上的普遍性，以使自己不断扩大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为此，需要尽可能汲取人民群众在表达自己利益时使用的话语，或者至少是群众能明白的话语。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很朴实的道理”，但是，由于它产生在西方近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有它自己的逻辑表达方式，因此，需要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创造和转换意识形态话语形式时，要注意保持体现核心内容话语的相对稳定性，否则干部群众便不能适应。

用马克思主义向群众宣传，要注意文风问题。目前，“新党八股”等不良文风，严重窒息了党的理论的活力。优良的文风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整个过程之中。而改进文风，就要求我们善于运用群众所创造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话语方式。普及性的理论文章和宣传性的文章，一定要坚决删除那些“穿靴戴帽”的套话、大话，勇于摈弃那些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章，特别是要尽可能避免对群众使用“我们必须……”、“你们应该……”等命令式的话语，因为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年代，要强行命令群众必须按一种价值观行事，而否定他们按实践环境的不同作出价值观选择的合理性，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了，况且，说“我们必须……”的作者，一定能够代表包括群众在内的“我们”吗？把个人的价值观强加在群众的头上，群众不是“被代表”了吗？

在向群众学习语言的问题上，毛泽东又是我们的典范。他在延安时期所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辛辣地讽刺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

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他还认为："人民的语言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一篇文章，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习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因此，我们"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1]。他在写文章和演讲中，就大量地使用了群众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并赋予它们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如在群众和革命的关系上，用"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在游击战争的战术上，用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群众清晰明白的话语；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和现实关系思想时，使用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话语；在论述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用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等等。

因此，在处理意识形态话语同日常生活语言的关系上，应尽可能地筛选日常生活中既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和群众心理的语言，提升这些语言的学术含量，赋予它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这类文章所用的话语，应是"三贴近"的话语，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样，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7页。

# 第七章
# 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

本章论证了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的相关问题。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在不同生活领域应有不同的体现:政治生活领域是"教导",思想文化领域是"指点",日常生活领域是"引导"。而在不同群体中也应该有不同的体现:对党政干部是"灌输",对青年大学生是训练,对一般知识分子是启发。

## 一、不同领域的划分:教导、指点、引导

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除了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外,还需要在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社会意识的多元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需要对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依意识形态性的强弱作出区分,即政治社会领域、思想文化领域,以及日常生活领域。同时,还须对何谓"指

导地位”作出新的界定，以便确立“话语主导权”的不同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所谓“指导”是指“指示教导；指点引导”，这样，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的三个不同领域“指导地位”分别理解为“教导”、“指点”和“引导”，以此来分别体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权。

### （一）政治生活领域："教导"作用

在政治生活领域，我们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作用及其话语的“指示教导”作用，即党和国家路线的制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他任何理论都可以作为思想资源被参考和借鉴，但不容许在整体上取代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论基础作用；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表达，要体现马克思主义话语，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导”。

意识形态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往往是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整合起来的重要的黏合剂。“为了更好地奋斗，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他们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①因此，“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②。在政治生活领域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实质涉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政治认同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政治制度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党政治合法性

---

①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学》，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7 页。

的思想基础，是凝聚党心、民心的理论武器，也是关系中国社会转型顺利完成的政治底线。正如邓小平所言："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①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了自己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

从理论角度看，对任何执政党而言，没有经济绩效支持的法理绩效与没有法理绩效作指导的经济绩效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实现经济绩效与法理绩效的有机统一，执政党的理念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可，才能巩固执政地位。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绩效有目共睹，而且继续"做大蛋糕"的能力依旧强劲。但是在"蛋糕做大"的同时，"做大蛋糕"与"分配蛋糕"之间矛盾的凸现，群众中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其症结在于，没有形成经济绩效与法理绩效动态平衡的合理配置机制。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除了继续坚持经济绩效不流失，还须努力培育法理型权威，而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发挥"教导"作用：像当年论证并宣传"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样，论证并宣传"公平主义"同样是社会主义的"硬道理"。

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总是一方面对内"重建意识形态"，加强思想文化的影响与控制，竭力用民主理论、人权理论、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理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外大肆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实施文化霸权主义。因为他们

---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知道，政治思想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所当然要论证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不断丰富和完善合法性的内涵。而突出“公平正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可以有效地批判当前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解释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完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内涵。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思想文化领域："指点"作用**

在思想文化领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点”作用，即在包容理论多样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要通过对各种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以及对各种腐朽思想的批判力的彰显，发挥其对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点”作用。

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具有对其他社会意识的整合作用，而不能一味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唯一”科学性，也不能仅视自己的意识形态为“政治术语”或“宣传话语”而放弃在科学性上的努力。除对那些政治目的非常明确的敌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和应有的压力之外，

①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

对其他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应该通过整合加以引领，从而提升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价值观的理论表达，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了“主义”。脱离“主义”来谈“问题”，会因为缺乏政治大局观而陷于盲目；离开“问题”来谈“主义”，又会因为缺乏实际的针对性而流于空洞。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应该渗透到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为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价值观的指导和思维方式的选择，而不是以从“主义”中演绎出的结论来取代具体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反对脱离实际来构想各种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在关注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找到它同其他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的“交集”，才能发挥它对其他各门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上的“指点”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绝不是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都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建立各式各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这样难免会重蹈以马克思主义“取代”各门哲学社会科学的覆辙。因此，对各种具体社会问题的发现及其解决方案的设计，应由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探索去回答，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也并不一定能对这些具体模型作出“对”或“错”的判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可以对各种社会科学所提出的具体方案背后所蕴涵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作出评价，以揭示某一方案实行的可能性、条件以及对社会发展的优劣，从而为党和政府的决策选择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参考系，并为人民群众是否认同提供启示。

正是在对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案背后所蕴涵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的揭示和评价中，可以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论优势，同时，也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妥善处理同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空间。面对多样、多元、多变的社会思潮，只有建立经常有效的、畅通的、制度化的对话机制，对其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进行“指点”，才能有效发挥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通过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的评价，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在多样中立主导、在差异中求共识，同时以主导扩大共识，以共识巩固主导，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主导权。

**（三）日常生活领域：“引导”作用**

在日常生活领域，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的掌握，不是让群众的日常生活都打上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烙印”，而是通过提炼和整合日常生活所创造的对群众健康生活特别是对社会进步具有普遍价值的话语，以“引导”日常社会生活。

改革开放前，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核心话语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级国家机器，覆盖全社会甚至群众的日常生活领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这种意识形态淡出日常生活领域，人们又抱怨日常生活进入了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想”的时代。然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不会真空的，只不过各种新的意识形态，伴随着各种生活方式，伴随着各种商业广告、娱乐节目，而渗透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然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导向，既不能把个人的生活意义完全归于社会整体的价值要求而否定个人价值观的选择，也不能完全不评价和不“干涉”现实存在的各种个人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发挥其在日常生活中的

主导权，对日常生活的诠释，就不能仅仅停留和局限于科学和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框架内，还应当返回到生活之“源”，即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感性世界中去。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日常生活的渗透，目的是要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引导和提升。这一引导和提升，从内容上说，体现在价值导向和内容选择两个方面，从形式上说，表现在大众文化和网络语言两个方面。意识形态要返回实践的感性世界，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需在价值导向上关注日常生活意义，在内容选择上关注公民意识培育，在传播机制上关注大众文化传播，在传播途径上关注网络语言使用。

其一，价值导向：关注日常生活意义。

人的生活是主体与客体、实事与价值的统一。从研究的角度说，可以相对地把生活的存在与意义区别开来，形象地说是人的下半截和上半截问题。下半截是指人的存在方式，上半截是指人的存在意义。“人为什么这样存在”是属于当下的生活意义，而“人应当如何存在”是指未来的生活意义。当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存在和发展时，人们该持何种生活态度，寻求何种生活意义，则是摆在现代人生活面前的突出问题。比如，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异化劳动状态，那么怎样理解这种劳动对人的生活意义？现在大多数人所过的是日常生活、平凡生活，这种生活的意义何在？对现代人来说，主要的问题和困惑是如何揭示出现实生活的意义，从现实生活出发说明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生活有何意义，从而坚定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念和信心。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构，要体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消解政治与生活的紧张关系，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为他们自己的存在”，变成人们所追求的“有意义的生活”，才能掌握马克

思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话语主导权。这需要在价值取向上，体现党性原则和以人为本的统一，将党的价值理想、社会发展理想与个人职业理想和生活追求相结合。要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理想作为“目的因”，使之转化为人们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动力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功能定位上，应从立足于教育人、改造人，转向立足于关心人、尊重人、激励人、发展人，以激发人的创造潜能，营造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舆论环境，让人文关怀走进日常生活，提升大众的精神文化素养。

其二，内容选择:关注公民意识培育。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要突显国家意识、生命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意识、有序政治参与意识为重要内容的公民意识。

为了培育公民意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构建中，要强化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地位，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社会不断开放的趋势，吸收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富有当代共同价值的精神内涵，赋予传统文化精神以时代意义，赋予民族情感以理性精神，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适应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

为了培育公民意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构建中，要提升生命意识的地位，同时，不能把对生命的敬畏渲染成不对社会、家庭承担责任的“活命哲学”甚至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要传播人的尊严和价值。要强化生命的责任意识，强调每个人的生命不只是自己的，更是家人的、社会的，每个人有义务爱护好自己的生命，努

力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对那些通过自己努力创造出奇迹的人，对那些排除万难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对那些勇于坚持职业道德、不计个人得失维护公众利益的人，应该多加宣传。

为了培育公民意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构建中，要纳入有序政治参与的内容。要强化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性的意识，让公民认识到，当他通过学法知法，不仅能够自觉守法，而且能够在法律范围内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且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一切侵夺群众利益从而违背社会公正的行为作出有效斗争，这本身也是对社会尽的义务和责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不断扩展社会公共领域的对话空间，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

公民意识话语的强化，绝对不是张扬“个人主义”，而是让这一话语充分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使每个公民能在自我与社会的调适中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个人在与社会互动、适应中求生存与发展，并通过个人的发展来为社会进步作贡献，应逐渐成为多数人的理智的选择。在日常生活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应该体现人们的这种价值，这就是“公民意识”这一话语的精神实质。

其三，传播机制：关注大众文化传播。

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以工业化和产业化为基础、以市场化为渠道、以感性消费、特别是追求时尚为特征的文化，其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平民大众精神生活的主体，故用“大众文化”来表示，以区别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中所界定的“大众的文化”。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低层次与商品化的大众文化，难逃“小丑”的角色，而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多样化，作为各种社会集团、媒体以及个人的摇钱树与社会时尚，大众文化借助市

场逻辑的霸权摇身一变成了当代的“明星”，成了消费文化的代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极速膨胀，已成为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形态，并广泛渗入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

作为大众文化的机构性存在，大众传媒如电视、影院、广播、报纸、卡拉 OK、歌舞厅等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前提，使文化的共享领域得到明显扩大，以地域或民族为界限的传统区域文化的藩篱被大规模拆除。大众文化将自身明确定位为一种商品，以市场原则为导向、以被大众消费为目的，所以，大众文化本能地追踪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迎合大众的消费口味，具有一定程度的前卫性。但是，与高雅艺术或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的市场特征和商品原则又决定了它的平面和短视。

因此，在大众文化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重构，其出路在于改变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单向度“灌输”路径，而是要顺应大众的审美趣味及接受方式，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建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性，明确反对什么、抵制什么、倡导什么等，从而引导和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和素养。

其四，传播途径：关注网络语言使用。

媒体进行的大众传播，是一种有选择的传播。媒体选择信息的过程，就是它实现自身传播目的的过程，这与媒体宏观控制的原则相关，也与媒体从业者对于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把握相关，与他们制作媒体的学识、经验、智慧相关。在中国，由于传统媒体本质上是宣传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作为意识形态衍生物的位置，也就决定了其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方式，最终决定了越接近信息源的媒

体价值越高，这就形成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但是，随着媒体分众化、对象化、个性化、主动化的发展，特别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兴起，它的传播方式是平行的横向传播，它的内容的日趋商业化与生活化。对于网络等新媒体来说，越接近公众日常生活形态，越有可能形成价值。

网络的意义远远地突破了技术范畴而介入了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的民主政治，因为它发明了一种对信息进行处理（包括产生、发布、了解、表达、反映、解读等）的新渠道，适应了媒体受众的分众化、对象化、个性化、主动化的发展趋势。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其所产生的深刻震撼，不仅源于一系列既有的技术指标，更被描述为未来的经济形式和文化形式，进而与民族国家的基本战略目标联系起来。[1] 网络对人而言，绝不是一种纯粹自由的选择，因为它的背后有一个复杂运作的强大的体系——网络语言。

网络的出现，给传统的话语垄断带来了强烈的冲击。高科技的强势运作，使得那些原本很少有机会在传统传媒上发出声音的群体突然有了"高歌"的平台，这一现象显示着社会大众在网络上都获得了话语权。但是，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流传度极高的字、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情感、判断、意识，网络成为同质化最高的公共领域，而看似繁花似锦的网络语言，背后却昭示着一个事实：即网民们刚获得的言论自由，转眼间就心甘情愿地把话语权交了出去。

由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深入网络语言，利用网络语言生动活泼、灵活多变的形式，在信息的上通下达之间，树立一种"形象"，把握话语主导权。一种语言，只要仍在为

---

① 南帆：《网络的话语》，《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人类的交际服务，就是活的、变化的语言，就必然会随时进行新陈代谢。对于网络语言中约定俗成的、充满生命力“俗”话，应加以吸收，而对于那些只是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与情调的语言，就只有丢弃和坚决制止。

## 二、不同群体的区分："灌输"、训练、启发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要掌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和宣传，从而使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话语。而在教育对象的确定上，必须面对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分化组合而带来的群体分化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要发挥其有效性，提高针对性，须区分不同层次，突出重点群体。而重点群体的确定，应该以因占有社会资源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同而决定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程度为标准。这样，可以确定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学生特别是优秀人才、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这三类群体是重点。

当然，对这三类群体的宣传教育方式和目标，也应该有所区别：对党政干部，主要是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使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对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主要是进行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和正确的价值观的导向，使其在认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对知识分子，是进行交流和对话，使其在自己学科的研究中能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宏观思路上的指导。而对于普通公民，则是通过党和政府的有效工作，来感染他们，使其“品德正”，在遵循社会主义社会的底线价值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提升精神文化层次，并认

同中国共产党所整合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试图对全体公民都进行自上而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灌输”,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没有可能。

**(一)党政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灌输”**

党政干部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传承者,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之脉”延续者。党政干部如果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不甚了了,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只能是大话和套话,所谓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空话。而当前,党内存在的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如“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等,与“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①。

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在

---

① 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遇到了新的阶段性矛盾，由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的快速，使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出来，如经济的大而不强，城乡的二元结构，区域的差距拉大，资源环境的代价过大，社会的事故频发，精神物质的发展不平衡，外部的压力增大，劳资的地位不等，特别是分配的贫富悬殊，以及干部的贪腐严重，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面对这些矛盾，有人认为，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了尽头，应该“改旗易帜”，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也有人提出，这表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应该走回头路，重新搞国有化、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这两种观点，抓住的都是贫富分化和干部贪腐问题，极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因此而迷失了方向，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党政领导干部要在“政治上始终坚定”，必须在“思想上始终清醒”，这样才能做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的要求。而“思想上始终清醒”，则取决于“理论上始终彻底”。一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性的党的领导集体，就能够在各种风浪的考验面前，做到“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①]。

党政干部的领导素质有多方面要求，但其核心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领导干部只有“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才能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

① 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 30 周年大会上讲话》。

造性”[①]，并且防止一些年轻干部在复杂的环境中迷失方向。江泽民也曾指出：“一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不可能成为党的合格的领导干部。”[②]

现在非常强调党政干部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世界眼光，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现在的党政干部队伍的状况，与改革开放之初，已有很大不同，知识化、专业化已成为普遍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及政治信念，却是主要缺陷，他们又肩负着引导先进思想文化发展方向、提升社会精神境界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的政治使命。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可以发挥重要的政治导向、精神引领和道德约束作用。为此，在理论教育领域，要集中力量抓好党政干部这一重点群体，坚持“主义真、品德正、方法对”，切实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信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在确立“权为民所授”理念的基础上，形成“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执政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准绳，以延续党的思想之脉。

针对当前一些党政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缺乏系统把握的现状，要以提升党政干部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水平和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为基本目标，侧重于教育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进行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及其核心内容的系统“灌输”。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注重“问题”的解决，更要注重“主义”的养成，使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0页。

党政干部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化为自己稳定、成熟的思维语言。

在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也要区别层次，提出不同要求。对50多万党的执政骨干（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着眼于提高驾驭全局工作的能力，促其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增强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和工作的前瞻性、创造性。对一般干部，要着眼于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促其结合工作实际加强理论思考，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另外，马克思主义教育还必须重视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非公经济领域的经营管理者阶层，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是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依靠力量，要着眼于提高其企业经营、发展能力和增强诚实信用意识，塑造个人人格，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导向，形成社会团结一致的精神文化动力。

**（二）青年学生：强化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

当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约有2000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成为党政领导者、企事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才，其思想政治素质如何、能否更快地适应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引领社会，关系到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关系到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包括研究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国情和改革发展稳定现实问题，促进大学生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而要帮助大学生真正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强化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这是因为：

其一，强化理论思维能力训练是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

人们的实践活动不仅具有现实性和有限性，而且具有理想性和无限的指向性。实践活动的这一双重本性，使人们渴求在最深刻层次上把握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这就形成了带有终极性关怀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它包含了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真与假)、评价关系(善与恶)和审美关系(美与丑)。尽管这三者各有其地位和功能，不能混淆，但都是以一定的理论思维为基础的。因为对真理本性的探求，即我们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确实有对事物的真知而不仅仅是“相信”我们“知道”某类事物，影响到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人们探求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但又不满足于顺应世界，还要探索理想化世界。因而它对世界的思考，既带有追本溯源的性质，又具有超越性的特点；既离不开经验知识，又超越了经验知识。这就决定了正确“三观”的树立，是建立在对科学认知的反思的基础上，是需要理论阐述和逻辑论证的。

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达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目的，必须发挥理性的现实分析和科学的价值引导这两大功能。其中，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国情和改革发展稳定现实问题，可帮助大学生认清当代中国大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科学的宣传，可引导大学生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大势。只有认清当代中国大局和把握未来发展大势，才能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奠定理性的基础。而无论是理性的现实分析，还是科学的价值导向，都离不开辩证的理论思维为指导。因为作为现实的大局，并不等于现象的堆积，未来的大势也不取决于任何个人善良的意志，如何看待和分析大局，如何预测和把握大势，

存在着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指导问题。思想方法不同，价值观念相异，对同样的社会现象，会作出不同的判断。如何观察和用什么样的思想来观察国际命运和社会前途的问题，关系到如何看待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因而它实质上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

其二，强化理论思维能力训练是使大学生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深刻领会”它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科学方法，着力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当代大学生所要承担的责任来说，这一要求也应该适用于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已逐步渗透到中学政治课的新情况下，对大学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自然应有进一步的要求，这就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即其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仅仅让大学生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什么，这就需要强化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

理论思维是在实践中形成并在思维中应用概念和范畴的过程和能力。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时，只有着重阐述这一理论为何以及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新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话语的，其中运用怎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将这些话语构成新的命题和判断的，这些命题和判断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又是如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理论体系的，才能使大学生真正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上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一系列战略决策，渗透了辩证的理论思维，从而揭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势。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不仅应该让学生知道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大局说了什么，即“知其然”，更要阐述为何这样说，即“知其所以然”，从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即“知其所必然”。在三者的关系中，“然”是“所以然”的现实表现，“所必然”是“所以然”的未来展开。因而，教育教学的着力点，应该是在介绍“是什么”和“怎么做”的基础上，放在帮助大学生“知其所以然”上，重点阐述“为什么”，即强化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

其三，强化理论思维能力训练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要条件。

高素质的人才，需要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与各种社会关系和谐相处的能力，创造创业的能力，等等。所有这些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

当前，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发展道路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绝大多数大学生的认同，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极大的提升。社会生活多样化步伐的加快和人们思想日趋多元化，客观上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但另一方面，一些信奉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家对中国的强盛产生种种不适应，更有一些坚持“冷战”意识形态的敌对势力产生仇视和恐惧，包括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同时，国内的各种思想是非问题更多地牵涉各种利益的纠葛，难以判断。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给大学生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而其根本之点在于努力让学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魅力以及它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经济体制的转轨期社会变动的偶然因素增多，改革深化也带来了新的复杂矛盾，使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迷惘和困惑，他们期望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理论要彻底，就不能回避社会热点问题。但是，理论对现实关注的层次有不同。思想政治理论

课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分析社会热点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之中存在着怎样的矛盾关系，因这些矛盾关系而决定的它的实质及发展前景是怎样的，以帮助学生认清当代中国大局，引导学生把握未来发展大势。而所有上述的分析，都需要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功能。

我们要让大学生懂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抵御“淡化”意识形态甚至“去意识形态化”的错误倾向，又不能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泛化”意识形态或“强化”意识形态斗争的老路上去；我们要让大学生清醒地意识到国际上反华敌对势力借各种热点敏感问题抹黑中国、向我施压，以及借其经济科技优势向我输出西方组织观点和价值观念的现实，又坚持在外交活动中不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国家主权和利益为最高准则；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帮助大学生抵制腐朽没落思想观念的侵蚀，又承认大学生形成适合自己性格特点和成长环境的不同层次价值观念的合理性；我们要鼓励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又要帮助他们以理性务实的态度正确对待各种社会矛盾，避免出现思想偏激和行为偏差；我们要激励大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但又要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赋予民族情感以理性精神，等等。做到这些，才能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而这一切，都需要科学的理性思维。

总之，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①]强化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是应该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环节。马克思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主义理论教育取得实效性的关键，在于所涉及问题的针对性以及所展现理论的深刻性。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任何科学的理论，形式都是抽象的，但内容都是具体的，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②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是形式的抽象性和内容的具体性的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辩证逻辑乃至形式逻辑上的魅力，其科学性就必然大打折扣。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时，离开这一理论产生的问题背景及其发展的现实根据，完全剥离其内容的具体性、朴实性和现实性，而将它作为由"物质"概念演绎出来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的教条化体系，使其话语蜕化成"抽象"的东西，因而使大学生难以接近。今天，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教条主义阐释，但不能走向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逻辑魅力的展现这另一个极端。当然，通过强化理论思维来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并不意味着从概念到概念，只是对概念作逻辑演绎。

大学生期望把握未来发展大势。因此，对他们来说，更需要的是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立足中国和当代、并面向世界和未来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而不仅仅是具体的现成结论。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以"彻底的"（马克思语）而又"朴实的"（邓小平语）道理来说服大学生，就应该为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学生分析社会矛盾和反思思想困惑，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以便帮助大学生在走上社会后，能具备对新产生的问题和矛盾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是批判的学说，党的理论也是在应对不断产生的新的矛盾和问题的挑战中实现与时俱进的。我们不应该把运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对社会矛盾的揭示和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批判，都当作“反面教育”，把“遮蔽”社会矛盾而虚构“到处莺歌燕舞”当作“正面教育”，因为这恰恰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它不可能具有彻底性，也就不可能掌握大学生。我们应该用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话语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来分析和评价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引导大学生勇于正视矛盾、正确面对矛盾、善于化解矛盾，使大学生不仅能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而且能进一步认识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和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强化理论思维能力培养的主要途径可以有：

第一，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其活力。

强化理论思维功能并不意味着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编织一个脱离实践的范畴网络，而是要求在教学中自觉地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中所蕴含的理论思维。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中国化成果的基本观点，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作考察和阐述：其一，讲清每一理论成果的逻辑起点与这一理论所面对的历史起点的一致性；其二，讲清这一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观点同它所涉及的问题的关系，以此来体现它的科学性。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观点看，它的科学性和活力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

立，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而是实现了人类思想史的革命性变革，从而回答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其次，尽管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遇到许多艰难曲折，当代资本主义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依然是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原则，是认识当代世界各种矛盾的思想方法；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赋予它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看，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是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而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从这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起点出发，邓小平开始了对国情和世情的重新认识，其间又伴随对中外社会主义实践史深刻的比较思考，和对当代国内外大背景高屋建瓴的把握，由此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把发展生产力由中心工作提升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的地位，同时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为回答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道路问题提供了立论根据，围绕发展生产力又逐步形成了发展动力和政治保证理论，以及完善了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理论，等等。这样讲，大学生可深切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各个理论观点的内在互补关系体现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历史的和时代的必然性，而非先验的产物。

在教学中尽力将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

大学生认识:(1)我国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为什么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2)今天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看待这些问题?(3)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将有怎样的前途以及它对大学生的成长和责任意味着什么?这样,不仅能更好地帮助大学生认清当代中国的当局,以"适应"社会,还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把握未来发展的大势,使之走上社会后能承担起"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

第二,把科学的思维方法与正确的价值导向结合起来,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人格魅力。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不仅体现在这一理论的逻辑力量、它对现实的批判能力上,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格魅力中。马克思恩格斯彻底的批判精神、艰苦的探索精神、忘我的牺牲精神,以及他们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使他们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贡献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展现他们的人格魅力,可以使大学生更具体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同样,在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蕴涵的科学的理论思维的和正确的价值导向时,将邓小平等人的人格力量渗透其中,可以更好地感染大学生。邓小平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处变不惊,高瞻远瞩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抓住问题的实质,既气魄宏大,又思维敏捷。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平易近人,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里话。他长期身经磨难、历经艰险的奋斗历史,使伟人和平常人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大学生从邓小平的人格力量中,将进一步体悟他的理论力量。

通过把科学的思维方法与正确的价值导向结合起来,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可以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既具有忧患意识、

又具有坚定信念的党，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走在时代前列的党，这样的党，是值得青年信赖的、可以继续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无可替代的领导核心的党，以确立跟党走的信念。

第三，把“浅入”和“深出”贯通起来，促进其实现知信行的统一。

要善于从问题导入，做到“浅入深出”。所谓“浅入”，一是要避免从概念、定义或学科的理论体系出发，结论先行，而是从能反映社会热点和理论热点的思想热点同时又涉及教材所要阐述的基本理论观点的实际问题导入，以激发学生听课的理论兴趣；二是摈除纯粹为革命战争服务而已不适合和谐社会构建的旧话语，以及被个别庸俗化了的政治术语，尽可能运用“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思想”的话语，并吸纳哲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新的较能反映社会发展变化实际的话语。当然。问题导入也好，鲜活话语也罢，并不是为了追求生动性而迎合群众对社会问题的情感牢骚，这就需要“深出”，既不就事论事，也不搞简单机械的“原理加例子”，而是就事论理，即通过对用鲜活话语引出问题的分析和评价中，渗透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阐述理论观点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根据，从而使大学生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促进其实现知信行的统一。

对于全体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通过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大局，把握未来发展大势，使之不仅能“适应”社会生活，更能承担起“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对于文科大学生，还需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理论的学习，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使其今后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能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更需要通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习，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 （三）知识分子：对话中启发其认同马克思主义话语

马克思主义话语同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联系。马克思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从早期领导人到成熟的领导集体，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到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其绝大部分主要成员，无一不是出身于知识分子。

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来说，其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都是在领袖人物、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合力推动下形成的。领袖人物最终所构建的话语体系，是尊重和吸纳知识分子的理论话语和学术话语，并契合人民群众的话语方式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知识分子的声音。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知识化的代表，是社会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上是权力机构的智库，对下是大众思想的启迪者。因此，要加强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沟通和联系。当然，这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强加在所有知识分子对所有问题的研究中，而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对话，使从事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话语对社会问题批判和解释的力量和价值，特别是其在宏观视阈中的比较优势，以促使更多的知识分子，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各个领域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的批判精神中所包含的诸多话语，完全应该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内在话语。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情怀，是源于他们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使"以人为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而知识分子只有具备心怀全人类的胸襟，面对全人类的问题，感同身受，才能承担起社会"良知"的职责；同时，只有树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才能自觉做到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上多出文化精品，多做文化思想启迪，做到文化思想的批判与引导相统一，文化作品的市场化与精神化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在马克思那里，其一，它体现为将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结合，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③]；其二，它体现为不惧怕任何权贵，当对真理的追求与权力发生冲突时，服从真理；其三，不断的自我批判，即一旦当新的资料和实践经验突破了自己以往所形成的结论，就毫不犹豫地修正自己的结论。这一彻底的批判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应该成为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的内在的基本精神。知识分子要面向现实，对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给予关注和思考，"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④]。没有对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就不会有对时代精神精华的凝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知识分子在批判性思考中，一方面可以以其科学的学术话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学理的支撑，使其理论更彻底，逻辑更清晰；同时，通过话语批判和提炼，扩充反映社会现实的话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更加完善，更具开放性，更具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政治术语作生活化的转换，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大众情结，为更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掌握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作出自己的贡献。

# 结　语
#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来看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重构问题。当代中国，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仅仅依靠本本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无法指导急剧变化了的实践，"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失去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①。

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层次、宽领域地融入世界，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日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必然需要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

“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①，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更加清醒、主动地掌握我们自己的发展命运”②。

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所树立宽广眼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性，这就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其内涵，“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③。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深远眼光和世界的全局眼光”，统一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早在19世纪中叶欧洲自由资本主义走向繁荣的时候，马克思就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生产，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人们的“普遍交往”，使人们的“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逐利和无限扩张的本性，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这一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回过头来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使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也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的这一“世界历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观察当代全球问题以及中国发展问题，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应该是历史的眼光。它从世界复杂而又急速变化的现象中，透视世界变化的本质和发展的大势；从世界不同文明的变迁中，追溯民族兴衰存亡的规律。曾经横扫欧亚的奥斯曼帝国，在经过工业革命快速发展起来的西欧国家面前，分崩离析。当初中国康乾盛世已潜伏着落后于世界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的危机，很快由盛而衰。其共同教训是：由

①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于对滚滚而来的世界进步大潮茫然无知而导致国家的衰败，“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要求，不紧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进步发展的潮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论曾经多么强大，最终也是要落伍的，而落后就会挨打”[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应该是全局的眼光。它看到新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必将成为推动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但同时，又必将使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这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战略关系，对世界经济政治的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进行，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开辟了空前广阔的空间，促使各国进行经济体制大变革和经济结构大调整；但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而使南北鸿沟难以填平，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的发展，使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同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表现，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并不一帆风顺。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使发达资本主义获得了与社会主义竞争的优势；但同时，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使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的生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进入一个长期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阶段。大众传媒在技术上的飞速发展，为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条件，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交融，有利于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学习、交流、借鉴，有利于中国文化在比较和吸收各种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自己；但同时，一些错误的、甚至是腐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严重冲击着我国的思想文化主阵地。

---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应该具有鲜明的价值坐标。它摒弃了冷战思维，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统一的价值维度，来看待世界变化与中国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认识中国发展所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及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把握中国应该承担、而且可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这样的宽广眼界所呈现的世界视野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方面世界很不安宁，另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十分曲折，另一方面它已不可逆转；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发展兼有利弊，另一方面它在继续加速发展；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受到各种国际国内各种利益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它毕竟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课题和共同责任；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使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另一方面它在继续加速推进；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冲突依然激烈，另一方面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交流交融交锋成为基本态势；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根本对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使不同制度国家寻求合作互利共赢成为必然的选择。世界多极化的曲折发展，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尽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但利益却不尽相同，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虽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利益；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图谋，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切问题上都联合起来一致对付中国的局面，也难以出现。这就给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由此，中国的国际战略思维应该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都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由此，国家发展道路的战略思维应该是：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改旗易帜的邪路和封闭僵化的老路的界限，提防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危险，警惕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思潮的泛起；同时，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需要，既吸收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文化，又批判地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反映社会进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成果，以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要有序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显著增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于是，面对 21 世纪的时代潮流，我们应该主动融入还是被动

接受，应该主动适应、力争主导还是自我封闭、顽强抵制还是主动适应、力争主导？这是一个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顺应这一时代潮流，重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体系；这一潮流，也为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 后　记

本书是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构和话语主导权的掌握——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背景的研究”(课题批准号:2007BKS003)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改写而成的。此课题立项前后,本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为科研的主攻方向。部分阶段性成果,曾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优秀论文三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一等奖,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第六届学术年会优秀入选论文奖,上海市社联“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优秀论文奖、“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奖项。最终成果经同行专家鉴定,结项等级为优等。经过多年研究,颇有心得,但也存在更多困惑,如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与核心观点究竟是什么关系?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应该建构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具体是一个怎样的话语体系？等等，都有待今后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做更深入的探索。

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博士生培养中，我亦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为主题，对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培养。部分博士生参与了这一课题的研究，除对课题进行多次集体讨论外，还分别按原课题设计的框架，形成了研究成果，为本书的部分章或节的内容提供了初稿，按现在本书的结构是：徐国民（华东理工大学讲师）：第一章；温美平（上海金融学院副教授）：第四章第一、二节；张建忠（华东政法大学讲师）：第五章；王亚南（立信会计学院讲师）：第六章第一节。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对本课题研究和著作出版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为拙著的完善和出版，提出了不少建议和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陈锡喜

2011 年 7 月 1 日